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去政治化的政治：台灣政治事件的敘事社會學分析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 Narrativ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Events in
Taiwan

陳雨君

Yu-Chun Chen

指導教授：蕭阿勤 博士

Advisor: A-Chin, Hsiau, Ph.D.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

August, 2010

本論文承蒙慈林教育基金會

「2010 年慈河獎學金」的獎助支持，

深表感謝。



謝 辭

終於到了提筆寫謝辭的這一刻。四年前，當我抱著懵懂、疑懼的心情離開大學母校，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鄉，並進入掛著「金字招牌」的第一學府就讀研究所時，全然不知接下來會經歷的精采旅程。首先我要感謝東海社會系的老師們，在我進入研究所之前對我社會學思考的啟蒙，替我打開一片知性的天空。

然後，我要謝謝研一社會學理論課「魔鬼訓練營」營長賴曉黎老師，您紮實、厚重的教學風格，讓我不僅窺見社會學理論殿堂的奧秘，也學習到面對學術作品的謙虛態度。謝謝丁仁傑老師，讓我這個沒做到什麼事的兼任助理，能在零用錢之外賺取額外的生活費，而每次和您隨意的聊天互動，總能進一步觸發我對人生的思考。謝謝「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讓我參與政治受難者訪談計畫，這個寶貴的訪員經驗不僅深化我對台灣歷史的認知，也做為點燃這本論文的火種之一。感謝接受我訪問的長輩們，您們的受難經驗打開了我的世界，願您們和其他在暗處受苦的人們，能平靜地渡過餘生。

感謝最是感謝的蕭阿勤老師，要不是有您當初的鼓勵，也不會有這本論文。研究所生涯最幸福的事莫過於找到一個好的指導老師，和寫一個真正想寫的題目，而您讓我兩件事都做到了。您嚴格卻充滿耐性的指導過程，是我研究所生涯最大的收穫。同時，也謝謝參與這本論文的姚人多和李明璁老師，您們的鼓勵和建議讓這本論文更加完整。

謝謝廣場上相遇、相識的野草莓們，你們在我跌跤的時刻與我同行、伴我一起成長。雖然學運的訴求沒有達成，與你們一起共享的廣場經驗卻在我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回憶，它做為我人生的重要事件之一，也間接促成了這本論文的誕生。謝謝關心我的學長姊們，特別是小英在論文最後階段的幫助；謝謝研究所同學們，尤其是佳盈和郁彥，你們「學伴」似的存在讓我的苦惱能夠適時紓解，並讓我在最挫折的時候還擁有繼續下去的動力。謝謝我為數不多的知心好友們，特別是草姊、維茵、玉環、筑婷在我閉關階段的包容和陪伴，讓我也能安心完成這件大事。謝謝網路世界的臉友、msn 友人們，你們即時的安慰和鼓勵支持我走到今天。謝謝杯子、哈湯的店長和員工，在論文衝刺的階段，你們遞上的飲料和食物賦予我正面的能量，一起參與了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最後，要感謝生我育我、對我百般呵護的爸爸媽媽，謝謝您們對我的支持和包容，讓我在沒有經濟壓力的情況之下順利完成學業。

陳雨君 2010 年 8 月 11 日 于台北士林

摘要

本論文從文化社會學與敘事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台灣「去政治化」的政治敘事如何產生與轉變，並且釐清此種敘事的社會意義與社會效應。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在 1970 年代的威權統治時期，台灣社會出現了兩種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與「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國民黨的社會宣傳致力於運用這兩種敘事，進行意識型態教化，強化其統治正當性，對台灣社會留下深遠的影響。到了 1990 年代政治自由化初期，省籍問題及國族認同議題的浮現，以及激烈喧鬧的選舉政治氛圍，則讓另外兩種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被催生出來：「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與「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這兩個 90 年代的重要敘事模式，繼而成為 2000 年民主進步黨執政後台灣社會的政治論述的重要元素。2000 年至今，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形成了兩種新的去政治化敘事：「反對轉型正義」與「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它們綜合、累積了 70 年代以降的各種去政治化敘事的要素，因此變得更加龐大、意義上也更為複雜。這種現象顯示，隨著時間的演變、象徵資源的積累，行動者能夠運用的論述資源也更為豐富，同時也可以挪用先前的敘事要素來建構新的政治論述。2000 年之後台灣社會去政治化現象愈加流行，事實上是累積醞釀已久的結果。就現實政治的變遷而言，在一方面，針對各種社會政治議題，愈加盛行的去政治化，與「反去政治化」、企圖「再政治化」的力量互相激盪衝突；在另一方面，去政治化敘事的愈形發展，內容包羅更加廣大，顯示台灣社會的政治分裂不僅沒有趨於消解，反而更加嚴重。本論文揭露「去政治化」運作的各種樣貌，探究政治行動者如何藉由各種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以否定、掩飾自身行動的政治性。本論文指出，去政治化做為隱諱、不易察覺的政治，有利於隱藏某些由於特定認同或立場而來的言論、行動、或政策，並對台灣社會的政治認知與參與產生負面的影響。

關鍵字：台灣政治、去政治化、敘事、敘事社會學、文化、文化社會學、民主政治

Abstract

Focusing on narrativized political discourse, this thesis aims at analyzing the emerging “depoliticized” politics in Taiwan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sociology of narrative and method of narrative analysis,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depoliticized narratives” (DPNs) and their cultural-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effects in Taiwan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I investigate how and why DPNs have changed over the recent forty years since the 1970s and evaluate them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parallel the trajectory of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First, I argue that, during the authoritarian period of the 1970s in Taiwan, there are two modes of DPNs. One thematizes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nd another,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anti-violence.” The ruling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propagandized these two modes of DPNs to justify its political control and demobilize the support for dissidents and this has had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Taiwanese society. Secondly, in the early 1990s, a period of dramatic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wo new modes of DPNs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the periodic unrest caused by frequent elections and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The first new mode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the ethnic problem brought about by the “local Taiwanese-Mainlanders” division. The second mode of DPN was dominated by cynicism about the new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politics. The two 1990s DPNs paved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st recent DPNs in Taiwan. Since 2000, when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gained the ruling power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other two modes of DPNs have been looming large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The motif of one of these two modes is to neutralize the demand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us diminish opposition to the political force represented by the KMT. By highlighting the priority of pursu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other recent popular mode of DPN minim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caused by China’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Built upon previous ones, the most recent DPNs have become more articulated. Old DPNs as symbolic resources ready to be drawn on by political elite and the public have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and prevalence of new ones. In sum,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Taiwan over the recent four decades has resulted in growing cynicism about democracy in general and polarization of political positions, especially those regard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particula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has mixed consequences of exacerbating political conflicts and demobiliz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mining the various modes of the DPN, I conclude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DPN is

to hide the narrator's particular identity or position by downplaying, if not making invisible, any political import of discourse, action, and policy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ith a view to maximizing his or her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s shown in my analysis of the modes of the DPN, has had an nega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Key words : Taiwanese politics, depoliticization, narrative, sociology of narrative, culture, cultural sociology, democratization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一) 關於台灣民眾「政治參與與認知」的研究	
(二) 從「政治文化」觀點出發解釋台灣民主發展的學術著作	
(三)「意識形態在威權－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的相關研究	
第三節 概念和理論架構	10
(一)「政治」的概念	
(二) 何謂「去政治化」？	
(三)「去政治化」的台灣經驗	
(四)「文化」的晚近觀點	
(五) 帶入研究工具——敘事社會學	
1. 結構與行動：社會學基本命題	
2. 敘事、敘事分析、敘事社會學	
3. 敘事社會學的事件研究與社會變遷	
4. 事件的敘事結構分析	
第四節 資料來源	22
第二章 從噤聲到開放的年代：「去政治化敘事」的雛型與演變	24
第一節 小市民與「安定繁榮敘事」	25
(一) 論戰背景與始末	
(二) 導火線：〈開放學生運動〉	
(三)「安定繁榮敘事」的政治重要性	
(四) 知識份子的回應	
第二節 美麗島事件與「民主、法治、反暴力的敘事」	33
(一) 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過程	
(二) 將政治異議者污名化：	
「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	
第三節 解嚴後浮現的敘事類型	40
(一)「安定繁榮敘事」與「民主、法治、反暴力的敘事」的延續和創新	
(二)「厭惡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	
第四節 小結	49

第三章 反對政客：2006年反貪腐倒扁運動.....	51
第一節 2000年以後的厭惡政治現象.....	51
第二節 「貪腐案」的建構與「倒扁運動」的經過.....	54
(一)「去政治化運動」的定位	
(二)熟悉的對抗與運動逝亡	
第三節 多重去政治化敘事的鬥爭.....	59
(一)四大報媒體報導風格	
(二)運動初期—中期（8月11日—9月16日）的敘事鬥爭	
1.「超越藍綠」的去政治化敘事	
2.「抹藍」、「倒施」的政治污名化回應	
3.「尊重法治」的反動員回應	
4.強調「社會安定」、「和諧」的政治意見	
(三)敘事轉向與「麻煩製造者」的出現	
第四節 小結.....	71
第四章 嘲諷政治：2007年「中正紀念堂」更名與復名事件.....	72
第一節 建構失敗的轉型正義.....	72
(一)轉型正義與統獨議題的糾葛	
(二)「中正紀念堂」更名過程	
(三)「中正紀念堂」復名過程	
第二節 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鬥爭.....	77
(一)四大報媒體報導概述	
(二)主張更名的言論與行動	
(三)反對更名的去政治化敘事	
1.在野期間：「選舉操作」、「挑起對立」、「依法行政」的去政治化敘事	
2.執政期間：政治=行政程序、「兩蔣」商品化的去政治化邏輯	
(四)冤冤相報何時了？針對復名行動的社會回應	
第三節 小結.....	93
第五章 經濟優先：2008年陳雲林訪台風波.....	94
第一節 一個去政治化的經濟議題.....	94
(一)兩岸經貿交流的昔日與今日	
(二)兩岸經貿的新自由主義政治	
(三)陳雲林訪台風波始末	
第二節 迎「財神」還是迎「敵人」？.....	100
(一)四大報媒體報導情形	
(二)迎「財神」：救台灣經濟的去政治化敘事	

(三) 迎「敵人」：憂心主權流失的社會不滿	
(四) 衝突之後的「和諧社會」看法	
第三節 小結.....	113
第六章 結論.....	114
參考書目.....	121



圖 目 錄

圖 4.1 中正紀念堂堂景平圖.....	76
圖 6.1 去政治化敘事的文化建構示圖.....	115

表 目 錄

表 5.1 歷年中國商品進口值.....	100
表 6.1 1970 年代以來台灣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115
表 1-1 敘事的基本結構.....	22
表 2-1 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30
表 2-2 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一）.....	38
表 2-3 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二）.....	44
表 2-4 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46
表 2-5 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48
表 3-1 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62
表 4-1 反對轉型正義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86
表 5-1 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106

第一章、導論

本文的寫作動機，來自晚近台灣社會的一種有趣的政治現象。2009年8月初，由於莫拉克颱風引起的「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以高雄市長陳菊為首的南部7縣市（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台南縣、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首長，於8月26日共同宣布，將邀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於8月31日訪台4天，為台灣與災民祈福。¹此舉立刻引起國內政壇的風波：一方面國民黨副秘書長張榮恭指出，民進黨根本是利用水災進行政治算計；另一方面總統府方卻回應，傾向接受讓達賴來台，不過特別強調「此事完全基於人道而非政治考量」，因此歡迎達賴以「宗教領袖」身分來台，從事宗教活動。至於主動創造議題的民進黨政治人物（高雄市陳菊市長）也在記者會中表示，邀請宗教領袖達賴訪台，是基於人道、關懷、愛心與慈悲的心，需要宗教家給予災民心靈撫慰與支持力量。其他民進黨人士則說，以「災區地方政府名義發函邀請」，請達賴「來台救災祈福」，兩種有力理由都能淡化政治色彩，要是馬政府仍以政治角度否決，實在很難說得過去。²

觀察朝野之間的攻防過程，「政治」一詞似乎變成一個燙手山芋、散發出污染和不潔，只要誰碰到邊就會立刻成為社會的罪人，目的是將它丟給敵人、並且避免自己碰到。連達賴喇嘛受到這種氛圍的影響，於8月30日抵台時都要特別強調：「這次我來台灣，絕對沒有任何政治考量，這是人道救援，只有宗教精神與教育，順便也是來看看此地的老朋友。」³事實上達賴為政治和宗教領袖是眾所皆知之事，觀看中國國台辦「堅決反對達賴以任何形式和身分訪台」的反應，以及南部觀光業者擔心業績受創、股市恐懼下跌的境況，就可以知道這實為不折不扣的政治議題。「政治」在此時此刻事實上就如「國王的新衣」那般，是眾人心照不宣的真實。而上述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論述，不過是欲降低此事件引發的政治／社會效應。那麼這種奇特現象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其實，「去政治化」並非最近才出現的現象。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年解除戒嚴、1988年李登輝成為新國家領導人之後，在其路線之下，台灣開始進入顯著的民主轉型期。1990年代期間，最重要的政治競爭情境之一便是選舉，由於剛剛起步的政治自由化，整個社會相當熱衷這種在過去不可能實現的新遊戲規則，公共領域中的論述，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政治類議題，統／獨之爭議、省籍

¹ 參考〈南部7縣市邀訪，府方傾向同意 達賴來台 考驗兩岸關係〉，《工商時報》，2009年8月27日。

² 參考〈朝野看達賴來台／藍批政治算計 綠籲平常心〉，《自由時報》，2009年8月28日；〈月底達賴來台祈福 府傾向接受〉，《中國時報》，2009年8月27日。

³ 參考〈取消記者會 改探視災區 達賴：宗教祈福 無關政治〉，《中國時報》，2009年8月31日。

衝突等等，是此時期論述中的重大議題。⁴而這個時期，就已出現對政黨政治嘲諷、輕蔑的政治評論與態度（見第二章的討論）。

2000 年的首度政黨輪替，儘管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傲人成就之一，卻也使台灣社會進入一個更加分裂、對立的時代。和 1990 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期相比，2000 年國民黨敗選、李登輝辭黨主席和成立台聯黨、與國民黨劃清界限的種種態勢，意味著國民黨內部勢力的重整——本土派一蹶不振。李登輝退出之後的國民黨，與過去在內鬥中退出的非主流勢力重新結盟成為「藍營」，相對於台聯黨、民進黨這一邊的「綠營」，開啟了藍綠鬥爭的時代。⁵朝野對政治重大議題缺乏共識基礎，民進黨執政而與原本的反對勢力失去共同的敵人——國民黨。這些都形塑出體制外／體制內的新關係，因此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形成了讓許多民眾焦慮與困惑的八年。

這八年的重大變化之一，是台灣去政治化言論與現象的顯著發展。在許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去政治化」敘事愈形發達。它不限於民眾的政治看法，也成為朝野政治人物相互攻訐、媒體評論大量使用的一種敘事模式。其特質是強調「超越藍綠」、「政治中立」，或將涉及省籍、國族認同、人權等關乎歷史糾葛的種種政治爭辯，污名化為「政治操作」、「選舉操作」。在此，「政治」幾乎成為所有負面事物的總匯與同義辭：政黨政治只是為了選舉、政治很黑、政治不值得信任，政治是惡鬥、貪污、腐敗、無能…。對此現象，我們該如何解釋？「去政治化的敘事」卻出現於政治事件的敘事裡，此現象是否反映人們對民主政治喪失的信心與不信任已經到達史無前例的程度？而這種現象是晚近的嗎？還是解嚴之後就已經零星存在、慢慢醞釀成今日的面貌？這些疑問，構成本文主要的研究旨趣。

第一節、問題意識

本文希望從對「去政治化」現象的觀照出發，對晚近台灣政治生活的文化結構進行一種經驗研究。問題意識分為三個重點：首先需探究的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敘事如何產生、及其轉變的過程。再者，「去政治化」敘事的延續與變遷反映何種意義、會產生何種社會效應。最後，這篇論文試圖探究台灣社會的政治生活，為何會出現這種愈演愈烈的去政治化的特徵。

⁴ 1990 年代流行的「民粹」論述，更在總統大選過程中涵蓋了省籍、國族認同、菁英／人民、高雅／低俗等等政治和文化象徵的重要議題，成為非本土派（尤其是外省菁英）攻擊本土派的重要論述武器。關於民粹論述的建構，請參考楊惠婷（2003）。

⁵ 不同於 2000 年之後的藍綠鬥爭，1990 年代的國民兩黨雖然在政黨政治中相互競爭對立，但兩黨黨內的主流路線、對國家走向的看法卻有相似之處。

原本在確認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的過程中，我根據晚近的經驗資料，發現大量「去政治化」的敘事和現象。逐漸地，我對於更早的台灣社會是否有類似的境況感到好奇，因此才決定把研究的歷史範圍延長至解嚴前，希望從解嚴前至解嚴後、在剛過去的歷史與現今之間，進行對照和觀察。其中，研究這些敘事的樣貌，我也同時探討「是哪些行動者」在生產這些敘事、這樣的陳述又導致何種社會效應。我認為針對這些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來探討，才能解釋晚近日益嚴重的去政治化現象之原因。

至於「這些敘事從哪裡找」，亦即屬於經驗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的問題，本研究則從「事件」入手。事件通常不是只有一個單一、隨意的意義，它們可能包含多元的情節結構，多元的敘事前提，以及多元的敘事結果。同樣的事件可以被不同社群、不同公共領域以各種方式陳述，而這些競爭的敘事不僅反映個人如何理解事件，也反映他們如何評價各個社群。最重要的是，由於這些事件會變成社會與國家不同敘事中的重要元素，因此它們往往具有重要的社會後果（Jacobs, 1996: 1241-1242）。

在實際操作上，本文欲先討論解嚴前發生的兩項重要事件：1972年《大學雜誌》引發的意識形態論戰、以及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所引發的批判，以窺見戒嚴時期去政治化敘事的樣貌。再者，則針對解嚴後、1990年代的境況進行探討。最後，隨著歷史時點愈晚近，再進行愈細緻的研究，亦即以2006-2008年期間的三件的重大政治事件來進行分析，分別是反貪腐倒扁運動、中正紀念堂更名與復名事件、及2008年年底的陳雲林來台風波。

關於台灣政治的研究，多位學者（例如吳乃德、田弘茂、王甫昌等）均指出，國家認同分歧、省籍族群間的矛盾與競爭是影響台灣社會穩定運作與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葉春嬌，2007: 48）。⁶國家認同與省籍族群問題的延續，與本文欲探究的「去政治化現象」的確密切相關，因為人們對政治的厭惡，部分原因正是來自對爭論不休的國家認同、族群對立問題的反感。不過「去政治化現象」做為一種與國家／族群認同紛爭並行發展、且互有關聯的現象，過去在學界並未得到關注，本研究便是希望彌補此缺憾，釐清去政治化現象在理解台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問題上具有的重要性。

⁶ 這些研究例如：吳乃德（2002）、田弘茂（1997）、王甫昌（2004）。

第二節、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尚缺乏對「去政治化」現象的經驗研究，不過學界對本研究所針對的某些現象已有相關的討論。它們大致可分為：一、關於台灣民眾「政治參與與認知」的研究；二、從「政治文化」觀點出發解釋台灣民主發展的學術作品；以及三、探索意識形態（如族群、國家認同）在威權統治及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之相關研究。

（一）關於台灣民眾「政治參與與認知」的研究

由於本文的問題意識為「去政治化」現象的源起、過程和意義，因此會觸及民眾心理層次對政治的認知和態度等課題，而學界對此種現象的研究，即對於台灣民眾「政治參與與認知」的量測，確實指出了晚近政治參與逐漸低落、以及對政治日益產生疏離感的現象。

例如洪永泰曾根據幾種大型量化調查資料，歸納出台灣民眾政治參與與認知的普遍趨勢，包括：第一，從 1950 到 2004 年，除了總統選舉的投票率較高之外，縣市長選舉和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率逐年下降。尤其是立法委員選舉在 2004 年僅有 59% 的投票率，顯示台灣選民對立法委員的投票功效意識明顯遞減。第二，以 1992 到 2004 年期間民眾的政治信任感而言，民眾對政府最不信任的是用錢，認為政府官員時常浪費人民叫繳納的稅金。1992 年有 57% 的受訪者持負面態度，2004 年則有 69%。這是所有項目之中民眾最不信任的，而十幾年來變化不大。其次，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做事能力」，持負面態度者在 1992 年為 43%，到 2004 年則上升為 69%，沒有減緩的趨勢。再者，受訪民眾對政府首長公開言論的不信任，在 1992 年有 21%，到 2004 年則有 55%，大幅上升。另外，即使民眾比較信任政府的「政策制定」，但不信任者的比例仍然向上攀升。整體而言，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感在上述項目都呈現逐年惡化的趨勢。第三，1980 年代末到 2000 年前後，台灣民眾除了在 1991 與 1996 年有較高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指每個人對自我政治能量的認知，這兩年持肯定態度的民眾分別佔 50%、42%）之外，在「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指每個人對周遭政治體系的感受和回應）部份，則一直沒有太高的信心。整體而言，台灣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相當低，顯示人民對政治事務的無力感、冷漠感。⁷

除了以上調查資料顯示的訊息之外，國內也有少數針對「政治疏離感」進行的相關研究。關於「政治疏離感」概念內涵的討論，可以 Melvin Seeman (1959)

⁷ 上述洪永泰的研究發現，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網站「台灣社會變遷全紀錄」網頁下「六、政治參與與認同」中部份內容（網址：<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E6%94%BF%E6%B2%BB%E5%8F%83%E8%88%87%E8%88%87%E8%AA%8D%E5%90%8C>，查閱時間：2010/8/12）

為經典代表，他對政治疏離感的定義，也是後來相關研究普遍採用的依據。Seeman將疏離感分成無力感（powerlessness）、無意義（meaninglessness）、失序（normlessness）、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與自我疏離（self-estrangement）等五種面向的涵意。「無力感」指的是個人認為自身的行為無法影響最終的結果；「無意義」是個人不確定自己該相信什麼，即個人做決定的標準已經不是那麼明確，因此他無法預期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何種後果；「失序」主要來自於E. Durkheim (1933) 所創的社會失序（anomie，後來也稱anomy或anomia）概念，指人們所遵從的社會規範已經崩解，不能再作為人們的行為準則。處於這樣的社會，人們無法相互信任，人際關係也相當不穩定；「孤立感」是人們（通常指知識份子）認為世俗的社會標準不適用於自己，傳統的社會價值已不能滿足他們，他們希望引進全新的標準，徹底改變舊有的社會結構；「自我疏離」概念較抽象，指的是「某種程度上，個人的行為僅是為了某個可預期的報酬」，例如：工人工作僅是為了薪水，婦人煮飯僅是為了果腹而已；因此，「自我疏離」基本上是個人的行為並無法得到自我獎賞與自我滿足的目的（葉子豪，2006: 6）。

在此概念操作化的層面，首先David Easton將政治系統簡化為政府接受人民的「輸入」，經政治轉換而「產出」，給予人們「回饋」的一個循環過程。W.A. Gamson將此概念具體化，他認為政治疏離感同時包括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感兩個面向：選民的政治效能感可做為測量人民對於政治體系的「輸入」與「要求」的指標；政治信任感做為政治體系「產出」與「支持」的指標(葉子豪，2006: 7)。

在國內文獻的部份，江文孝便採用了 Gamson (1968) 對於「政治信任感」和「政治效能感」影響政治參與的論述，探討政治疏離感對於民眾政治參與的影響(9)。其研究結果顯示，政治世代為第一代、外省籍、教育程度較低者、居住在北部的民眾、政治興趣（除了注意報紙新聞和關心選舉，此處的政治興趣包括注意電視新聞和討論選舉議題）和施政評價較低者（包括施政者評價、整體經濟和個人經濟評價）、偏泛藍和無政黨認同者、以及對兩岸問題為偏向統一的民眾，其政治疏離感顯著偏高。同時，江文孝將民眾的政治傾向分為四種類型：忠誠型、從屬型、異議型、疏離型。其中，政治信任感與政治效能感均高的稱為「忠誠型」；政治信任感高但政治效能感低的稱為「從屬型」；政治信任感低但政治效能感高的稱為「異議型」；而政治信任感與政治效能感均低的稱為「疏離型」。綜合觀之，統計分析結果為：忠誠型民眾佔有 32.1%、從屬型民眾 18.0%、異議型民眾 21.5%、疏離型民眾 28.4%（江文孝，2005: 2）。

另外，葉子豪以2001年與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來比較選民政治疏離感之變化。其中他採取徐火炎（2003）對政治疏離感進行分析的操作方法，先將 A. W. Finifter對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治無意義感及政治失序感四個面向的分類，來操作化「政治疏離感」的內涵。並將選民分成「認同的選民」、「憤

世的選民」、「冷漠的選民」及「疏離的選民」等四種類型(葉子豪, 2006: 11-12)。

⁸葉子豪的研究結果發現，在2001年期間，以認同選民與疏離選民的比例最高，各佔31%與30.8%；而憤世選民的比例則為22.6%；比例最少的為冷漠選民，僅一成五左右。但到了2004年期間，認同選民比例則是下降近9個百分點（22.3%）；相反的，疏離選民比例則上升了9.5個百分點（40.3%）；憤世選民與冷漠選民，在比例上則沒有很大的變動（葉子豪，2006：35）。

透過量化研究調查獲得的數據，我們發現政治疏離感近年的提高，及其特殊的人口學特質，這些資料有利於佐證本文所指涉的經驗現象之真切性。不過此種研究取向操作邏輯，在於「證實現象存在」的貢獻為主，若要進一步深究此現象的來源、社會過程或文化結構，恐怕仍需細膩剖析社會文化肌裡，藉助於描述過程、意義與社會變遷的質性研究討論。也就是說，更值得進一步問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人們日益升高的政治疏離感？他們究竟認同什麼？否定什麼？在此，本研究欲探索：政治菁英與民眾形成此種政治態度的原因、以及他們對政治的基本認知為何。1990年代興起至今的族群、國家認同政治，是左右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而本文關注的便是圍繞在這種認同政治而極具決定性的現象。

（二）從「政治文化」觀點出發解釋台灣民主發展的研究

除上述的文獻之外，還有一種和本研究有關的研究類型，是從「政治文化」的概念出發，來測量台灣民主發展的境況。「政治文化」的概念最初在1956年被Gabriel A. Almond 創造出來，並將其內涵定義為「對政治行為與政治評價的主觀取向」(倪炎元, 1986: 61-62)。這是美國政治學界為了彌補制度研究途徑的不足，所開拓的新研究取徑，它企圖從個人的認知、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念等角度，來解釋政治系統的穩定與變遷的基礎 (Rosenbaum, 1991: 1)。Almond 與 Verba (1963) 的名著《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發表之後，曾因七十年代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而沉寂一時，然而到八十年代末期又再度興盛、成為熱門領域，並在比較政治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黃秀端, 1997: 48)。此種研究取徑，簡言之，是將文化視為一個能夠影響政治結構的「變項」，它同時帶有西方先進國家對於政治或民主的價值偏好，依此來界定其他國家的民主發展過程。

「政治文化」的概念也被國內學界用來測量台灣民主發展的情形。例如在《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一書中，Almond 與 Verba 將政治文化分成的三種

⁸ 「認同的選民」指的是信任政府，又具有政治效能感的選民，他們可說對當前政治體制相當滿意且具有高度的支持；「憤世的選民」指對於政府不信任，但具有政治效能感的一類。這類選民認為自己具有影響政治的能力，卻因為對政府的失望與不滿而產生憤世的心態；「冷漠的選民」則是指信任政府，但卻自認為對於政治無能為力，只能以冷漠的態度，完全依賴政府來處理政治事務；「疏離的選民」可以說是典型的「政治疏離的選民」，他們不但無政治效能感，且對於政府也不信任。

類型（偏狹、臣屬、參與型），也被國內研究者用來作為衡量民主發展的指標。部份國內研究者（黃景裕，2001；呂翠燕，2005；簡士偉，2003）均認為臺灣民主發展境況是屬於「臣屬型」政治文化，然其解釋略有不同。

呂翠燕在《2004年總統大選後台灣民主發展之驗證》之碩士論文中，以2004年總統選舉為例，來檢驗台灣民主的發展境況。她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實屬「臣屬型政治文化」，原因是受到中國儒家文化「君尊臣卑」觀念的影響，此觀念使得台灣民主轉型過程是依靠政治菁英的帶領，而非人民由下而上的推動（2005：65）。因此民主化之後，惡質選風撕裂社會（如省籍衝突、國族認同對立的各種政治議題）的現象，實為政治菁英「民粹式」操弄選舉的結果，而這一切也歸諸於不成熟的「臣屬型政治文化」，所以台灣社會應培養以理性態度參與政治之「成熟的政治文化」（2005：74）。

簡士偉在其碩士論文《從台灣地區政權輪替論政治文化之發展》中，也發展出與呂翠燕相似的論點。他認為台灣長期處於威權文化下，並未培養出民主政治所需的公民文化，一般民眾對公共領域的事務，尚缺乏理性參與的習慣；而這種未成熟的公民社會的民主不過是高層政治菁英權力競逐的產物（2003：111）。惟其和呂翠燕不同的是，他引用知名政治文化學者Lucian Pye的話，來解釋人民對民主價值認定之變遷：「立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過去以地位和聲望為基礎的政治，已經讓位給了一種帶有物質主義性質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台灣成了一個受經濟驅動的社會，從而使政治不得不放棄其所自命的那種重要性；而且，官僚之地位已被重新界定。就此來說，台灣已開始傾向於一種多元化的政治體，並日益遠離那種講究責任、紀律和尊崇政府權威的儒家社會。」（2003：93）⁹不同於呂翠燕重視儒家文化在台灣社會持續的影響力，簡士偉較強調文化變遷，認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已經產生劇變。

黃景裕的解釋也是認為台灣「臣屬型政治文化」的肇因應歸諸於國民黨鞏固的黨國認同體制。「台灣長期處於威權統治，並未培養民主政治所需的公民文化，公民教育的實施充其量只能說是政治社群的灌輸，而在公民的養成，因而，一般公民對於公共事務，尚缺乏理性參與的習慣。」（2001：365）然而與呂翠燕不同的是，他正視國家認同的問題作為影響台灣民主體制、以及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而非僅僅是「被選舉炒作的話題」。

「臣屬型政治文化」的定義多半強調公民「被動方式參與政治」的特質。人民不以所屬政治體系為榮、也無意公開談論政治，而且也不認為自己對政治具有影響力（Rosenbaum, 1984: 69-70）。上述三位研究者，顯然都認為台灣的政治文化普遍具有此種特質。然而，政治文化所預設的「文化」是一套社會整體共享的

⁹ 此段原文由簡士偉引自金耀基的《中國政治與文化》，1997，牛津大學出版社。

意義體系，這樣的文化概念，容易忽略因社會內部異質性而形成的文化差異——難道台灣社會所有公民都如此被動參與政治嗎？究竟是哪些行動者比較傾向這種政治態度？此概念似乎無法提供恰當的解釋。再者，如同黃秀端的觀察，政治文化途徑往往引導我們關注連續性（continuity）、因而無法適當地解釋變遷本身（1997: 61）。這個取向的研究者仍將文化視為穩定的意義系統，而由於政治文化是憑藉政治社會化而傳遞下去，因此在面對社會變遷時，容易陷入分析的困境。

以上種種問題顯示出我們有必要採取一種新的文化觀點，如 Ann Swidler 提出的文化的「工具箱」（tool kit）概念，此觀點著重於誰使用文化、他們形構意義的不同方式（Swidler, 2001: 22）。當我們用此觀點來研究去政治化的現象，便會關注以下這些問題：誰在使用去政治化的修辭、他們在對誰說、欲達成何種社會效應；當人們建構去政治化修辭時、是使用了哪些文化象徵符碼；以及為何在某些情境下，這種修辭會變成各方行動者競逐的語言。

（三）「意識形態在威權－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的相關研究

回顧過去針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解釋，主要可分為「結構論」與「政治過程論」兩種。「結構論」是引自 1960 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強調經濟發展（或現代化）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因此重視民主化之社會與經濟條件；而「政治過程論」則關注政治菁英之間的競爭與互動，強調民主化發生的過程和機制，這也是過去研究者主要採用的理論觀點（王甫昌，2008: 93）。¹⁰這兩種解釋，均忽略了一般民眾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關於這點，王甫昌在〈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一文中便提出這種觀察。他認為，雖不可否認政治菁英對於民眾較大的影響力（相較於民眾對政治菁英的影響力），但是，「在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體制，特別是具有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及大眾傳播技術之下，菁英與民眾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有一些微妙但顯著的改變。菁英必須透過贏得一定程度的選票，來維持權力合法性，而無法再光憑藉使用武力或恫嚇。這提供了政治反對者一種新的挑戰方式與可能性：他們可以透過訴諸利益、情感、或說理，爭取一般民眾的選票支持，而獲得政治權力或公共政治職位。」（王甫昌，2008：102-103）也就是說，民主轉型的過程仰賴著民意基礎，政治菁英和民眾之間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而非完全是前者領導後者的片面進程。

從這種觀點出發，王甫昌發現「族群現象」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重要性。由政治反對菁英向民眾說理、說服而逐漸醞釀形成的「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

¹⁰ 根據王甫昌的整理，關於「政治過程論」有以下研究：林佳龍（1999）、Chao and Myers（1998）、Cheng, (1989)、Dickson (1997)、Tsang, (2001)、You (1993)

在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之間，成為民主化轉型最困難的改革——「國會全面改選」的重要推手（王甫昌，2008: 117）。不過與此族群意識形成的同時，也有另一股相對立的「外省人族群意識」在台灣社會中作用。如王甫昌在另一篇文章——〈由民主化到族群政治：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1970s-1990s）〉中提到的：「1990 年代以後，由於李登輝的當權，引發國民黨內的省籍政治鬥爭，導致國民黨的分裂。政治轉型過程中，自認為成為政治弱勢族群的外省精英，企圖抗拒台灣社會在台灣獨立的口號下，政治與文化本土化的走向之行動，構成了新的族群政治型態。」（2004: 3）最後，這種族群對立的局勢甚至在政治支持上形成「棄保效應」，促使台灣民主轉型逐漸朝向妥協性較低的「族群政治」，而非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政治（2004: 50）。

在外省籍「反台獨」陣營之中，則以新黨政治菁英的修辭最具代表性，其特徵為「鼓吹族群融合」、以及拉攏弱勢族群（如原住民、客家人）來分化、打擊本省人（王甫昌，2004: 42-47）。同時王甫昌的文章也指出，外省籍政治菁英所使用的「鼓吹族群融合」之政治修辭，實為沿用過去國民黨政府民族主義教育與族群分化策略的成果，它一方面化解本省人對過去政府省籍歧視的疑慮、並持續得到相當的支持，一面又凝聚外省人的絕對多數支持（2004: 49）。王甫昌的觀點重要地呈現文化的延續性——透過行動者融合過去和現在的文化象徵資源，再化為具有說服力的政治修辭，繼續影響著台灣 1990 年代及其後的族群政治。

與此類似的研究，則如吳乃德於〈反動論述和社會科學——台灣威權主義時期的反民主論〉一文的發現，他將台灣的族群（國族）政治與威權—民主轉型的發展扣連起來，指出：由於台灣社會在國家認同上的分歧，民族認同成為反民主論述的重要內涵之一，這是台灣反動論述的獨特現象（2001: 133）。他針對威權統治時期捍衛當權者的論述進行研究，並將威權主義時期的反動論述分為兩大類型，一為統治團體官方所發動的宣傳（如〈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和〈南海血書〉）；另一個是掌握文字和論述能力的社會科學者和新聞從業人員所提供的政論（2001: 128）。其中，為政治壓迫辯護的反動論述以「法治」和「反台獨」作為兩大主題：前者往往用於批判反對人士「腦子只有政治、無視法律存在」，並強調「民主應以法治為依據、暴力危害法治也危害民主」；至於後者則是在國共對峙的特殊歷史背景之下，所持續存在的言論。這些論述的結構，若用 Hirschman 於《反動的修辭》一書裡對反動論述的分類：「危害論」、「無效論」及「悖謬論」，也都可以找到這些特徵（2001: 129-130）。¹¹

透過以上文獻回顧，我們得知意識形態（無論哪一方的意識形態）在威權—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台灣族群政治的認同問題，實際上也和威權—民主轉型社會的課題相互糾葛。比較引人注意的是，解嚴之後、政治空間開放之

¹¹ 參考 Hirschman 的名著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譯：反動的修辭）。

後，在一個相對較為開放競爭的社會裡，許多政治事件或議題當中，仍可以看到前文被稱為「反民主論述」之論述結構的存在。而本文所關注的經驗現象——那些去政治化的修辭樣貌，部分正類似前述指出的論述結構。但本文的問題意識，比較關注的焦點是，這些威權統治時期的論述，其內含的文化象徵符碼，是如何在解嚴之後、選舉政治的新遊戲規則裡，被行動者建構成新的論述武器，並進行文化—政治的意義鬥爭。此時新的論述已不再是過去單純的「反民主論述」，而是一個難以名狀、尚待探究的未知物。而這樣的運用何以可能？它是牽動到何種思維的軸線、以吸引人們的支持？這就牽涉晚近台灣社會常見的政治認知和期待。「去政治化」也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目前尚乏人研究，而透過本研究對去政治化現象的掌握，我們能更加理解晚近台灣政治變遷的特徵，也進一步了解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是什麼面貌。

第三節、概念與理論架構

(一) 「政治」的概念

「政治」一詞的字根為希臘文「城邦」(*polis, city-state*) 的衍生字，而在這個深受希臘經驗制約的概念中，學者們進一步分析出若干重要成分，以之為古典「政治」概念的要素。首先，政治意味「公共」(*common*)，與「私人」、「個人」、「自利」等概念相對立。其次，政治指涉「自由平等之治」，與「專制」、「獨斷」相對立。再來，政治只適用於城邦之內的事務（江宜樺, 2005: 7-8）。

古典希臘時期的政治概念結合了倫理學的觀點，如亞里斯多德所言：「政治與倫理之目的，唯在求人之善。團體之善與個人之善雖相符合，但前者顯然更有價值，更完善，故值得追求與保持。此非謂個人之善無追求之價值，乃謂團體之善具有更崇高、更神聖之性質。」（亞里斯多德, 2006: 3）同時他也進一步指出，城邦的出現不僅是為了促進相互利益的極大化，也是為了「追求最高善」、成就「自足的生活」（江宜樺, 2005: 8）。「政治」是維護共和國的貴族藝術，透過地方利益的從屬至全體共同體的利益。政治的概念在此近似於集體行動問題的解決、與公共利益的傳遞（Hay, 2007: 9）。古典時期的「政治」的概念充滿正面的理想性。

然而到了近代，政治的概念產生很大的轉變。通常學界以馬基維利或霍布斯為現代政治觀念的奠基者，原因在於前者將政治與道德分離，而後者從個人主義的角度重新界定了國家的功能（江宜樺, 2005: 12）。馬基維利的觀點源於 15-16 世紀義大利混亂的政治背景。在其大作《君王論》一書中，被密切關注的是政治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at*)。政治的論述關注管理眾人之可信賴的政治藝術，目的在滿足多數而非個人的集體需要，此時「存在的理由」成為較黑暗的藝術，

即「國家」。它意指穩定、隔絕、具體化個人或群體之政治權力的藝術，經由某些管道的策略發展、及對公共制度的控制（Hay, 2007: 8）。由於「存在的理由」的關注被提升，於是政治變成以公眾為名、行菁英或統治群體的自我利益之實。是政治「存在的理由」，而非「政治」本身，成為透過欺騙大眾來達到治理目的的藝術（Hay, 2007: 9）。馬基維利與那個時代的其他作者區分政治和存在的理由的企圖是重要的，只是到後來兩者才被相互等同起來。在此過程中，政治的公共論述和它流行的言外之意與聯想便被全然重新形構。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愈以工具性和自利的觀點投射政治人物的動機和作為，我們就愈難想像政治是實現集體的善的過程（Hay, 2007: 9）。

至於霍布斯所謂的「政治」，指的是人們為了擺脫相互爭鬥、令人恐懼不安的自然狀態（戰爭狀態）¹²，於是不依自然力量或武力，而依據人們自由意志的判斷，以平等的方式締結契約、建立至高統治權的過程，最後導致「國家」的誕生（江宜樺, 2005: 14-15）。順著霍布斯對國家的討論，社會學家韋伯發展的政治的概念，也是指國家這個層級的領導活動。而由於國家又是特定疆域中正當武力行使的壟斷者，因此政治必然與權力或支配有關。韋伯認為，政治追求權力的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不論是在國家之間、或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江宜樺, 2005: 18-19）。

韋伯對政治概念的討論比霍布斯更直接和強烈地揭示了現代政治概念不同於古典政治概念之處。首先，現代政治概念不再與任何實質性的倫理或道德目標有關，而純然是一種活動或行動的範疇。第二，現代政治概念比傳統政治概念更預設「敵友關係」與「鬥爭」的必然性，政治不再是善意相向的公民彼此砥礪德性的作為。第三，政治鬥爭或權力爭奪不僅發生在一國之內，也發生在國與國之間，因此政治現象無所不在（江宜樺, 2005: 19）。政治的概念在近代產生的轉變，使它不再具有古典的倫理學意涵，也失去了過去較正面的理想性。在前述談及的三位近代政治思想家中，又以馬基維利的觀點最為極端，由其「政治作為一種黑暗的藝術」的觀點出發，似乎可以發現：當代台灣與世界其他各國「去政治化」現象的思維結構，基本上是以馬基維利式的政治觀為雛型、形成對政治的認知，再進一步對於政治「存在的理由」（竟是如此黑暗的理由）產生根本上的質疑。

在回顧古典與近代「政治」的概念的演變之後，在此要談的是一種更具有涵括性的政治的概念，而這也是筆者在這篇論文所採取的觀點。政治學者 Colin Hay 所提出的政治概念，觸及非常基本的意義，涵蓋政治的廣泛指涉，相當有啟發性，值得我們在探討去政治化現象時注意。Hay 具有涵括性的政治概念，包含了四個特質：選擇（choice）、能動性的能力（capacity for agency）、公共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以及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首先，Hay 指出政治發生在有選

¹² 霍布斯也將人預設為自利的動物，因此自然狀態是永無止盡的爭戰。

擇的情境，因此政治是一種集體的選擇。再者，Hay 認為依循著第一個特質，由於選擇只發生在有可能性的情境，因此政治也是一種能動性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agency）。政治時常是關於辨識我們有沒有能力做點什麼、關於我們是否有辨識不同行動方式下或許能夠獲得改變的能力。Hay 強調，在這種情境下，政治的反義詞便是「命運」（fate），宿命論和聽天由命便是政治相反的對照。當我們愈將我們的命運託付給「宿命」，我們也就愈否定了我們影響結果的能力。政治屬於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機遇」（contingency）的領域；而命運則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領域（Hay, 2007: 65-67）。此外，Hay 指出，當人們採取政治行動時，必然會歷經審議和社會互動的過程，因此政治是審議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在社會脈絡中發生的社會互動（Hay, 2007: 68-69）。透過 Hay 的上述定義，有助於我們將政治的內涵賦予更寬廣的視野，以及更豐富的想像，也因此相當有助於我們理解去政治化現象更深沈的意涵。

（二）何謂「去政治化」？

歐美學界對於「去政治化」這個概念的發展及討論，主要立基於經驗現象，且有一種重要的當代歷史背景：即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國際關係，面臨挾新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的大型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網絡，以「全球化」之名削減國家的政治干預之現象。在這些主流的討論當中，去政治化現象的產生乃根植於全球化現象的背景。例如 Werner Bonefield 與 Kosmas Psychopoulos 便指出「去政治化」作為統馭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相當重要的策略，它是將「正當的」政治、經濟和工業活動，及發生在無數場域內的種種決策相互切割的再宣稱。「全球化的語言」作為一種去政治化（的語言），使得國家管理者在全球體系的變遷中資本化，將決策的政治角色移除，因此強化政策執行的效力（Bonefield and Psychopoulos, 2000: 10）。

類似的觀點，如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也認為，全球化在解除管制的推展進程中，具體操作例如時興的多邊投資協定（MAI），實際目的就是要綁住民族國家的雙手、替不受管轄約束的企業行徑解套，使資本的自由流通如同洶湧波濤般地逐一拆除掉任何現存的與潛在的障礙（Bauman, 2002: 36）。Pierre Bourdieu 更犀利的指出，在去政治化政策中表面上看起來「受傷害」的國家，實際上卻是和各種財團進行利益分贓。他在〈反對去政治化的政策〉一文中提到：「國家繼續在為削弱自身的這個政策扮演著一個決定性的角色。令人注目的是，剝奪國家以為金融市場服務的政策，正是由國家所頒訂的。…這意味著國家不只是透過社會福利國家的破壞來助長新自由主義的勝利，還掩藏他們到手的權力」（Bourdieu, 2003: 80-81）。我們可以說，「去政治化」不僅是一種行動，一種有意識的政策，它更擁有一套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政治不要干預經濟、經濟發展至上的經濟決定論。

上述「去政治化」的文獻都指出，「去政治化」其實是高度政治性的。如 Palonen 所談到的，政治化創造了行動的機會、讓真實的另一種建構有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去政治化」的目的則是限制或抹去其他可能性，它妨礙了行動的機會(Chilton and Schäffner,2002: 48)。Bonefield 與 Psychopedus 則從理解全球化現象的脈絡出發，指出「去政治化」這個術語並非意指將政治從社會和經濟領域內除去，或簡單的撤回政治的影響力。它是一種將決策的政治人物除去的過程。在許多層面，國家管理者從這種去政治化的距離效應中得利。再者，去政治化策略總是需要科層實作的公共安排、來達到它們最原初的目的，此過程並改變了對決策的可信度和效能的期待。在這個意義上，去政治化並不只是一種（和物質實作無關的）意識形態，而是意識形態動員的其中一種最有力的形式，簡言之，它是一個關於建構新的國家「中立」的公眾觀感的招數（Bonefield and Psychopedus, 2000: 22）。

然而，國家機器的掌控者，即政治場域的從政者，究竟如何成功的將自己隱身幕後、達到決策過程的去政治化效果，以上文獻並沒有談到太多。去政治化的社會過程，與馬基維利式的政治觀在當代社會的落實之間是有關聯的：人們普遍對政治的負面觀感，是構成政治人物自我卸責成為可能的重要社會條件。因此，以下我們要借助政治學者 Colin Hay 對整體社會的去政治化現象的討論，才能進一步掌握這些實際運作上可能相互扣連的動因。

Colin Hay 在 *Why We Hate Politics* 一書中談到晚近歐美國家出現的「去政治化」現象。他觀察到「政治」在人們的心目中愈來愈成為一個汙穢的字詞。把行動者的行動歸因於「政治動機」無異於質疑行動者「居心不良」（誠實、正直和資格）(Hay, 2007: 1)。「政治」一詞已經變成很多字的同義詞，例如：欺騙、貪腐、教條、無能、對私人事務的過度干涉、以及決策不透明；把一個活動或過程貼上政治的標籤，無疑是嘲笑它們，使人們與這些活動變得疏遠 (Hay, 2007: 4-5)。

Hay 認為，對政治行動者和人民公僕的動機，之所以產生系統性的質疑，是根源於對這些角色工具性的預設。因此，為了解釋此現象，他指出我們可以追溯政治科學 1960-1970 年代風行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及其至 1980 年代的後續影響 (Hay, 2007: 4-5)。Hay 的研究，顯示在政治人物領導之下的、工具理性預設的內化 (internalization)，在多元的政治領域裡，達至一連串去政治化的過程。此外，透過政治行銷技巧的提升，將選舉競爭的政治也包含進來；但這種將選舉競爭比擬為市場中的敵對競爭者的預設，卻可能將理性選民的悖論，轉變成某種自我實現之預言的東西。(Hay, 2007: 156) 最後，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加上它和新自由主義的親合，再配合全球化趨勢中反對政治干預的思想，各種因素相互累積、相互強化，因而造成今日政治不滿的非意圖結果。(Hay, 2007: 158)

Hay 挑戰既有文獻中，對造成去政治化的需求面因素的強調。強調需求面因素的研究者，認為是「接受能力」或「公民的需求」產生變化、因而導致去政治化現象的說法。但是 Hay 提出供給面因素的分析：如私人化，退出公共服務，公共財市場化，決策自主性由正式政治領域轉換到獨立行政當局，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範例所造成的理性化和孤立化，政策選擇的拒絕等等。同時，日漸增加的、對於政治行銷技巧的採用，也造成窄化選舉競爭領域的結果。公共政策整體領域的去政治化，移除政策內容問題的趨勢，特別是涉及選舉監督的重要制度革新，以及為高層候選人個人特質修飾的政治化等等。這些供給面因素的去政治化形式，每一項都和衰退的政治參與息息相關 (Hay, 2007: 159)。而衰退的政治參與，則表現在將社會議題由「公共和政府領域」，推向「公共和非政府領域」，最後甚至推至「私領域」、「需求領域」(非政治的) 的漸近過程 (Hay, 2007: 79)。這種過程，有如 Hay 所描繪的圖示：

政府領域	非政府領域	需求領域 (非政治)
公共和政府	公共和非政府領域	私人領域
可能性和（政治的）審議領域		

Hay 進一步指出，當人們和政治人物逐漸將某些社會議題「去政治化」，把原來公共的議題「去公共化」時，便和「政治無效能」的結果形成惡性循環，從而也免除了許多從政者的政治責任，這也是作者認為「從政者」比選民或其他人對此現象要負較多責任的原因——他們將自身投射成擁有如此狹隘之工具性動機的角色。Hay 認為，這是相當錯誤的事 (Hay, 2007: 157)。

總結以上的討論，「去政治化」現象包含了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作為去政治化現象的元素，並也互相造成影響。首先，第一個層面涉及人們對「政治」的負面認知，例如政治很污穢，充滿欺騙、貪腐、教條、無效率、過度干預、以及決策不透明等等；再者，則是人們對政治場域的行動者——政治人物的負面看法，人們認為政治人物只是遵循自利邏輯的、工具主義的政客，「從政」是一種不名譽的職業。這兩個層面均可能引起政治疏離、及進一步導致衰退的政治參與。而最後一個層面，則是一種市場決定論的思維模式，此思維反對任何政治干預，套用 Zygmunt Bauman 的話，是讓「資本的自由流通如同洶湧波濤般地逐一拆除掉任何現存的與潛在的障礙」(2002: 36)。它造成的結果便是公共議題的私人化、去公共化（去政治化），它削弱人們追求團體之善、公共利益的意願、使人們放棄掌控集體生活的能力、也免去政府對公共議題的政治責任。

(三) 「去政治化」的台灣經驗

台灣社會也出現了前述所討論的去政治化現象，對於政治（政治人物）產生負面觀感的人愈來愈多，無論是對於重大政治事件的評論、或是日常生活裡隨意的閒聊，均可發現這種言論一再出現。甚至如知名綜藝節目——「全民大悶鍋」，便是用嘲諷、戲謔的方式，影射現實世界中的（政治）政治人物；或者「批踢踢實業坊」著名的「政黑版」(*hatepolitics*)，裡頭也充滿戲仿、犬儒式的意見書寫。¹³至於前文提及的「政治勿干預經濟」、「經濟發展優先」的思維模式，在台灣社會也早已存在許久。「台灣經濟奇蹟」作為一項傲人成就、和它需要被維護的事實，從解嚴前至 1990 年代之後，一直被許多民眾與政治菁英所強調。在戒嚴時期，唯恐「政治活動危害經濟發展」的言論，一直是執政當局進行社會控制極具正當性的語言；在解嚴之後的 1990 年代，前總統李登輝也曾講出「經濟議題別泛政治化」的言論；到了 2000-2008 年期間，「搞不好經濟、只會操弄意識形態」則是在野的國民黨對執政的民進黨的主要攻擊批評（見以下各章討論）。而晚近在台灣盛行的公共財私有化制度——以「興建—營運—移轉」

（Build-Operate-Transfer，簡稱 BOT）的模式興建公共工程建設的開發方式，則做為被這種意識形態形塑的具體政策之一。¹⁴

不過，歐美學界所發展的「去政治化」概念，是在以民族國家為基本互動單元的背景中生成的，國際間對這些國家的主權的承認是無庸置疑的。對於民族主義或國家認同焦慮的論述，較不易出現在這些歐美學界的「去政治化現象」的討論範疇內。他們關於這種現象的討論，偏向批判自由民主政治性質變化的政治經濟學角度的分析。相對而言，台灣社會有自身的歷史文化特殊性。就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我們面臨的獨特問題，是在空有國家機器、但對民族實質、領土範圍、國家認同無共識的情形之下，同一塊土地的人民，究竟要以何種治理方式來經營這個「共同體」、究竟能否共存的課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的政治結構之下，國民黨政權撤退到台灣之後，所採取的是壓制各種文化異質性的高壓、威權統治——在政治舞台上消滅有威脅性的組織，只剩下一個威權的政黨來進行治理。這是在權力結構不對等的情況下，人民被迫接受這種統治方式。但隨著民主化的開展，這種統治方式的正當性不斷遭到挑戰，於是漸漸邁向「建立一個能將對立的群體安全地包容在其中的政治制度」的國家路線，是為民主轉型的「民主政治」。¹⁵

¹³ 先前當有重大政治議題（例如第一家庭貪污案）出現時，政黑版非常風行模仿政治敵對另一方的「反串文」，欲藉由模仿「愚蠢的對方立場」來暴露對方論點的可笑，再和己方群起攻之，樂此不疲。有時反串逼真到無法辨認究竟是反串，而重點也不是在於事情的真實或虛假，而是透過觀看、參與這些論辯的遊戲，來發洩心中的政治不滿。

¹⁴ 例如月眉開發案、台灣高速鐵路、中正機場捷運均為採用 BOT 方式的建設案。參考蕭安琦，《台灣BOT制度之研究－以台灣高速鐵路為例》，1999，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¹⁵ 這種分析方式參考《文化的解釋》一書中，Clifford Geertz 剖析印度尼西亞政治的視角。（Geertz, 1999: 372）

隨著民主化、自由化的開展，台灣社會潛藏的種種內在衝突和問題才擁有正當的釋放和鬥爭的空間，那些過去被壓抑的內部問題（國家認同、省籍矛盾等等）也才真正浮上檯面。在此境況下，我們面臨的不只是歐美學術界討論去政治化現象時所面對的當代自由民主政治性質轉變與全球化等。台灣面對的，還有各種過去威權統治遺留給今日社會的「後威權問題」，以及因歷史特殊因素造就的國家認同爭議、兩岸關係課題。因此，台灣社會的「去政治化」現象必須將這些具有自身文化特殊性的因素也考慮進來，方能發展一個符合經驗現實的分析。而這樣的分析，需要我們對「文化」有更恰當的理解，也需要我們具備有效的文化研究工具。

（四）「文化」的晚近觀點

前面的文獻回顧已經指出，本研究所採取的文化觀點是文化的「工具箱」（tool kit）論。在此我們便要說明這種觀點與一般的文化觀點有何不同。根據 Paul DiMaggio 在「Culture And Cognition」一文中的整理，三十年前，多數社會學家將文化視為「無縫之網」，是一元的、內部連貫的橫跨群體和情境，文化被描繪成潛在的變項，它顯現在如媒體畫面、態度調查表的回應、以及根植於每日實作的價值。個體被假設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大眾過度社會化的目光前面獲得文化，且毫無問題的扮演自身角色（Paul DiMaggio, 1997: 264）。相反地，晚近社會學主流則企圖對文化進行更複雜的理解，將文化描繪成碎裂並跨越群體的、不一致且充滿變化的示現。將文化視為充滿信念、意圖和集體生活其他面向的種種價值的視野，已經發展對文化的新觀點：在此文化作為複雜、充滿規則的結構，構成行動者可以策略性使用的資源（Paul DiMaggio, 1997: 264-265）。

例如，提出「文化的工具箱論」的學者 Ann Swidler 便認為，傳統的文化觀點（如 Clifford Geertz 對文化下的定義）意指：文化是意義之「歷史的」傳播模式，體現在象徵裡頭，它是象徵形式裡人們用來溝通、永恆存在的、繼承表意概念的體系，人們藉此發展他們周遭的知識和朝向生活的態度。但是不管這裡定義的文化是公共象徵、整體的生活方式或個人知識，傳統的觀點都無法處理到「文化究竟是如何被社會行動者使用」。（2001: 12）最明顯的實例——文化的懷疑論（人對於文化的不同看法）便足足反應一件事實：我們並不總是相信所聽聞的事物，我們的文化參與大多並非樂於參與共享的意義體系，而是充滿丟棄、批評或過濾的文化實作（2001: 15）。例如「對政治的看法」中，有些人厭惡政治、對政治冷漠或疏離，有些人卻積極參與。因此，要研究文化，就必須藉由探究特定的個人或群體他們相信什麼、來辨認文化（2001: 16）。

因此，Swidler 認為，我們應該著重於誰使用文化、他們形構意義的不同方式。這樣的取徑牽涉到兩個相關議題：文化多樣性，包括不同個體和群體其文化資源的多元性；以及各種人們使用文化的方式——從意識形態的承諾到隨意的陳腔濫調。這種研究方式的好處是，較有利於對文化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進行因果分析，特別是文化影響社會行動和社會組織的方式。試圖理解人們如何選擇性的使用文化意義，可讓我們進一步探究，為何在某些情境中，文化象徵會失去它的影響力和可信度，而其他情境卻不會（2001: 22）。

（五）帶入研究工具——敘事社會學

由於本文的問題意識圍繞著一種困惑：為什麼解嚴至今、歷經政黨輪替之後的晚近台灣社會，會有愈來愈多人厭惡政治、對其產生疏離感？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形塑的社會與文化結構，是否在解嚴之後，對去政治化的現象有所影響？雖然在制度層面我們的確經歷民主轉型，但我們似乎並無法確知民主化過程至今，社會究竟走向進步還是倒退？¹⁶畢竟人們對政治負面的認知到低落的政治參與（如投票），確實影響我們政治生活的品質。這種困惑促使本文採取一種異於探討制度變遷的視角，而以研究人們如何理解、描述政治、乃至於實踐的方式，嘗試探討今日影響台灣社會與政治的重要變遷之一。

1 結構與行動：社會學基本命題

從前一節所討論的文化做為「工具箱」的觀點來看，不同的個人或群體使用文化，形構他們的意義認知。對他們而言，文化也具有結構的作用。在此，我們要先借用社會學家 Giddens 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來釐清本論文研究所牽涉的基本社會學命題。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目的是要解決傳統社會理論中「結構凌駕於行動主體」、以及「忽視結構、重視行動主體」兩種觀點的不當對立問題。前一種觀點包括功能論（包括系統理論）、結構主義；後者則是以詮釋學、各種「解釋社會學」組成的流派（Giddens, 2002: 2）。

在結構化理論中，Giddens 將「個體」與「社會」這一對二元理念，重新構建為能動作用（agency）與結構的二重性觀念（Giddens, 2002: 172）。結構與能動作用的關係為：「作為時空在場的結構只是以具體的方式出現在這種實踐活動中，並作為記憶痕跡，導引著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的行為。」結構是『內在於』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幹所說是『外在的』（Giddens, 2002: 17,25）。紀登斯反對涂爾幹將結構等同於制約的說法，他認為結構是同時兼具制約性（constraint）與

¹⁶ 我曾在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其《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的新書發表會上也聽到他闡述類似的焦慮。雖然他這本書的研究範圍並沒有包含晚近台灣社會的境況，但是他對於 1990 年代至今台灣的社會變遷非常困擾：不知道是進步？還是倒退？還是進步中的倒退？

使動性 (enabling)，以資本——僱傭勞動關係為例，儘管非常不對等，雙方卻都得憑藉它謀生 (Giddens, 2002: 186)。最後，從結構化理論的視角出發，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在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 (Giddens, 2002: 3)。

由結構是「內在於」人的活動、並同時兼具制約性 (constraint) 與使動性 (enabling) 的觀點出發，我們才能解決過去關於制度變遷研究所碰到的問題。過去諸多針對民主轉型的研究，均把制度視為外在於人的「結構」，在這種觀點之下，一旦制度民主化之後、所有問題都應該會被解決，因為我們解放了綑綁原先加諸在人們身上的「威權結構」的束縛。但事實上，並不是每個行動者對於此種政治變遷均抱持著「被解放」的看法，有些人甚至是以嘲諷的態度在看待民主化的一切發展，這種現象正好說明政治等結構內在於人、與這些結構有關的意義、價值、象徵等作為一種文化結構的力量也產生重要的作用。所以，本研究將重新檢視人們對政治的各種描述和評價，透過「敘事社會學」的視角、理解人們心目中政治的圖像，也理解結構在行動者身上的延續與變遷。「政治」作為一種結構，同時存在於人們對它的理解和界定之中。

2. 敘事、敘事分析、敘事社會學

關於「敘事」，Peter Brooker 指出：「敘事乃是重述的傳說或故事，不論是虛構或非虛構題材。」(2003: 261) 敘事的涵義接近具有情節的「故事」、或具有故事性的文體。相對地，論述 (discourse) 一詞具有的多元用法：它可以是作為制度、文化或文化實踐領域特徵的思想模式和語彙（法律、電影、資訊科技）；或者作為一種知識模式或趨勢（精神分析、後現代主義）；或是用來辨別不同社會群體或場合的語言（如管理階層與勞工的語言），簡言之，論述是指稱再現、習例及語言使用的習慣形式 (2003: 119-120)。我們可以說，敘事是一種特殊的論述模式。

而本文用以分析的經驗資料：新聞報導、特稿、媒體評論、報載政論、雜誌文章、乃至於民眾的政治意見書寫，正是介於較特定的「敘事」和較廣泛的「論述」兩種文類之間的模糊地帶，有些論述具有故事（敘事）的特質、有些則否。本文特別關注那些具有故事性質的資料，而分析上以這類的資料為主，並以一般論述資料為輔。

什麼是「敘事分析」？在此就要進一步細究「敘事」的內涵。根據蕭阿勤 (2008) 的整理指出，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敘事具有的基本特質為：「以具有清楚開頭、中間、結尾的序列次序來安排事件 (events) 的一種論述的形式。」(蕭阿勤，2008:

36) ¹⁷其中，情節賦予（*emplotment*）是使事件的陳述具有敘事性（*narrativity*）最重要關鍵，情節的賦予把事件轉變成連續故事中的一幕，使獨立的個案具有意義，也因而將敘事的各部份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不過為了尋求秩序和意義，在安排清楚的事件開頭、中間、結尾的情節賦予過程中，敘事並非簡單反映現實，而是包含選擇、重組、簡化現實等機制（蕭阿勤，2008: 36-37）。

前文已針對社會學基本命題——結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做了討論，承接前面的討論，我們要如何掌握「結構在行動者身上的延續與變遷、制約和使動」的過程？就回答這個問題來說，分析「敘事」無疑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方式。透過「敘事」，我們可以看見人們經由它的形式再現出來的文化結構，以及文化結構的在生產。敘事形塑人們的思考，使人們挪用象徵資源，進行動員／反動員、以及各種意義的鬥爭。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透過敘事社會學的分析，來掌握這些過程。

3. 敘事社會學的事件研究與社會變遷

近來敘事社會學取徑對於市民社會的研究頗有貢獻。這些社會學家們認為，對市民社會的研究應將焦點放在伴隨包羅萬象的象徵符碼與敘事的機制。這些研究指向一些問題：市民社會中的各個公共領域彼此的關係為何？不同社群如何使用包羅萬象的符碼和市民社會的敘事來建構社會認同？而事件又如何影響敘事的建構？（Jacobs, 1996: 1240）

如 Abbott (1992) 和 Sewell (1992) 所注意到的，敘事分析逐漸成為社會科學家解釋社會過程與社會變遷的工具。在此有兩個理由：第一，由於認同和社會行動受到敘事的引導，因此必須處理敘事在建構認同和推動社會行動所扮演的角色（Jacobs, 1996: 1240）。此外，藉由連接個人敘事和集體敘事，才使人得以辨識「想像的共同體」的存在。第二，為了研究市民社會的動態結構，敘事有用的特質在於，它讓理解事件之重要性的分析成為可能。此外 Jacobs 指出，如 Somers 所言，市民社會的理論時常無法考慮到事件有其自身的文化重要性。如同前面已經提到的，事件不是只有一個單一、隨意的意義，它們包含多元的情節結構，多元的敘事前身，以及多元的敘事結果。同樣的事件可以被不同社群、不同公共領域以各種方式陳述，而這些競爭的敘事不僅影響個人如何理解事件，也影響他們如何評價各個社群（Jacobs, 1996: 1241）。

當一個特定事件的敘事和社會中的關鍵衝突、市民與政治菁英關注的需求相關聯，它就會發展成危機。而在現代的大眾媒體時代，一個危機會變成「媒體事件」（*media event*），透過打斷正常播放頻率、「專家」的重複分析、以及扯出涉

¹⁷ 參考 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

及危機的重要角色的意見等等，危機的結局則依賴敘事建構和事件次序之間的互動而定。由於這些事件會變成市民社會與國家不同敘事中的重要元素，因此它們對社會後果是重要的（Jacobs, 1996: 1241-1242）。

研究市民社會真實的動態結構，也就是去看這些真實論述背後的機制和程序。每個市民社會都透過一個特定的論述歷史（discursive history）而發展，最後社會世界以一種任意的分化，呈現誰被包含在內、而誰卻排除在外的特定形構。換言之，市民社會沿著公民和敵人的分裂論述而組織，它定義了值得的、民主的公民特徵，同時也界定不值得的、反民主的敵人。這個共同符碼允許了公眾演說者之間一定程度的互為主體性，因為它提供了評價事件和個人一個相對穩定的系統、以及研究社會敘事的評估系統（Jacobs, 1996: 1242）。

若我們想知道不同社會群體如何理解市民社會中的事件，就必須理解敘事的符碼。一旦我們認為共同符碼所組織的市民社會的論述可以有分析的自主性時，那麼這只有在敘事解釋的闡述裡才能具體實現。再者，當符碼是相對穩定的時候，它對特定敘事建構的動員卻可能是變動的、且必然會如此。（Jacobs, 1996: 1242）這些看法的重點在於，社會真實存在於敘事和事件、符碼和脈絡的互動之間，社會科學家必須使用敘事的工具來揭露這些互動（Jacobs, 1996: 1243）。

就政治場域的內部邏輯而言，如 Skocpol 等人的洞見，「國家的相對自主性」的出現意味國家這個由民選官員和文官體制組成的機制，擁有不受其他場域（如社會、經濟等場域）干預的內部運作邏輯。因此國家管理者有他們自身的利益並且經常依他們自身的利益行動（可能基於個人需求、政黨需求或國家需求）

（Jacobs and Sarah , 2007: 3）。但從政者的權力是誰賦予的呢？是人民賦予的，因此從政者如何爭取民意的支持，確保自身不墜的地位，就成了每個政治行動者摩拳擦掌的目標。如果國家行動者關注於保護他們的自主性，他們只能從特定的文化結構去製造有效的修辭表演，向他們的聽眾恰當的提出。國家行動者特別須要面對和他們提出來的政策、他們自身的正當性、與更一般的政治意識形態（與他們政黨的意識型態）、以及公眾需求有關的挑戰（Jacobs and Sarah , 2007: 4）。

Jacobs 與 Sarah 研究美國國會的從政者關於非營利組織的論辯時，便指出：國會的議員們是透過「敘事」來爭奪政治正當性。對從政者而言，政策競技場是一個富挑戰性和多維的文化空間，他們必須創造一篇意味深長、有說服力的政策敘事。在實作上，他們必須（1）連結更大套的政策敘事來共同定義他們自身的政治參與；（2）讓之後的言說者可以採用他們辯論的基本敘事；（3）強化他們自身的政治正當性與管轄權的權威（Jacobs and Sarah , 2007: 2）。換言之，即使政治人物說出「去政治化」的修辭，仍然意味著他／她正在向某些聽眾進行政治說服，因此仍是一種為強化自身政治正當性的政治動作。

那麼，從政者的政策敘事會有何種特質？由於要讓他們的聽眾們快速、準確的掌握他們要表達的敘事內容，從政者的敘事通常由一種經過角色過濾（Character funneling）的敘事結構所構成，他們使用敘事的結構特徵來再生產自身的正當性，並簡化論述環境的複雜性，以證成某些公共政策的類型（Jacobs and Sarah , 2007: 2-3）。而這些敘事文類包含這些特徵：(1) 情節。以構成開始、中間和結束。(2) 角色。包括倡導者與其對手。(3) 一連串幫助角色通過情節的謀略功用。由於敘事分析只有在被顯示出其故事中的「結構特徵」與「社會行動」、「歷史後果」的關聯時，才能彰顯這種分析方式的長處。因此這裡的敘事理論尤重故事中不同角色之間的組織與關係，這些敘事如何將「角色」組織進相似和相異的二元關係（如主角與對手、英雄與壞人、盟友與敵人等等）之中（Jacobs and Sarah , 2007: 6-7）。

以 Jacobs 與 Sarah 文章指涉的經驗現象為例，他們從國會的論辯中發現兩種相互競爭的敘事類型：第一種為無私的「慈善敘事」，在故事中從政者發展出慈善家、慈善工作者作為「英雄」，及阻撓慈善工作的「敵人」的敘事結構，從政者（敘事者）扮演支持慈善家的角色。第二種則是從政者更喜歡使用的「偽善敘事」，從政者透過這種敘事指出「英雄」和「假英雄」的敘事結構，認為有些佯裝慈善團體的騙子欺騙非營利組織藉以索取金錢，從政者的角色在於保護「真正的」慈善團體，並找出、懲罰那些假英雄（Jacobs and Sarah , 2007: 2,7-8）。雖然 Jacobs 與 Sarah 的研究與本文要分析的經驗現象不同，但是這種「角色過濾」的敘事分析方式，相當值得我們參考沿用。

4. 事件的敘事結構分析

就本文進行的事件研究來說，每個事件都有自身的文化特殊性，而事件中的不同行動者（無論是媒體工作者、政治人物或其他人）對事件可能生產不同的敘事。這些不同的論述之間的論戰，正是沿用不同象徵符碼、構築不同文化框架的意義鬥爭。而本文欲研究的事件，包括倒扁運動、中正紀念堂更名／復名事件、陳雲林來台風波等，主要發生在文化－政治兩個場域（以及兩者之間），牽涉到的行動者則有政治人物、社運人士、文化／學術界人士、與民眾。

由於敘事具有一種企圖「說給誰聽」的意向性，因此它包含兩個元素：一是為敘述帶來觀點、風格和聲調的真實或暗指之敘述者，以及視敘述媒介而定，身為讀者或觀者的閱聽人。（Peter Brooker, 2003: 262）就本文的經驗現象來說，這些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具有「言說行動」（speech act）的邏輯。言說行動包含三要素：1. 講述者（speaker）。2. 閱聽人。3. 情境（situation）（Alexander , 2008: 155）。依據情境而定，涉入事件的各種行動者可以是敘述者、也可能是閱聽人。

如前文所述，一項敘事行動包含了「敘事者」與「閱聽人」，而敘事的基本特質為以具有清楚開頭、中間、結尾的序列次序來安排事件的一種論述的形式。因此我們便依據敘事的結構和特質擬製下表 1-1，在以下各章用來分析台灣去政治化敘事的基本結構。

表 1-1 敘事的基本結構

敘事者	
時間的演進	
中心主題	
情節	開始： 中間： 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簡而言之，由於本文的問題意識是要研究「去政治化現象」的原因和過程，因此理解人們（民眾和菁英）對政治的認知，便是分析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面向。當我們在分析的時候，重點在於觀察這些敘事是在哪些社會脈絡中形成，如何反映、模塑了文化結構，同時探討意義鬥爭中的去政治化現象，是如何成為一股影響晚近台灣社會的力量。

第六節、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依據不同時期的事件進行不同類型的資料蒐集。在第三至第五章晚近事件研究的部份，是以報紙文獻為資料來源。這些事件發生在晚近自由開放的民主化時期，因此我為了掌握各家報社因不同政治立場與市場需求所產生的不同基調，將從各大資料庫（中時報系的知識贏家、聯合報系的聯合知識庫、《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資料庫）進行關鍵字搜尋，以作為 2006-2008 年三個事件內容與政治敘事的資料來源。至於在第二章針對威權統治時期的兩個事件（《大學雜誌》風波、美麗島事件），則以論戰中針鋒相對的相關文本為主，例如當時對事件進行報導和評論的黨外雜誌與官方報紙。在第二章關於政治自由化初期的部份，涵蓋 1994 至 1995 年首次北高市長選舉、與總統直選前對選戰的政治評論或意見，則用《聯合報》民意論壇的資料作為參考。至於選擇《聯合報》民意論壇的原因在於：由於此時的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與自由時報都尚未有供民眾抒發意見的民意論壇，因此無法從這些報紙得知民眾對政治的看法。¹⁸

¹⁸ 此外，根據蕭怡靖（2006）在《台灣閱報民眾的人口結構與政治態度變遷－1992 至 2004 年》一文，在各主要報紙的「閱報率」方面，傳統的《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在 1992 年時皆超過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做為論述其中一種類型的「敘事」，而不是個別的行動者。也就是說，本文並非分析某種行動者（例如國民黨、民進黨）它們的論述行動呈現什麼關係，因此某一種敘事類型可能同時包含了不同政治立場的行動者，而分析的重點則在於探討這些敘事類型反映出來的文化意義，其中強調的價值、象徵和文化結構究竟又造成了何種社會效應、促成了什麼行動。另一方面，也因為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敘事，因此我們較難形成因果關係的解釋：我們難以判定不同敘事之間最終的輸贏，因為敘事和生產敘事的行動者之間沒有絕對的聯繫。



兩成以上，且《中國時報》略高於《聯合報》。但這兩報的閱報率卻逐年下滑，至 1998 年只有一成五左右。（p.46）

第二章 從噤聲到開放的年代：「去政治化敘事」的雛型與演變

為了尋找當代去政治化敘事的元素與雛型，我們有必要回到尚未解嚴的威權統治時期，來探索造成今日這種政治現象的歷史根源。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佔台灣之後，蔣介石將大陸失守的原因歸於「黨務失敗」，於是展開整個黨組織的全面改造。1952年10月黨改造完成，其中改造的重點之一便是將「媒體文宣」列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並責成改造委員會中央第四組（中央文化工作會前身）專司宣傳職務，工作包括書刊審查、廣播事業政策及新聞政策等（袁公瑜，2002: 3）。¹⁹從這個時候開始，國民黨執政者便是透過「第四組」指揮媒體、使其配合國家政令作為宣導工具。

從「中央第四組」時期（1952-1972）到「文工會」時期（1972-2000），²⁰國民黨執政者由「以黨領政」的威權統治邏輯，得以透過這個機構掌握了眾多訊息的流向。統治者經由思想的檢查站，決定人們可以知道什麼、不能知道什麼，可以談論什麼、不能談論什麼。同時，立基於國共對峙的歷史背景，國民黨執政當局試圖向人民輸出的是能夠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競爭的文化象徵、及意識形態。例如中共政府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國民黨政府便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以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抨擊對方「自絕於五千年歷史文化」（袁公瑜，2002: 40）；或是以「民主憲政」的口號，強調自身政治體制的優勢等等。

在這種控制言論的制度性安排下，形成了政治生活的「去政治化」現象。其中，「噤聲」、「沉默」是這種現象的表現形式之一：如父母告誡子女「囝仔有耳無嘴」來禁止小孩談論政治，或學校裡「課堂上不要談政治」的隱性規約，都是藉由透過「不要談論政治」來達到政治生活的去政治化。而造成這種「震耳欲聾的沉默」現象的原因，正如社會學家 Eviatar Zerubavel 於《沉默串謀者》一書所指出的：它是權力分配不均的產物（Eviatar Zerubavel, 2008: 94）。

然而，在一片沉寂的時代裡，仍有少數異議份子試圖「打破沉默」、尋找抵抗的可能性。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所遭遇的是執政當局透過其支配的媒體以「去政治化的敘事」進行反動員和抵制，此為去政治化現象的第二種表現形式。本章的第一節、第二節，便是要以1972年《大學雜誌》引發的意識形態論戰、以及1979年「美麗島事件」為焦點，來討論這兩個事件所反映的「去政治化敘事」

¹⁹ 直到1972年，中央第四組更名為「中央文化工作會」，工作內容為宣揚國民黨推行民主憲政成就和施政方針，了解民意歸趨作政策研訂參考，協調國內電視台、電台、報紙雜誌進行反中共文化宣傳，及如何改進新聞內容，與新聞管理為國家利益服務等事。該部門經常透過工作會的召開，召集國民黨籍各媒體負責人，編採部門主管傳達黨的新聞政策，提示黨的新聞規範（袁公瑜，2002: 3）。

²⁰ 文工會的職權在解嚴之後被大大限縮，最後成為國民黨黨內的宣傳機構。2000年第二屆總統大選之後，文工會更名為文化傳播委員會（袁公瑜，2002: 3）。

的雛型是什麼樣貌。同時，我們也要在第三節中，進而比較 1987 年解嚴之後、至 1990 年代期間，當「選舉政治」成為新的遊戲規則，政治獲得真正的鬆綁、既有的權力結構也日益受到挑戰，此時的去政治化敘事型態有什麼轉變（或雷同）？是誰在生產？企圖達成什麼目的？

第一節 小市民與「安定繁榮敘事」

（一）論戰背景與始末

1968年1月創刊出版的《大學雜誌》，是一本延續《自由中國》與《文星》深受西方影響的政治改革與文化改革期望的雜誌，充滿了戰後世代知識階層的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自我期許。1970年底，改組後的《大學雜誌》，更成為保釣運動之後台灣社會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蕭阿勤，2008: 93, 107）。²¹ 1970年8月，日本政府宣稱對釣魚台擁有主權、並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因而引發「釣魚台事件」，激起了海外留學生的不滿。他們於1970年12月19日在美國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且在1971年1月29日與30日，於美國各大城市舉行示威遊行（洪三雄 1993: 2-4）。1971年6月17日，台大近千名學生發動示威遊行，為釣魚台問題向美、日大使館抗議（洪三雄 1993: 29），但由於面臨無法改變國際現實的窘境，保釣運動被迫落幕。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是為另一波更大的外交挫敗，這個震撼讓台大校園內的學生組織，如《台大法言》、《大學新聞》、《代聯會訊》等學生刊物，以及「台大法學院學生代表會」、「台大學生代表聯合會」等學生社團，從1971年秋天開始發表言論、進行活動，要求校園與社會政治的改革。1971年11月之後，台大要求改革的學生與《大學雜誌》核心人士來往合作也更加密切（蕭阿勤，2008: 106-107）。1972年1月20日出版的《大學雜誌》「青年與社會」的專題中，台大哲學系講師陳鼓應發表了〈開放學生運動〉²²一文，埋下了論戰的導火線。

這篇文章會引起執政當局的疑懼，除了其內容指出當時社會的核心問題極具敏感性的特質之外，原因多少也和國民黨政府必須回應這一兩年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質疑聲浪有關，執政當局因此必須「做點什麼」，才能繼續鞏固統治的政治正當性、穩定騷動不安的民心。而在諸多反對言論中，〈開放學生運動〉一文因緣際會的成為他們反擊的對象。

²¹ 另一股力量來自台大校園內的學生社團。

²² 本文原是台大法學院學生代表會於 1971 年 11 月 25 日舉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的其中一篇發言紀錄。

由這篇文章所引起的撻伐，從1972年4月4日《中央日報》刊登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一文開始，直至6月中旬歷經約兩個多月。在這期間除了抨擊反對論述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系列文章六篇之外，也包括支持它們的一連串政論。除了少數一兩篇異見之外，這些文章均站在執政者的立場，打擊反對論述、並企圖維繫「中華民國法統」。而國民黨政權則受益於這些為政府辯護的「民眾」投書，迂迴的達到壓制反對論述的政治目的。

至於《大學雜誌》這一方的知識界，則獲得台大校內社團的聲援。1972年4月21日，台大大學論壇社便邀請陳鼓應以演講的方式，澄清和回應《中央日報》上發動的攻擊。到4月24日，第366期的《大學新聞》更以「社論」和「每週短評」，首先展開對〈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反擊。之後則有5月1日出版的《台大法言》接棒論戰，5月13日台大文學院代表會出版的《文訊》也刊載了相關評論。然而台大校內也有屬於國民黨學生社團出版的《畢聯會訊》，在當時趙少康的掌握之下，刊出呼應〈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相關文章。（洪三雄 1993: 300, 309, 311, 319, 321）

在論戰逐漸畫下句點之後，國民黨政府展開懲罰行動，它正式攤牌、並撤離對《大學雜誌》的支援，促使大學雜誌內部產生「洋」、「土」兩派知識份子的分裂，雜誌最後終於解體，學生運動也歸於沉寂。（洪三雄 1993: 351）

（二）導火線：〈開放學生運動〉

為何執政當局心懼〈開放學生運動〉一文，並非沒有原因。因為陳鼓應在這篇文章中由探討「造成大眾政治冷漠的原因」出發，直接揭露、呈現了當時台灣社會的「政治冷漠」問題。當時台灣政治生活的去政治化樣貌，不僅非常清楚的被勾勒出來，他更藉由指出這個問題來談「言論自由」與開放學運的必要性。首先，他指出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氛圍：

「在我的四周，親眼看到好些朋友因言論而遭致禍患，也聽到許多青年因言語而帶來累害，許多小題大做的例子使人聽了心有餘悸。只要有一件事端發生，就十傳百、百傳千、人人心感警惕。國外報紙，又從來不放過這類事情的報導，耳聞目染，遂造成風聲鶴唳的氣氛。....紅色重典所造成的怖懼感，這種情況一天不改善，大眾的冷漠感就一天不會消除。....政府如果能用事實來證明青年人不會因言論而使工作、前途受影響，那末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踴躍發言，冷漠感自然可慢慢的消滅。」（陳鼓應 1972a: 64-65）

然後，他指出這種政治氛圍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

「在一般人民的心中，從來沒有養成所謂參與的觀念，沒有充分認識到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團體...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也有責任對國家的事務表示意見。以前的觀念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由於這種傳統的意識作梗，所以要人民不必管，無須過問....治於人的百姓，從未曾有過過問政治的念頭，人民生活即使百般困苦，也不知道和政治有什麼關係，也不知道是政治直接或間接造成的。」（陳鼓應 1972a: 65）

立基於上述的現象，陳鼓應進一步表示對執政當局的建言：

「在一個教育水準提高的環境裡，我們企求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各種異見可並存。異見並存，可以對問題作多面的認識....可以激發人的創造性，開發更多智慧的礦產。....前天中央日報報導中共「紅旗」雜誌指出自由主義思想瀰漫，構成很大的威脅，並說：「有自由主義的人，很容易被階級敵人牽著鼻子走。」可見自由思想是共黨所畏懼的，自由是反對極權統治最有利的武器....試問國民黨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嗎？所從事的不是革命運動的工作嗎？革命運動不就是一項解放運動嗎？解放運動不就是爭取自由嗎？那末執政黨員是不是應該為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呢？」（陳鼓應 1972a: 66）

最後，他談到了開放學運的重要性：

「以前認為大學的使命是：保存知識，傳授知識，並創造知識。現在歐美一般的看法是：除了這些之外，學生應走出學校，改造社會。....我所謂的學生運動乃是一種自覺運動....一種革新運動....也是一種愛國運動。」（陳鼓應 1972a: 67）

從對政治參與低落問題的提出，到呼籲學生運動的開放，陳鼓應甚至還提出「不能反對學生運動」的六個理由，希望國民黨政府真正落實改革開放。然而在當時威權統治的氛圍底下，執政者根本不可能釋出權力。同時在另一方面，強力鎮壓的手段可能會失去更多民心，於是執政當局選擇以平面媒體作為論辯的政治工具，間接地壓制這些反對勢力。

（三）「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的政治重要性

撰寫〈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一文的作者「孤影」本名敏洪奎，本籍新疆，來台後經商，曾在 1972 年時任職於一家紡織工廠。他的文章〈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由於深受國民黨政府青睞，在刊載之後被付印成冊。²³由孤影這篇文章及其他支持文章的內容，我們得以窺見威權統治時期的統治者是如何使用「去政治化的敘事」，來壓制社會中的反對聲音。在此例中，安定、反對暴力、恐懼經濟倒退、將學生幼稚化、知識份子特殊化、以及把倡議改革者化約為「麻煩製造者」等等，則為這些文章顯現的敘事特質。若按照孤影對自身思想的定位，可歸納為中間偏右的保守主義思維。²⁴在這些不同的敘事特質中，「將學生幼稚化」、「將知識份子特殊化」是因為牽涉到「學生運動」的主題才產生的論述策略；相對的，其他的敘事特質（如強調安定、繁榮）則較能反映去政治化現象中核心的那些面向。

首先，1972年4月4日時，孤影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連載文章的第一篇裡，批評了知識份子：「小市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目前有極少數高級知識份子，完全生活在自己一廂情願的『思想體系』裡，他們用各式各樣的主觀『信念』，來拱衛著自己的『體系』，不僅不了解大多數人的生活和想法，甚至跟常識脫了節，跟經驗分了家。」（孤影 1972a）過了兩天，孤影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第三、四篇連載文章中，延續了先前的批評，並將「大學生」也納入批評的對象：

「1968 年美國民主黨在芝加哥開大會，三山五歲的「覺醒青年」蜂擁而往…向大會請願示威，結果跟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嚴重衝突…有趣的是，民意測驗機構進行調查的結果，發現一般國民雖也是群情激昂、紛表憤怒，但其對象不是警察，而是『代表社會正義』的『覺醒青年』。一般小老百姓認為『覺醒青年』享受著他們本身享受不到的教育機會，當兵可以緩徵，吃喝玩樂可以向父母伸手，不好好讀書求長進，而成群結隊去破壞社會秩序，是一種不自愛、忘恩負義的行為，應該受上一點教訓，警察打的好！那些自由主義高級知識份子，面對這種活生生的民意，『震驚』、『迷惑』之餘，也只好罵罵社會大眾『庸俗』、『物質主義』，聊以解嘲了。他們大概絕不會想到、也絕不肯承認，這是他們自己讀死書、鑽牛角尖、脫離常識、跟大多數人脫節的結果。…在社會上打過滾的人都知道，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凡事滿意，為了保住現有的一切，有時候要容忍，有時候要讓步…這種所謂顧全大體，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體認，在年輕氣盛，沒有受過嚴格生活磨練，沒有習慣於遭受挫折的大學生，恐怕是很欠缺的吧。」（孤影 1972b；1972c）（粗體為筆者所加）

然後，孤影從「小市民」的視角出發，進一步強調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重要性：

²³ 參考〈孤影挺扁 解析外省選民心結〉，《中國時報》，2004年3月16日。

²⁴ 參考孤影，〈最後幾句話〉，《中央日報》，1972年6月13日。

「台灣經濟之能成長，工商業之能繁榮，人民生活之能改善，跟二十年來社會之長期安定有很大關係。....不容諱言的，這些年來為了維持這種安定，國民的自由，部分受到了限制，其中包括了一些高級知識份子，最容易起反感的學術自由、新聞自由不夠充分....但是國民犧牲了小部分自由、換取了一個長期安定的社會。這種安排....在我們現實處境之下，毋寧是應該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支持的。....我們絕不願意把現有的可留戀、值得珍惜的東西，放到賭台上押寶，冒著失去我們現有一切的危險推行改革。...過去一年來我們雖然在外交上遭遇到重大挫折，只要能守住經濟這一線，就能維持社會安寧，外交上的挫折，並不能夠成對我們基本生存的真正威脅，因為只要經濟能繼續成長，國民就業不發生問題，就不會造成社會不安。...所以，我們的生存發展繫於經濟，我們的經濟繫於社會安定。學生運動萬萬不能開放。」（孤影 1972b ; 1972c）
(粗體為筆者所加)

並且，他依此價值觀，發表了支持執政當局的理由：

「我走在馬路上，不用擔心有武裝強盜搶我，不用擔心碰上『前進青年』丟石頭、扔炸彈，在這個一片恐怖混亂的世界上，我的政府能讓我平平穩穩維持這樣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經十分滿足。為了繼續維持這樣一個免於飢餓、免於迫害、免於恐懼而又有些許生活樂趣的生存，我願意毫無保留的支持擁護我的政府和它的執政黨，並且呼籲我的一千四百萬同胞，每一個人都如此作。...」（孤影 1972c）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於《中央日報》連載六篇之後，隨即被《中央日報》出版了五萬餘冊（第一版 2 萬本、第二版 3 萬本），²⁵而孤影仍在《中央日報》上陸續發表相關的文章。此外，也有支持的文章持續刊載於《中央日報》。如一位以宋憲為筆名的支持文章〈誠意與謙遜——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進一解〉，便這樣提到：

「我們的領土之內，有一個偽政權，它是一個滴水不進的絕對排他的，誰要鳴放，誰就被勞改；而我們的政府是接納眾議的，是可以參與的，縱或不盡圓滿，但也充滿祥和。一個是培植鬥爭意識的，誰都不是你的朋友；一個是可以發發牢騷的，至少在親友間可以談個痛快。...凡是推進了改革，而沒有引起動亂及不安，沒有流血，這就是一種政治藝術，一種謀國誠意。...一個政府能以和諧方法調和眾議眾利而不需有人流血或忽然失蹤，有什麼不好？這也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可愛的地方。」(宋憲 1972)

²⁵ 參考〈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本報趕印應接不暇〉，《中央日報》，1972 年 4 月 21 日。

到了 6 月 13 日，孤影在〈最後幾句話〉一文中再次強調：

「我之所以反對學院派自由主義者的各項主張，不是出於不可告人的動機，而是基於十年來長期閱讀外國雜誌所得到的一項痛苦結論，那就是外國式的自由民主，完全開放的社會，擋不住邪惡勢力的滲透腐蝕，製造矛盾分化，煽動不滿對立。政府力量進入學校，保衛校園的純潔，中心思想的鼓吹，某些活動的受到限制，也許令少數人不太舒服，可是這是我們在總體戰的陰影下，為了免於被分化瓦解，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孤影 1972d)

由以上敘事可以發現，一種從「人民」為角度出發而形成、高倡經濟發展重要性的「安定繁榮敘事」，成為執政當局用來正當化其統治的意識形態。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裡，便充滿這樣的敘事特質。例如孤影不斷強調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之間的高度關聯，認為會危害社會安定的學生運動，最終將損害台灣經濟發展。而孤影以「小市民」自居，彷彿認為自身與廣大老百姓站在同一陣線，相對立於與社會脫節的大學生、高級知識份子，由此再進一步批判主張發起學生運動者不懂顧全大局、是擾亂社會秩序的「麻煩製造者」。同時，小市民的去政治化敘事最後會推導出執政當局作為「社會秩序維護者」的重要性與正當性，在這些故事裡，左翼份子、自由主義者作為「社會的亂源」，使得政府的存在和治理成為一種必要。

此外，「安定繁榮敘事」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即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共對峙的政治情勢。為何要強調「安定」價值的重要性？原因脫離不了戰後冷戰的國際情勢下，國共高度緊張的政治背景。提倡安定價值的中華民國政府正是將自己相對於「鬥爭意識」的敵對陣營（中國共產黨）而存在的。所以我們在前述敘事裡可以看到支持孤影的宋憲，其文中強調的「中華民國政府」相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便是建立在「安定」、「和諧」的統治意識形態。

表 2-1 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敘事者	小市民
時間的演進	國民黨政府統治臺灣以來
中心主題	台灣的生存發展繫於經濟，而經濟又繫於社會安定，所以我們要反對一切危害社會安定的事情（例如學運），才不會破壞現有發展的成果。
情節	開始：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與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社會安定所致。 中間：但現在卻有少數跟社會大眾脫節的知識份子、與

	年輕氣盛的大學生，根據自己一廂情願的思想體系，企圖破壞社會秩序、製造動亂和不安。 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在這個艱困的時局裡，我們應該要支持維護社會安定的政府，鞏固台灣的經濟命脈，反對任何危害這種安定的活動，學生運動千萬不能開放。

由以上表格的整理，可以發現「安定繁榮敘事」在威權統治時期，作為統治者的去政治化敘事所具有的基本特質。它透過從「人民」為角度出發的觀點，壓制了任何企圖改變政治結構的遊戲規則的可能性，將作為一種政治行動者的異議份子從政治的舞台上除去，讓政治的範疇限縮在統治者「治理」的職權之中，依此達到前述提及的：抹去可能性、妨礙行動的機會的去政治化目的。這種去政治化敘事的思維模式，最後達成了鞏固國民黨政權遷佔台灣、統治台灣的政治正當性的社會（政治）效應。

（四）改革傾向的知識份子的回應

針對《中央日報》的圍剿，《大學雜誌》這一方的知識份子也迅速回應。5月20日出版的《大學雜誌》第53期，為了回應中央日報的論戰，特別開闢針對「小市民的心聲」一文的討論專欄，其中收錄19篇回應文章及讀者來函。其中，不少言論均抨擊小市民的「苟安心態」對於建設國家的破壞性，並且澄清、強調「學生運動」的目的實為落實「青年報國」的理想，並非叛亂行為、也不是要挑起社會不安。撰寫〈開放學生運動〉並引起這場言論圍剿的陳鼓應講師，便於5月20日出版的《大學雜誌》第53期中，再度發表了〈再論學生運動〉一文，以回應孤影於《中央日報》的批評。他在此文中否定孤影將學運等同為「暴動」的說法，並強調學運是一種「民主見習」，目的在解決年輕人的冷漠。陳鼓應強調：

「學生運動不等於暴動。...我所主張的學生運動也就是主張藉著鼓舞學生的參與，培養其潛能，活潑其生氣，多方訓練其民主的生活方式，更進而使他們發揮出青年學子所應有的朝氣來貢獻於他所屬的社會與國家。...學生運動初起時，本質上都是認同於政府的，它和暴民運動本質上是絕然不相同的，假如能勇敢地面對他，開導他，並且大力地順應他的力量來改革社會，那麼這個具有氣魄的政權一定憑空獲得一股奔騰的活力，這樣不僅無傷於政權的毫毛，而且使政權更形鞏固，社會更為和諧。」（陳鼓應 1972b: 93-99）（粗體為筆者所加）

同時，1972年6月出版的《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也將《大學雜誌》第53期、54期的論戰文章匯整、付印成冊。其中台大心理系副教授、《大學雜誌》

總編輯楊國樞撰寫的同名文章〈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很精闢的標定了知識份子這一方的戰鬥位置。他將小市民等人的立場化約為「偏安」心態，對比於己方的「中興」心態；且認為與其「恐共」不如「反共」、「勝共」。算是為知識份子這一方，找到了抵抗的支點：

「偏安的心態實在是一種苟安保守的弱者心態。…他們有一種能在颱風眼中討生活的本領，便是明早天要塌下來，也不會影響他們逸樂享受的興致。他們強調「安定」。但是他們心目中的安定，是一種僵化性的安定，是一種最好什麼都不要變動的安定。為了保護這種安定，他們對革新有一種神經質的恐懼，對主張革新的人有一種強烈的反感。…其實，社會本身是一種變化性很大的動力體……所以安定不是靜止不動，不是固步自封，它是一種變化歷程中的平衡狀態，絕不會因為有目標、有計畫的革新與進步而遭破壞。…「恐共」是一種消極性的情緒，表現在行為上是「避共」。「反共」是一種積極的行為，它所指向的目標是「勝共」。偏安的心態以恐共與避共為基礎，而中興的心態則與「反共」與「勝共」相關聯，為恐共和避共的情緒所控制的人，信心很小，在有關的事務上，往往採用很多過當的防衛行為與措施，務求維持現狀的表面定靜。相反的，對反共與勝共有認識、有決心的人，不為恐共與避共的情緒所控制，所以在處理事情時，較能從中興復國的長遠利益著眼，不致因為只顧眼前而做出很多適當的防衛行動。…為了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我們需要的是中興的心態，而偏安的心態是與我們一向的國策不相宜的！」（楊國樞 1972: 54-56）（粗體為筆者所加）

另一位《大學雜誌》成員詹振國，也在〈學生運動是覺醒與向心的表現〉一文裡呼應楊國樞的論點：

「這一年來《大學雜誌》的言論，才是真正代表知識青年的心聲，是真正社會良心的表現。…二十年來，我常聽人批評台灣長大的青年太功利太自私了，只為個人的前途打算。…由於近一年來釣魚台國恥的刺激，由於我們退出聯合國的打擊，才促使知識青年的普遍覺醒，才激發了大學生們的愛國熱忱，為了保持這種覺醒，學生運動的提倡，正當其時。萬想不到此一對國家有重大利益的運動，竟被如此曲解和誤解，怎不令人傷心！孤影先生的文章，反映了一種失敗主義的意識，假如這樣的思想真被我們的社會接受，恐怕國家的前途，將被我們自己埋葬掉。」（詹振國 1972: 26-27）（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以上三段敘事內容，可以發現其中的敘事特質反映了七〇年代初因台灣政治變局的衝擊而形成的「回歸現實世代」的世代意識。針對這種不分省籍而普遍

提出的改革言論而言，激發戰後世代的要求與熱望的要素，是與其國族認同密不可分、且跨越省籍界線的世代認同。這種覺醒，使他們擺脫六〇年代戰後世代的消極抑鬱、孤獨苦悶與無力感，開始積極地從社會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來理解現狀，發展鮮明的批判意識，進而對現狀採取行動（蕭阿勤，2008: 113）。換言之，知識份子的敘事主要是針對現實政治的問題，將它們政治化、試圖打開行動的空間。在此，「政治化」的意涵意指將尚未被關注的議題「問題化」，依此打開行動和改變的可能性。

但是，對於 1971 到 1972 年之間台大校園內要求「教育獨立」和「大學民主化」為主題的種種改革要求（蕭阿勤 2008: 108；洪三雄 1993: 60-61, 83-90），以及《大學雜誌》直接提出超越校園、涉及內政革新層次的種種呼籲，國民黨執政當局仍然保持疑懼的態度。尤其是「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主張，直接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核心的「法統」象徵與制度，也許讓執政當局更感到被威脅的壓力。所以最後才會從〈開放學生運動〉一文著手反擊，並促使《大學雜誌》停刊，甚至在 1973 年開始對台大哲學系進行「人事」整頓，引發「台大哲學系事件」，十幾位教師遭到解聘（蕭阿勤，2008: 132, 138-139）。而國民黨執政當局在這個反制異議份子的過程裡，所使用的便是強調「人民」觀點的「安定繁榮」敘事，並賦予自身「維護社會秩序」的角色，以懲罰這些「麻煩製造者」，達到去政治化的作用。

第二節 美麗島事件與「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

（一）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過程²⁶

「美麗島事件」作為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可說是歷經幾年黨外組織的串聯與醞釀，在一連串偶然的歷史機遇下，基於時勢所逼、而爆發出來的政治事件。湯志傑採用社會學分析觀點，從結構與過程的共同作用來解釋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湯志傑認為，我們須把這個事件擺回到全國性反對勢力形成後，黨外人士與國民黨政府雙方互動的脈絡來分析（湯志傑 2007: 73-75）。以下我們可以藉助湯志傑的描述與分析來呈現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過程。

1975 年 9 月，康寧祥創辦《台灣政論》。此後，批判性的政論雜誌不但是反對人士藉以進行象徵鬥爭的武器，也做為他們的組織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全國「黨外」的反對陣營才逐漸成形。「黨外」陣營的浮現，同時彰顯了一個重要的轉變，即促成知識份子和傳統地方黨外政治人物的合作，走出地方的格局、實現自「中國民主黨」組黨嘗試失敗以來便不再有過的結合模式。在這樣的

²⁶ 以下的討論參考湯志傑，2007，〈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第 13 期，頁 71-128。

基礎上，到 1975 年舉辦增額立委選舉時，原來局限於地方、彼此間未有緊密連繫的反對人士，開始有了比較密切的合作關係。1977 年，為了因應五項地方公職選舉，在康寧祥及黃信介的推動下，「黨外」首次進行全島串連，並獲得空前的佳績，使得「黨外」反對陣營更為鞏固（湯志傑 2007: 92-93）。

1977 年選舉結果的成功，很大一部份原因來自國民黨推動的「派系替代政策」，破壞了之前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結盟關係，並讓國民黨—地方派系—黨外三方賽局結構產生質變，才使黨外陣營初次參選便獲得超過其實際力量的耀眼成績。另一方面，選舉時在中壢引發的群眾暴動事件同樣有不可忽視的指標性意義。它彰顯民眾已走出戒嚴統治下自我設限的心態，走出恐懼與互不信任的陰影，成為日後群眾運動的先聲。若非有此期望結構上的突破與改變，也不會有後來的美麗島事件（湯志傑 2007: 96）。

正因為選舉在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當國民黨因美國與中共建交中止 1978 年底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卻又不宣告何時恢復時，等於阻斷黨外好不容易得到的唯一參與中央政治的管道，對自覺正處於選民支持度不斷上升，勢力正日益增加的黨外來說，無疑是件無法忍受的事（湯志傑 2007: 97）。此外，一連串不可逆事件的發生，也在現實中造就了美麗島事件的爆發。例如停止選舉消息公布的當天，各地黨外候選人的事務所即遭到騷擾，並有「許信良的縣長宿舍發現五百多套警察制服」的謠言，暗示其欲製造暴亂。而在黨外決定召開「國是會議」前，警備總司令汪敬煦更親自發表談話，表示國家正處於緊急危難時刻，如有非法集會、遊行、請願的不法份子，企圖擾亂社會、顛覆國家、擅自進行各種不法活動，政府將依法採取必要措施。這些執政當局的警告措施在當時的氛圍下，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引起黨外人士的反彈，提出「台灣前途應由人民自決」的主張。此舉又使國民黨緊接著在 1979 年 1 月 21 日，以「知匪不報」的罪名逮捕了剛被推舉負責籌辦黨外下次聚會、長期以來是高雄黨外勢力領袖的余登發及其兒子余瑞言，以遏阻黨外繼續辦活動（湯志傑 2007: 103-104）。

當黨外把國民黨抓人的動作理解成全面鎮壓後，他們的心態也開始相應改變，朝向憤怒與不滿的一方傾斜，原有的擔憂害怕轉化為豁出去奮力一搏的動力。1979 年 1 月 22 日，他們在高雄縣橋頭鄉展開戒嚴令實施以來，第一次選舉場合之外的、公開的非正式示威抗議（湯志傑 2007: 105-106）。示威後緊繃的情勢和氣氛雖讓黨外收斂了好一陣子，但時日稍久、一切風平浪靜後，黨外不免也跟著卸下擔憂，認為「對抗」才是自保的策略，而「硬拼對幹」應該可以達到突破。這種態度清楚反映在後來姚嘉文和施明德所謂「暴力邊緣論」和「法律邊緣論」的主張上：藉由升高抗爭和對峙，接近暴力但不超過暴力，測試國民黨政權的忍耐限度，壓迫它為了避免衝突而做出讓步（湯志傑 2007: 107）。

於是，黨外人士不再理會出版法登記的規定，自行於 1979 年 4 月 27 日起，刊行《潮流》這份地下雜誌。至 1979 年 5 月底，《美麗島》雜誌也成立，8 月 24 日正式創刊。在黨外日益「激進化」的過程中，國民黨中特定派系，尤其是軍方及情治系統私下支持的極右派團體的挑釁或反制行動，也扮演了一個助長的角色。例如《疾風》雜誌成員於 9 月 8 日《美麗島》於台北中泰賓館慶祝創刊時，率眾前往示威、並引發衝突，但現場的警察卻未制止此一不合法的集會，尤其是示威者公然的暴力舉動。至 11 月《美麗島》多個地方服務處及成員的住處，更接連在光天化日下遭極右派人士破壞，使得衝突的態勢不斷升高。最後，1979 年 12 月 10 日，當《美麗島》的集會申請未獲許可，但仍逕自舉辦紀念「國際人權日」的演講集會時，國民黨終於動手鎮壓黨外，引爆群眾與憲警間直接而激烈的暴力衝突，史稱美麗島事件（湯志傑 2007: 109-114）。

事件爆發之後，警備總部總司令汪敬煦上將於次日（12 月 11 日）發表聲明指出：10 日在高雄市發生的暴力事件，因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警備總部決定基於嚴正立場立即依法偵辦。²⁷至 12 月 13 日，美麗島雜誌社及其各地服務處，被警備總司令部下令全面查封，並在未獲撤銷查封之前，不得出版發行。²⁸同日清晨，治安機關逮捕十四名（張俊宏、姚嘉文、王拓、陳菊、周平德、蘇秋鎮、呂秀蓮、紀萬生、林義雄、陳忠信、楊青矗、邱奕彬、魏廷朝及張富忠）在高雄暴亂事件中，涉嫌叛亂的為首份子，經軍事檢察官下令收押。²⁹在這次逮捕行動中脫逃的施明德，則在 1980 年 1 月 8 日被專案小組辦案人員緝捕。同時另有蔡有全及林弘宣也分別在 1 月 7 日被捕到案。³⁰在美麗島事件為首的嫌犯全部到案之後，警備總司令部的軍事法庭陸續進行開庭偵訊，並於 4 月 18 日宣布判決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陳菊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黃信介處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施明德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陳菊各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各褫奪公權十年。³¹

這個堪稱台灣民主發展史上最大的群眾衝突，最後便在國民黨政府的嚴懲下落幕。儘管當時黨外人士的士氣大受打擊，但長遠來看，若不是此事件引起美國施壓而公開舉行軍法大審，反對運動的理念和敘事便沒有攻佔媒體版面、讓民眾知曉的機會，因此這一波激進的群眾運動，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²⁷ 參考〈警備總司令昨發表聲明 高雄市暴力事件 政府決依法偵辦〉，《聯合報》，1979 年 12 月 12 日。

²⁸ 參考〈「美麗島」雜誌社 昨天起全部查封〉，《聯合報》，1979 年 12 月 14 日。

²⁹ 參考〈高雄事件為首份子 十四嫌犯昨晨被捕〉，《聯合報》，1979 年 12 月 14 日。

³⁰ 參考〈暴亂事件「總指揮」施明德被逮住了!〉，《聯合報》，1980 年 1 月 9 日。

³¹ 參考〈高雄暴力事件判亂案昨宣判 黃信介處刑十四年 施明德處無期徒刑 其餘六被告各處徒刑十二年 判決書強調任何台獨主張都是判亂〉，《聯合報》，1980 年 4 月 19 日。

(二) 將政治異議者污名化：「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

針對這一波群眾運動，執政者依然使用一貫的手段，透過去政治化敘事來抨擊反對人士的行動和言論。執政者所支配或具有重大影響的平面媒體如《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由於意識型態相近，在報導風格上差異不大。例如事件發生之後，他們均同聲譴責這些黨外「滋事者」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美麗島雜誌人員在高雄製造暴力事件」（中央日報）、「珍惜富足的生活安定的社會不容暴力的行為非法的手段」（中國時報）、「八人勾結密謀顛覆政府 擇定世界人權日 約集暴徒搞群眾運動」（中國時報）、「治安人員忍辱負重 各界慰問致敬 嚴正譴責暴力行為 要求依法懲兇」（聯合報）等等。此外，各報社論、政治評論與民眾投書之間的敘事類型也非常相像，其中除了包含第一節提到的「安定繁榮敘事」之外，譴責暴力、反台獨、強調民主法治、團結和愛國，則是這些敘事的重要特色。

例如《聯合報》一篇題為〈動口，應加寬容；動手，絕不應寬容！－有感於「美麗島」激烈分子在高雄製造之暴力事件〉的社論，便在美麗島事件爆發之後刊登，並強調「安定」、「繁榮」的重要性：

「「美麗島」雜誌社人員在高雄市引發的騷亂與暴力行為，對一個力求安定與繁榮的社會來說，毫無疑問的是一種巨大的破壞力量。輿論界、政府和社會大眾，在痛心之餘，都應有所反省和檢討。…今天台灣的生存條件，經濟繁榮是首要之一。輸出增加，才能在國際上多所交往，打開我們的外交出路；而國民所得增加，大家生活改善，才能更有奮鬥的勇氣和信心。如果社會秩序敗壞，必將影響投資和生產，減緩經濟發展的步幅。國家當前亟需團結與安定，這是雖三尺童子亦可理解的事，難道「黨外人士」偏偏不懂麼？而團結與安定也是今天生活在台灣的全體人民一致的要求，而「黨外人士」經常引發騷亂，猶說代表民意，究竟代表是那些人的民意呢？…更有若干「黨外人士」，利用和強調地域觀念，以挑撥情緒，分化團結，用心尤為可議。不要說先民移居台灣的歷史背景，政府遷台後，凡百措施，那一項不是為了造福全體同胞？有什麼地域之分？反過來說，如果社會亂了，國家亡了，那種災難是每一個人都要承受的，也不會有什麼地域之分。…本報廿八年前創刊時，曾向國人揭露我們的言論信條：反共、民主、團結、進步。由於主張民主，也確信民主政治是國家現代化的有效途徑，我們對一切合法的政治主張與活動，不管是在報章雜誌寫文章、發表政見、演講座談，還是用其他方式宣傳者，我們概予支持。相對的，由於主張團結，凡是分化、破壞、使用暴力、製造騷亂者，我們不僅隨國人之後同聲譴責，而且要求政府應依法處理。因為姑息的結果，帶給社會國家的可能不僅是不安，而且

是災害。…依法處理製造暴亂的激烈分子，與民主並不違背，因為暴力本身就是反民主的；與團結也並不違背，因為減少製造分裂，團結更容易達成；與民意也並不違背，因為大家需要安定，並不支持興風作浪的人。」³²（粗體為筆者所加）

兩天過後，《聯合報》又刊登了一篇題為〈依法逮捕暴亂份子 市民支持政府行動 敦請政府從嚴懲處〉的報導，要求政府依法懲治異議人士：

「各界人士昨天一致指責「美麗島」雜誌在高雄市的暴力行動，擾亂了社會安寧和秩序，他們並呼籲政府拿出魄力來，依法辦理漠視國法的少數分子。…台灣省議會議長蔡鴻文認為，美麗島雜誌這種作法太不應該，創辦不久即多次藉舉辦集會的名義，煽動民眾，這次更發生暴力事件，政府應嚴予取締，不能再任其胡作非為，以保障一般民眾的幸福與安寧。…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振甫指出，美麗島雜誌社人員在高雄集會遊行，甚至毆打憲警，置國家法治於不顧，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政府應依法處理，使人人都能遵守法律。…華愛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犯法都應受法律的制裁。大家反共團結，國家才有希望。」³³（粗體為筆者所加）

到了 1980 年，反黨外運動的《疾風雜誌》仍未停止對政治異議份子的撻伐，如一位筆名尼洛的雜誌作者在〈血與淚中的勝利——評高雄暴動事件〉一文中，以譴責暴力的方式否定黨外人士的政治訴求：

「他們在高雄所宣稱的那種集會中，不是為了什麼自由、民主、人權開放，他們口中的自由、民主、人權開放只是個幌子，因為自由、民主、人權開放中不應有火把、木棍、石頭、磚塊、柴油的瓶子，自由、民主、人權開放當中不應打人。…在高雄暴動當中，當地的群眾，多數的甚至可以說是整體的都在作壁上觀，而毆打治安人員的，是有組織、有計畫的隊伍，是從基隆、台北、桃園…等地調派的隊伍，就足以說明，這批隊伍到高雄的目的，不在於集會，而在於暴動…以打垮中華民國了。」
(尼洛 1980: 41-42)³⁴（粗體為筆者所加）

而知名律師李永然也在同一期的雜誌裡，以〈高雄暴力事件是陷阱嗎〉為題，強調法治為自由、民主的前提：

³² 參考〈動口，應加寬容；動手，絕不應寬容！—有感於「美麗島」激烈分子在高雄製造之暴力事件〉，《聯合報》，1979 年 12 月 12 日。

³³ 參考〈依法逮捕暴亂份子 市民支持政府行動 敦請政府從嚴懲處〉，《聯合報》，1979 年 12 月 14 日。

³⁴ 尼洛為一位外省籍文學作家，但不確定是否為同一人（國立中央圖書館編，1970）。

「自由民主必須以法治為基礎，易言之，在完整周全的法令制度規範下，自由民主才可能達到其最高境界。而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又須以高度的容忍與理性為必要條件，國家對於人民或人民對於國家的雙向管道，都應當建築在合理的法治限度上。…七十年前，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體系，在多少苦心血淚的前仆後繼中，才得以結束，才建立了亞洲第一個進步的民主國家…不明白的是，我們同樣走在先人流著血汗鋪砌的路上，享受先人辛苦墾殖的成果，享有民主國家人民的權利，浸浴在自由的空氣之中，居然還有人不滿？居然還有人忍心破壞？…政府國家惠澤百姓的關懷何其多？感恩圖報唯恐不及，何忍再為內憂外患頻仍的祖國頻添禍亂？」（李永然 1980: 56-58）（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以上四段敘事可以發現，第一節所討論的「安定繁榮敘事」之特質仍然出現在反制美麗島事件反對運動者的去政治化敘事中（如前述 1979 年 12 月 12 日的《聯合報》社論），並由此開展出譴責異議份子地域主義、挑起對立的敘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去政治化敘事中也開始出現與反對運動者相互競爭的「民主」論述。這種國民黨政府生產的民主敘事特別強調安定、和諧、理性和反暴力等利於統治者的文化價值，因而可說是前一節小市民關於安定繁榮敘事的新變體。這種關於民主的敘事，更站在反對暴力的立場，來指責黨外人士宣揚的民主是一種「假民主」，並用這個方式來拆解黨外人士其政治理念的正當性（如 1979 年 12 月 12 日的《聯合報》社論、與前述尼洛的文章）。另一方面，這種去政治化的民主敘事也和「法治」的強調相互扣連，認為民主須以法治為基礎、因此違法者等同於不民主（如前述 1979 年 12 月 14 日《聯合報》的報導、與李永然的文章）。國民黨所生產的這種敘事，可以整理如表 2-2。

表 2-2 民主、法治、反暴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一）

敘事者	民主法治的支持者
時間的演進	國民黨政府統治以來
中心主題	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體系，國民黨政府好不容易才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現在卻遭到少數人的破壞。暴力是反民主、反法治的，政府應該依法嚴懲這些不法份子。
情節	<p>開始：過去國民黨政府好不容易建立起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p> <p>中間：現在卻有少數不法份子製造暴亂、破壞社會安定，危害民主、法治。</p> <p>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p>
結論或解決方案	為了維護全民福祉，政府應該依法處理製造暴亂的不法份子。

基於表 2-2，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政府將民主－法治－安定－反暴力等價值串起、並發展出一種完整的敘事型態。弔詭的是，本身是尚未民主和自由化的威權統治政權，卻操持著宛如「現代民主國家」典範的政治語言。從更廣大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類似人類社會逐漸「文明化」的一般趨勢，而執政者正是運用了這種趨勢的象徵符碼做為論述資源。³⁵將暴力污名、以維持文明社會的純淨作為一種政治正確的語言，也被國民黨執政者變成捍衛自己的論述武器。而另一方面，這種敘事本身也彰顯了因國際冷戰局勢造成的文化特殊性：在敵對的共產主義國家對面、並受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權，儘管不是實行民主政治，也懂得在這種政治正確的語境中運用「民主」概念。然而，這些敘事只是一張遮掩真正的國家暴力、與不平等權力結構的「面具」而已，如前述 Bonefield 與 Psychopedus 所提及的，去政治化是一個關於建構新的國家「中立」的公眾觀感的招數（Bonefield and Psychopedus, 2000: 22）。生產這種去政治化敘事的目的，是將統治者（國家）化約為「中立」的社會秩序維護者，並期許他們恢復、維護社會秩序。

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要運用去政治化的民主敘事，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如王甫昌（1996）的研究所指出的：到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爆發為止，台灣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是「民主化」（155）。而解構反對運動的政治化敘事最好的方式之一便是用相似的論述形式、但全然相異的論述內容來進行反擊。反對暴力、強調法治的民主敘事所造成的社會效應，便是建構出街頭運動的「污名」，卻忽略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從而強化了國家合法壟斷暴力的權力。此敘事難以被拆解的正當性，造成往後的街頭運動極易落入這種敘事所建構的道德秩序之中，並依照「和平非暴力」的標準進行自我檢視，甚至自我監控。

從《大學雜誌》引發的論戰，到「美麗島事件」過後執政當局的撻伐，可以大致勾勒出解嚴前去政治化敘事元素的樣貌。從「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到「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的變化，反映出這七年來的社會變遷。當反對人士逐漸將訴求轉向「民主化」，國民黨政府也隨著調整去政治化的政治策略，以「民主」、「法治」、「反暴力」去政治化敘事建構反對運動的污名。然而「安定繁榮敘事」的特質在這種轉換過程中並未消失，此種現象反映出威權統治時期以來，國民黨政治菁英訴求安定至上的意識形態、訴諸一般民眾要求生活安定的心理，實為統治邏輯中相當核心的一個面向。

³⁵ 這一波「文明化」甚至也反映在社會運動場域裡「抗爭形式」的改變上。「非暴力抗爭」逐漸成為許多社運抗爭模式的標竿，連社運者自己都害怕被蒙上暴力的污名。陳明君（2009）的論文也進一步指出：「當文明逐漸成為社會秩序的指導方針，同時也代表了在文明不斷形塑自身成為社會行動唯一的標準時，同時也對其他社會行動進行非合理、非正當化的淨化清潔行動。」（5-6）參考《暴力與文明——暴力的「再」理解》，東海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

第三節 解嚴後浮現的敘事類型

王甫昌（1996）針對「反對運動共識動員」的研究，指出台灣反對運動挑戰執政當局的主題，是由「民主化」、轉為要求「住民自決」的本土化，最後再變成要求「台灣獨立」之全面本土化的過程（王甫昌，1996: 148）。這些主題的轉換反映了反對運動者不斷尋找足以與國民黨統治的意識型態相抗衡的意識型態，是一種調整和拉高衝突的過程。1980 年代以前，反對運動爭取的是具有濃厚體制內改革色彩的「政治民主化」，但這只是台灣過去政治結構較為表層的問題。經歷過種種挫折之後，黨外陣營逐漸意識到國民黨統治的權力基礎在於充滿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因此發展出具有（省籍）族群歧視效果的政治結構安排。而為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反對運動也開始發展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至 1986 年反對運動大量採用群眾活動策略的階段時，這種對抗性的意識形態乃開始成為訴求的主要內容（王甫昌，1996: 176）。當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日益構成統治者的威脅，這種對抗的態勢加速了民主化的發展，但同時也促使台灣民主轉型走向妥協性較低的「族群政治」。

1987年台灣政治發展重要的分水嶺——「解嚴」以後，開放了黨禁、報禁，政治制度邁向真正的民主轉型。當政黨政治成為新的遊戲規則，過去被壓抑的台灣社會問題，也才隨著權力結構的改變、逐漸顯現出來。一般研究者大都同意，1980年代中葉以後台灣的政治轉型具有「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雙重特色，這種轉變是國民黨面對反對運動的挑戰，所不得不調整的結果（王甫昌，1998: 9）。1988年李登輝繼承蔣經國在接任總統及國民黨主席之後，於1991年進行國會全面改選、並在1992年終止動員戡亂體制。另一方面，民進黨在1991年制定台獨黨綱，升高了它與國民黨在意識形態層次上對抗的程度（王甫昌，1996: 196-197）。再隨著國民黨內部逐漸引爆的省籍權力鬥爭，省籍議題有白熱化的趨勢。外省人日益質疑國民黨內主流的「本土化路線」是否會危害其族群利益，因而在1990年促成「新國民黨連線」、與1993年「新黨」的成立（王甫昌，1998: 12）。

新黨的成立不但象徵省籍議題的白熱化，同時也表示一種立基於民族主義論述的族群政治的出現。至於1990年代族群政治的歷史根源，則源於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採用的一連串政治與社會文化政策：國民黨政府大力鼓吹中華文化及中國意識、並壓制「台灣（本土）意識」及本土文化的萌芽及發展（王甫昌，1998: 10）。這些措施種下省籍分化的因子，形塑了象徵分類上「台灣」與「中國」、「被壓迫的本省人」與「壓迫者外省人」的對立關係，³⁶並在後來選舉政治的政黨動員上持續發酵。

³⁶ 歷史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許多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外省平民只是在生存上依附國民黨，與國民黨形成恩庇式侍從關係，並不構成真正的壓迫者。但在選舉政治的政治動員上，本、外省人的關係極容易被簡化成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對立。

在國民兩黨「本土化」路線的時勢潮流之下，外省人因為感受到他們與中國的文化或血緣關聯有被切斷的危機，以及對其文化與認同所繫的集體記憶及象徵構成的威脅感，因而激起強烈的防禦和反彈。1994至1995年首次北高市長選舉、與總統直選前，各種相關的論戰與政治意見便是突顯「省籍對立」、「國家認同」問題的最佳證據。而在這些論述之中，同樣也可以發現「去政治化敘事」的特質。它們大致可以被分為兩個類型：一種是延續威權統治時期的去政治化敘事，例如強調安定、繁榮、反暴力的民主敘事；另一種則是反映當時族群政治鬥爭的新敘事，其內容具有「厭惡政治」的特色。前者的生產者仍以執政的國民黨從政者為主，而後者則站在批評「新民兩黨互鬥」（批評民進黨的比例仍較高）的立場，否定、排斥省籍衝突、國家認同議題的重要性政治討論的必要。

（一）安定、繁榮與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的延續與創新

前面我們討論了 1980 年代之後反對運動路線的轉變，與晚近台灣族群政治形成過程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較具政治性的反對運動撐開了自由化的空間之外，80 年代初期湧現的自力救濟集體抗議行動，也與反對運動的力量產生加乘的作用，而促進了解嚴的發生。1987 年解嚴之後，公共行動的空間益形擴大，反對運動與民間自力救濟行動在交互激盪之下，形成了一股大眾抗爭的風潮（吳介民，1989: 175-179）。然而，剛成為國家新領導人的李登輝前總統，在應付黨內舊勢力的挑戰、以及民進黨與民間自力救濟運動施加的壓力之餘，仍將施政重點放在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體制內政制改革，如國會改革、兩岸關係定位、總統直選、開放黑名單、精簡政府組織等議題上（林柏州，2003: 95-97）。因此對於其他社會議題，便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排除在政治議程之外。

針對此時期的街頭運動，我們可以發現兩種略微不同的去政治化敘事。一種是較傳統的，強調法治、經濟發展的去政治化敘事，如《聯合報》上一篇以〈政治化暗流 混淆企業方向〉為題的讀者投書為例，這位身為設計師的民眾強調，

「台灣產業在一波一波泛政治化的暗流，混淆著企業前進的方向，啃蝕著經營者旺盛的企圖心。…解嚴以來，有無數的街頭運動，背後的原因多是政府貫徹公權力的決心不彰之餘，使民眾走上街頭，民眾在薄弱的法治觀念之下，加上泛政治化的煽情，使執法人員疲於奔命，也賠上珍貴的社會成本。…台灣的成就得來不易，大家要有惜福及和諧的心，才能保持四十幾年來打拼的成果……我希望大家用和諧的心，來經營你自己，使大家擁有一片和諧的天空，讓暴戾遠離我們，感恩才能豐富我們的有限資源。」（青雲白 1994）（粗體為筆者所加）

第二種去政治化的敘事，可以李登輝前總統依據當時的執政路線所發展出來的敘事為代表。當時的李登輝曾強調：

「政治民主、社會開放下，國內不少經濟問題受到『泛政治化』誤導，模糊了焦點，變得複雜而難解決，如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開發、環境保護、勞資關係等等，已經嚴重妨礙企業發展。…最近五、六年來政治民主化快速開展的結果，鬆動了我們的行為規範與價值體系，但唯有個人政治尊嚴受到高度肯定，人民經濟活動潛能才會充分發揮。總統表示，我國憲政改革到今年七月，所有應該做的都完成了，接下來就該建立經濟好、社會價值好、司法好、教育好的『現代化文明國家』。」³⁷（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上述的引文，我們可以看到李登輝前總統用經濟問題優先的方式，將其餘社會抗爭議題「去政治化」，可是同時又強調「個人政治尊嚴」優先於「人民經濟活動」，因此提倡憲政改革的必要性。這種將政制改革優先於經濟活動的價值順位，是他與和前述第一種較為傳統、延續過去舊有的去政治化敘事略有不同之處。李登輝的言論，顯現出他落實新國家路線時，其特殊的治理意識形態。

此外，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依然興盛。如1994年9月25日因新黨到高雄舉辦造勢活動而引發的「925暴力事件」，又引起報載一片撻伐。9月25日，新黨在高雄市勞工公園舉辦「保衛中華民國國是說明會」時，引起民進黨高雄市議員參選人詹永龍、顏陳秀鑾、戴榮聖及現任市議員梁牧養、國代周平德、顏明聖與數十名助選員等，開著七輛宣傳車進入勞工公園抗議，並在警方觀望卻不干預的情況下，釀成數百人對峙群毆的事件。³⁸在事件爆發之後，引起了各界人士生產出譴責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例如內政部長吳伯雄便指出：「嚴厲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並呼籲所有政黨、候選人應和暴力劃分界線；民眾應以選票來唾棄暴力。」³⁹而一位從商的讀者黃耀明也在其投書〈希望別出現「綠色」的威脅〉中表示：

「這次高雄衝突所造成令人怵目驚心的場面，我們很擔心這種脫序的現象將影響「沉默大眾」的生活品質，我們更擔心我們民主政治總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合理」群眾的基礎上，這種非理性的衝突，沒完沒了，終將使台灣的民主政治走向回頭路。…政治一偏離生命追求純真的本質，無疑將會把台灣人的生存推向一種毫無意義的境地。」（黃耀明 1994）（粗體為筆者所加）

³⁷ 參考〈李總統：經濟問題泛政治化 模糊焦點〉，《聯合報》，1994年9月9日。

³⁸ 參考〈新黨高市說明會發生衝突 數十人受傷〉，《聯合報》，1994年9月26日。

³⁹ 參考〈吳伯雄呼籲選民以選票唾棄暴力〉，《聯合報》，1994年9月28日。

《聯合報》的社論〈【黑白集】惡意的在場？〉更指出：

「「九二五」高雄暴力滋擾事件所股盪引申的暴戾之氣，顯然有蔓延擴大的趨勢。新黨副省長人選中山大學教授姚立明等人被暴徒圍毆成傷；新黨籍的臺北縣議員參選人一行到民進黨台北縣黨部遞交抗議書後，也被人砸破座車，並企圖予以痛毆。…如同「九二五」當天的情況一樣，這兩起政治暴力事件發生時，也有優勢警力在現場「維持秩序」；但是，公權力的執行者卻在眾目睽睽之下，聽任聚眾圍毆或打砸的人物為所欲為。…公權力「惡意的在場」，顯然比「惡意的缺席」更為可怕。我國的公權力難道真已墮落到如此地步？」⁴⁰（粗體為筆者所加）

而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水扁也同樣說出譴責暴力的論述：

「針對近日一連串暴力事件，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水扁昨天重申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說，暴力就是暴力，不能合理化，也都必須受到譴責。…民主必須從自己本身做起，而不是以打壓別人來完成民主，他會向民進黨中央反映。」⁴¹

由以上敘事可以發現，1994年「925暴力事件」發生之後，引來的是各界異口同聲一片撻伐、譴責暴力的聲浪。這些敘事反映出一種對「和平」、「理性」的民主政治的期待，這種期待相當類似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執政當局強調的「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在民主化剛起步不久的時期，它彷彿變成理想的民主社會的圖像。而且由這種敘事被各方人士（包括民進黨從政者陳水扁等）競逐生產的現象，便可發現這樣的價值觀有逐漸變成社會共識的趨勢。另一方面，如上述《聯合報》的社論〈【黑白集】惡意的在場？〉中表示對公權力執行不彰的憂心，可以反映出對解嚴之後複雜的政局、風起雲湧的街頭抗爭等種種現象的懷疑。這種情形呼應了吳介民（1989）援引Hirschman談及的「公共惡」（public evil）的概念。由於在同一個社群中，人們對於同一事物的評價往往有所差異，有的人認為是「善」，有的人則以為是「惡」。同樣的，在同一個政治社群中，政治的自由與民主，對反對運動者來說是一種「公共善」，但對於威權統治的受益者與擁護者來說，則是「公共惡」（116-118）。由於許多長久生活在威權統治之「安定」環境中的國民，以及直接間接受到威權政體保護的利益，極可能視解除戒嚴為「公共惡」。這種現象特別容易出現在自由化初期，因為舊秩序即將流失、新秩序又尚未鞏固（118）。最後，我們可以把這種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重視的價值，來形塑政治自由化初期的民主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整理如下：

⁴⁰ 參考〈【黑白集】惡意的在場？〉，《聯合報》，1994年9月29日。

⁴¹ 參考〈陳水扁：民進黨不能再和過去一樣 暴力需受譴責〉，《聯合報》，1994年9月28日。

表2-3 「民主」、「法治」、「反暴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二）

敘事者	民主法治的支持者
時間的演進	解嚴以來
中心主題	民主政治應以和平、理性為原則
情節	<p>開始：925 暴力事件以來</p> <p>中間：非理性的衝突只會讓民主政治走回頭路，民進黨不應再像過去一樣。民主政治不應使用暴力。</p> <p>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p>
結論或解決方案	在民主社會中，街頭抗爭的群眾不宜再使用暴力。政府也應適時執行公權力、懲戒滋事者。

綜合觀之，在解嚴以後、混亂的1990年代初期，可以發現過去威權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安定、繁榮、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仍在新的自由化社會中持續發揮作用，「反暴力」的民主政治逐漸變成社會共識。同時，「李登輝路線」所形塑的新的去政治化敘事，亦即強調政制改革優先、經濟發展其次，並將其他民間自力救濟運動去政治化的論述方式，加上舊有強調安定繁榮與「經濟發展」的去政治化敘事，都共同產生了特定的社會效應，形塑民眾的政治觀感。不論是新的或舊的去政治化敘事，其敘事邏輯都造成將社會弱勢議題邊緣化的效應，並提高了「拼經濟」在政治議程中的位置。這些效應一方面構成關注弱勢議題的社運群體日後更強烈的反彈，另一方面也讓「拼經濟」的去政治化敘事繼續發揮其正當性與影響力，並且在日後更加壯大。

（二）「厭惡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

除了前述談及的敘事類型之外，在此我們要進一步討論政治自由化初期與「族群政治」有關的「厭惡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這些敘事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第二、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

首先，如政大公行所教授江明修與群社執行長劉祥孚共同撰寫的〈抱黑金搞派系 扭曲真正民意〉一文便指出：

「此種將一切公共事務的討論，武斷地構築在虛幻的意識形態上的伎倆，一直是我們『台灣式』政黨政治的病象，也著實磨損了我們太多的『社會力』！…在此次立委競選的過程中，有謂選情似乎『太冷』，並怪諸經濟因素的影響使然。我們倒認為此現象毋寧是令人歡喜的，因為更可能地，民眾已經開始自覺『到底牛肉在哪裡？』開始關心起有關生、

老、病、死等民生福利問題的『真議題』，而不隨著『假議題』起舞。這種自主、自覺和務實的公民愈來愈多，也愈是成熟，『公民社會』就愈有機會形成和扎根。」（江明修、劉祥孚 1995）⁴²（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一位台南縣新營的學生張馨尹也在〈都是台灣人 分啥本省外省〉一文中認為：

「目前有線電視 TVBS 「全民開講」中座談者與民眾惡言相向掀起了一陣「本省外省情結」，輿論正待檢討之際，不料新黨赴高雄辦說明會，又再度遭當地某些民眾阻撓。殊不知在外國人眼中，台灣人是沒有本省外省之分，而只有原住民與新住民的分別。他們以民國 38 年政府遷台為界，之前皆稱「原住民」，之後就都算是「新移民」了。因此，在我們迫切需要國際認同的時刻，又何苦將自己束縛在這無謂的牢籠中呢？」（張馨尹 1994）（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政治自由化初期，日益白熱化的「省籍爭議」在 1994 年首次北高市長選舉、與 1995 年首次總統直選的競選期間，成為政治舞台上認同鬥爭的重要主題之一。這些爭辯反映了過去威權統治時期被壓抑下來的社會分化和對立，在此時期繼續產生作用。而與此現象對應的是一種否定「省籍爭議」去政治化敘事類型。例如第一段敘事對於「意識形態政治」的批判，認為這是無意義的假議題；反之，與民生福利問題相關的政治才是真議題。這樣的敘事其實反映了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強調小市民最渴望安定繁榮、平穩生活的意識形態，它同樣也是運用過去執政者灌輸的意識形態，來看待現今的民主政治、並做出批判。由江明修與劉祥孚的觀點出發，民主政治應該是民生經濟的政治，而非意識形態的政治。

至於以學生張馨尹的言論為代表，則反映出一種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這種認為台灣沒有本省外省人之分的「族群融合說」，呼應了王甫昌所觀察到的，主要為當時外省籍政治菁英沿用過去國民黨政府民族主義教育與族群分化策略的結果。它一方面化解本省人對過去政府省籍歧視的疑慮、並持續得到相當的支持，一面又凝聚外省人的絕對多數支持（王甫昌，2004: 49）。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本省籍從政者也會使用這種「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例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在該黨召開的「安成工作研討會」的輔選會議上致詞指出：「台灣的偉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度量寬大、包容力強，打著『台灣人選台灣人』口號是不了解台灣人度量的人才做得出來，這將成為危害台灣的罪人。」並表示：「誰說外省人不能當省長？台灣人不是狹隘的地域主義者，台灣

⁴² 群社又名「NPO 服務社」，為最初由文山社區大學講師江明修與其學員共同成立的社團，其社員多有非營利組織相關經驗，但社團活動較為重視內部運作。參考文山社區大學電子報：<http://tcu.taconet.com.tw/epaper/4/index.htm>

對各族群的包容力很大。」⁴³李登輝的言論一方面反擊了民進黨挑戰的省籍議題，同時也意在化解國民黨內部政爭與保守派勢力的分歧問題，目的在民進黨、新黨互鬥的戰場之外，達到吸引更多票源的效果。而且這種以「台灣人」涵括「本省人」、「外省人」的認同建構，也具有把省籍認同導向統／獨的國族認同的效應，使得「省籍議題」在愈晚近的台灣社會逐漸淡化、轉變成統／獨爭議的國族認同政治。⁴⁴這種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可以整理如表 2-4 所呈現的模式。

表 2-4 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敘事者	包容的台灣人
時間的演進	1949 年以來
中心主題	「省籍爭議」是不存在的假議題。
情節	<p>開始：以政府遷台為界，之前住在台灣的是原住民，之後的則算是新移民。</p> <p>中間：所以台灣人沒有本省外省之分。選舉政治應該關心民生福利的實質議題、而非省籍爭議的假議題。</p> <p>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p>
結論或解決方案	別再用狹隘的地域主義挑起省籍爭議。

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是台灣否定「意識形態政治」的去政治化現象相當重要的部份。複製這種敘事模式的菁英或一般民眾，從「包容的台灣人」的敘事者位置出發，迴避與省籍問題相關的政治爭論所隱含的社會矛盾，並將這類議題污名化。

以下我們要繼續討論的是與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現象相關的另一種去政治化敘事：「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首先，一位從商的讀者蔡福源於〈勤奮守法的人 都到哪裡去了〉一文裡透漏對政府的不信任：

「台灣政府不是個有能的政府，膚淺與沒有責任是最大的特徵。台灣的經濟一天比一天壞，我始終不解，以前勤奮工作努力學習的下一代哪裡去了？…現在的執政黨與以前的執政黨除了壟斷利益的人由講國語變成講閩南語之外，做的事、想的利益，差別很大嗎？今天，社會上最重要的公正法律防線如警察，甚至自身難保，升斗之民要靠誰保護？新加坡的嚴刑峻法令人討厭，但大家都一樣接受。政府背後的善意說服一般民心。老百姓相信政府的出發點肯定是由為了大眾共同的利益，而不會

⁴³ 參考〈李登輝：誰說外省人不能當省長？〉，《聯合報》，1994 年 9 月 25 日。

⁴⁴ 李登輝在 1998 年幫馬英九助選台北市長時提出的「新台灣人」論，便是用民族包納「省籍」對立、並與民進黨的民族主義論述相互競逐的例證。

像我家門前的大馬路，造成之後的另兩處馬路還要造支幹來連接。台灣不像是一個國家而像是一間店，每次選舉就是換股東的時間。人來人往時有枯榮，不變的是台灣的老百姓永遠是空有幻想受盡欺騙的一群！」
(蔡福源 1994) (粗體為筆者所加)

接著，一位中壢的會計師張媛貞則在〈政客的支票 留下債務誰扛〉文中反映對政治人物的不滿：

「我今年 23 歲，週遭的朋友大多不去投票，因為在我們眼中，國民黨病入膏肓的無能、民進黨無可救藥的暴力、新黨尚未成熟的理想。…像我們這樣的選民相信為數不少，每天看著政客們為權力吵翻天，民代及華隆立委都以：『為己謀利』取代『為民喉舌』。任誰看了都痛心。」(張媛貞 1994) (粗體為筆者所加)

同樣的，一位台北縣新店的讀者羅慰慈也在〈政見 是「政客自己的意見」〉一文裡傳達類似看法：

「選舉到好熱鬧，選民驚訝於自己竟然又重要了起來，老人們紛紛有政黨搶著發錢，價碼水漲船高；婦女也有人突然關心起來了，講座一大堆。政治人物常說：『一切為勝選！』試問，如果這群變形蟲『一切只為勝選』，那我們這些選民選你們又是為了什麼呢？」(羅慰慈 1994)

由於 1994 年台灣興起一波移民潮，而針對移民潮的解釋之一，便是指出「台灣政治現況」作為移民的原因。如台北市一位從商的讀者曹婉容在〈移民潮再現台灣人心脆弱〉裡指出：

「當前台灣移民風潮起於前些年立院亂象之延續。…兩個混亂的國會中大小醜聞只顯示台灣根本沒有民意存在。看管政府荷包、尊重民意、都是政治選舉的口號，而當選後工程軍火採購、利益輸送甚至股市風暴都和立委有關係。一直不斷發生的弊案，不見對百姓有任何交代，反倒是和民意代表扯不清，這種國家，還有希望嗎？…選舉文宣更挑起了省籍不安…台灣的不安定是事實，台灣的資源早被淘空也是事實，台灣的政治、治安環境品質岌岌可危，也已檯面化了，又怎勸人安心留下？」(曹婉容 1994) (粗體為筆者所加)

東吳大學經濟系所教授余德培也在〈拒絕被政治套牢 他們移民〉裡顯示類似的評論：

「台灣內部政治的惡質化和國際政治上的挫敗感讓大家覺得被政治套牢了。由於被政治套牢，台灣的投資環境、居住品質惡化。由於被政治套牢，台灣人民對未來生活的選擇權受到限制。…願主政者了解民心，致力於台灣內部政治的整頓、政局的安定和國際政治的再定位。唯有在政治解套後，才能留住台灣的人和錢，才能吸引更多來自國外的人和錢，共同為台灣的經濟更上一層樓而努力。」（余德培 1994）（粗體為筆者所加）

上述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充滿了對從政者和選舉政治的批評、厭惡、不信任。這些敘事認為政治人物只是追求自身選票的利益，並不是真的為民服務（如蔡福源、張媛貞、羅慰慈、曹婉容的文章），同時指出選舉政治是台灣社會的亂源（如曹婉容、余德培的文章）。這些對選舉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批評，反映出前文提及的一個現象：即在政治自由化初期，某些民眾認為解嚴和選舉政治是一種「公共惡」的情形。即使鬥爭、對抗的情境作為民主政治的常態現象，對於某些習慣於戒嚴時期「安定」的社會氛圍的民眾而言，仍極可能將民主社會的這些現象視為「不正常」，並進而質疑民主制度的運作是否真能為社會帶來福祉。而因此用過去認同的價值來評價剛剛實施不久的民主政治。此外，從這裡抨擊政客只是「為己謀利」的敘事特質，則可以發現一種第一章所指出的「馬基維利式」的政治認知在此形成。由此觀點出發，政治成為一種以公眾為名、行菁英或統治群體的自我利益之實的「黑暗的藝術」，而不再是解決集體問題、傳遞公共利益的實作。上述的種種言論，呈現一種厭惡選舉政治的敘事模式。這種模式的敘事特質與要素，可以釐析如表 2-5。

表2-5 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敘事者	厭惡選舉政治的冷漠老百姓
時間的演進	1990 年代台灣政治自由化以來
中心主題	政客和選舉政治是社會亂象的來源。
情節	開始：民主化之後，台灣社會進入選舉政治的時代。 中間：追逐權力的政客似乎只著迷於自身的利益，忽視人民的存在。選舉政治只是政客「為己謀利」的政治。 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無論主政者或人民都應該不要被政治套牢。

由以上與族群政治有關的兩種厭惡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亦即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與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我們可以看到晚近台灣社會厭惡政治現象的敘事雛型，已經在1990年代初期誕生。當族群政治的鬥爭

持續延續下去，人們對政治的反感也隨時間的累積與日俱增，讓去政治化愈來愈成為晚近台灣政治生活中相當重要的氛圍。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首先透過1972年《大學雜誌》引發的意識形態論戰、以及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所引發的批判，來探討威權統治時期的執政當局是用何種去政治化敘事，對異議份子的行動進行反動員和抵制。研究發現，國民黨政府主要運用了強調民生經濟的「安定繁榮敘事」，以及「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來對抗異議份子的政治化言論。「安定繁榮敘事」試圖把理想「政治」的涵義窄化成「重視民生福利」、「追求安定、繁榮」的政治；而「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雖然強調民主，卻是不容許公開的社會衝突（尤其是暴力衝突）、要求人民要「守法」的民主。這些敘事特質儘管主張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卻充滿了服從統治者的前提：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彷彿是人民的大家長，所謂的政治等同於「政府的治理」（行政），人民的政治參與則等同於「擁護政府的治理」。這種對「政治」的內涵建構將「異議者」排除在其範疇之外，達到將政治爭議去政治化的作用。

這些解嚴之前就奠定的「去政治化敘事」的雛型，在政治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之後並沒有消失。它們承載的象徵資源與文化、政治價值，在1990年代之後依然不斷被行動者使用。其中，強調經濟發展的去政治化敘事造成將社會弱勢議題持續邊緣化的效應；反暴力的民主敘事則愈來愈成為政治運作的共識，成為將街頭抗爭污名化的利器；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建構了省籍議題的污名，並促成重視民生福利的政治認知的再生產；最後，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造成了對「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普遍污名化，形塑出晚近台灣社會中更嚴重的去政治化現象。

若我們將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視為台灣政治民主轉型的重要里程碑，同時也是反映「台灣人認同」的政治趨勢的勝利，那麼與台灣族群政治一同發展起來的「去政治化現象」，則可作為一種與此種認同政治相對立的「反制行動」。這種反制行動的目的在反抗一個自由民主空間的出現，但卻是由於自由民主空間的出現才產生，並利用這個日漸形成的同一空間去反抗它，因此這種行動顯示出反制動員的依附性格（吳介民，1989: 118）。此反制行動之所以可能，是由於評價政治的文化實作本身就是多元的。如第一章曾提及的「文化的工具箱（tool kit）論」所指出的，文化是複雜、充滿規則的結構，構成行動者可以策略性使用的資源（Paul DiMaggio, 1997: 264-265）。解嚴雖然大大改變了政治的制度性安排，卻無法說服所有人均認同變更之後的新制度。因此造成一部份對民主轉型的懷疑者，仍然使用過去的文化象徵資源、來評價政治自由化初期的民主政治。當他們這樣

做的時候，等於一起參與了關於「政治」其規範性定義的意義鬥爭，因而成為一股影響台灣政治變遷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 反對政客：2006 年反貪腐倒扁運動

第一節 2000 年以後的厭惡政治現象

2000 年 3 月 18 日，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發生了首度的政黨輪替。這是解嚴以來民進黨首次贏得的總統大選。然而當時民進黨的得票率只有 39.3%，依然輸給國民黨（23.1%）和無黨籍參選人宋楚瑜、張昭雄（36.84%）相加起來的票數。⁴⁵由藍營（國民黨、無黨籍）與民進黨的政黨得票率比例，顯示各政黨支持者分配的政局結構其實並無太大改變，唯一的差異只有朝／野的易位。另一方面，國民黨敗選之後，李登輝辭去黨主席的職務、並在 2001 年成立台聯黨（台灣團結聯盟），台灣政治版圖上的藍／綠政治陣營對立逐漸成形。而對社會運動者而言，由於失去了過去與民進黨的共同敵人——國民黨，因此也必須面對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全新關係。

由於政局的緊張程度升高至前所未有的態勢，面對這種幾乎無解的衝突，使得愈來愈多人開始加入生產去政治化敘事的行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社運界自我定位為「左翼」的論述。例如 2003 年 8 月由簡錫堦發起、成立的泛紫聯盟（又稱公平正義聯盟），便是厭惡藍綠政治、強調照顧弱勢群體之左翼路線的例證。⁴⁶在簡錫堦的宣言中，厭惡選舉政治的理由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感到「被民進黨背叛」，⁴⁷認為國、民兩黨均為一丘之貉的「資本主義政黨」，並沒有扶持弱勢族群的公平正義思維。同時，他也批評民進黨在選舉時往往操作族群議題、分化族群和諧來贏得選票。

類似的論述也出現在 2003 年 10 月宣稱為進步左翼刊物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所發表的〈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一文之中。文中指出台灣政治如同「一只潘朵拉盒，飛出來的是一種叫做選舉的鬼魅，它的邏輯和精神是毫無節制的權力爭奪……這種政治所召喚的從不是公民的思辯行動，而是國族／民粹／省籍身份的認同氣鼓……在這種（非）政治的架構下，中下階級一般大眾對他（她）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真實痛苦與煩惱，例如，2000 年以來台灣社會各種重要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不公的惡化，有苦難言。」面對此情境，台社編委會提出的「超克後威權計畫」是「揚棄各種形式的私政治，並進而要求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兩岸關係等重大議題的公共化（即，廣大公眾的持續且深入的論述干預）；它至少涵蓋四個目標：政治公共化、社會正義、多種身份認同的平等承認、以及兩岸和

⁴⁵ 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

⁴⁶ 簡錫堦當時為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⁴⁷ 「阿扁今天所以能執政，那是收割台灣民主運動所激發的民間力量，其中，是弱勢族群哀哀無告所累積的痛苦呼聲。然而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卻背棄對弱勢人民的承諾。」參考簡錫堦，〈重回體制外改革〉，《中國時報》，2003 年 8 月 11 日。

平。」⁴⁸2004年1月11日，在激烈的總統大選前夕，侯孝賢、林懷民、簡錫堦等六、七十位文化界、社運界與學界更首度大規模串聯籌組「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發起「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視」宣言連署，並在其後也發動兩波訴求族群和解行動，避免選舉激化族群對立。⁴⁹同一個月底，〈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等民間團體也發起「百萬廢票聯盟」，呼籲民眾以投廢票的方式表明對於選舉政治的不滿。⁵⁰

左翼社運行動者生產的去政治化敘事，在相當的程度上，延續了1990年代否定省籍爭議問題存在、以及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形式，藉此表達對2000年後持續發展的「族群政治」的不滿。但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社運者此時的行動立場，同時也是針對1990年代強調經濟發展、與厭惡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採取的反制。因此這些自我定位為左翼的社運者的敘事所企圖再政治化的，也就是過去強調經濟發展的敘事欲去政治化、邊緣化的社會不平等議題。至於左翼社運者批判民進黨政府的原因，則可參考吳介民（2002）針對首次政黨輪替之後、社會改革運動困境的研究。他指出：陳水扁的勝選以及政權和平轉移，象徵反對運動二十年來的主要訴求—自由民主政體的建構—已經大致完成。此後，在理論上民進黨政府有兩個不同、但並非本質上不相容的努力方向。一個是落實政權的本土化與追求台灣國際地位的保障，另一個方向則是發展新的社會政策綱領，深化社會改革的議題。然而，局勢的演變使新政府的精力集中於前者。2001年底的國會改選，同時催化了民進黨與李登輝領導的台聯之間的準結盟關係，以及代表舊勢力的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合作。「本土」與「非本土」之爭，似乎正在促成一個「保衛本土政權」的新聯盟，而將政局推向第一條道路（吳介民，2002: 191）。此種路線選擇，使得民進黨政府與社運人士的關係逐漸惡化。

2004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以 50.11% 的得票率，小贏得票率 49.89% 的國親兩黨。⁵¹此種差距不大的選舉結果、再加上選前爆發的「三一九槍擊案」，讓藍營從政者與其支持者對選舉結果產生質疑。國親兩黨在凱達格蘭大道發起「選舉不公」的街頭抗議。其訴求在於「要真相、拼公道、救民主」，歌手羅大佑更在現場唱起「思想起」，高喊著「不分藍綠、只求是非黑白」。⁵²不久之後，4月2日的中正紀念堂廣場（舊名）上，更出現了八名學生發起的「孤挺花學運」，針對選舉結果的質疑，他們「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並且也不斷強調自身行動「不分藍綠」。不過絕食行動的總召集人陳政峰後來被發現曾在國民黨支持下、

⁴⁸ 參考初稿線上版：http://intermargins.net/taishe/20031004_draft.pdf

⁴⁹ 參考〈族群平等聯盟今成立〉，《中國時報》，2004年1月11日。就像解嚴後社運界的諸多「聯盟」一樣，當時雖然提出口號式的呼籲，但後來此一行動聯盟也是不了了之。

⁵⁰ 參考〈拒吃爛蘋果 百萬廢票聯盟推候選人〉，《聯合晚報》，2004年1月31日。

⁵¹ 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

⁵² 參考吳易叡，2005，《焦土之春之 2004 年備忘錄》，87,99。

參選台大學生會長，而副總召陳信儒則是親民黨全委會青年代表。⁵³在此，抗議行動是誕生於因 319 槍擊案所產生的政治不信任的社會氛圍、以及國親兩黨對於選舉結果的不接受，而進一步造成對整個民主制度的質疑態度。在此的去政治化敘事延續了 1990 年代否定「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類型，並發揮了賦予抗議者自身行動的正當性的作用。而這股不滿的能量在抗爭無效的落幕之後，緩緩蓄積成為下一波抗爭行動的動力。

綜合觀之，台灣當代的去政治化現象在解嚴前至 1990 年代時就已有雛型，去政治化敘事並非在晚近台灣社會忽然出現，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蘊釀，伴隨著台灣社會的族群政治、國家認同問題的激化而逐漸茁壯。至於晚近（2000-2004 年），台灣社會中去政治化敘事的主要生產者，亦即藍營從政者、與左翼社運人士，則是基於不同政治動機而生產著相似的去政治化敘事。他們的共同點為均使用否定「選舉政治」、以及與「國族（族群）認同政治」有關的去政治化敘事，但兩者要再政治化的內涵則有所差異。左翼社運人士特別重視社會分配正義的議題；藍營從政者要強調的政治議程此時仍然模糊，必須要透過接下來 2006 到 2008 年三年之間的事件研究，才能有比較清楚的了解。所以，為了更具體掌握晚近台灣社會的去政治化現象，我們將從「事件」入手。由於特定政治事件所引發的衝突和爭議，能相當集中、清楚的反映人們對政治的態度與認知。所以對特定政治事件與爭議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了解台灣晚近政治變遷中特殊的去政治化現象的樣貌。我們將探究由事件生產的各種敘事，如何反映、建構人們的認同和認知、推動社會行動，如何成為台灣社會政治論述的一部份。本文挑選 2006 到 2008 年三年之間發生的三件重要政治事件：反貪腐倒扁行動、中正紀念堂更名與復名事件、陳雲林來台風波，分別在本章與第四、五章中進行較深入的討論。

⁵³ 參考吳易叡，2005，《焦土之春之 2004 年備忘錄》，134-135,141。

第二節 「貪腐案」的建構與「倒扁運動」的經過

美國社會學家 Jeffery C. Alexander 曾指出：「醜聞並非天生，而是被製造出來的。」(2008: 277) 這句話源自他在〈水門案：一場民主儀式〉一文中，從「建構論」的角度描述水門案如何經歷一連串文化過程、成為一個震驚全國的醜聞，最後並透過一場民主驅逐儀式（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持的彈劾聽證會）才解決這場根本的社會危機。Alexander 試圖提醒我們的是「形成醜聞的條件」：並非所有事件都會演變成像水門案一樣的危機。(Alexander, 2008: 254,268,277) 由此角度也很適合用來觀看 2006 年前第一家庭涉嫌捲入的收賄、內線交易行為。在還沒有掌握貪瀆的確切證據、司法檢調程序也未完成的真相不明的情況下，前總統陳水扁與第一家庭已經成為恐怖的象徵污染源，並向與其有關的人、事、物繼續擴散。這種情況如何可能？這種對民主制度與執政者不信任的情緒又為何是在 9 月的「反貪腐倒扁運動」找到宣洩的出口、而不是國親兩黨從立法院可能發動的倒扁？以下便要一一討論這些問題，以及它們和去政治化現象的關係。

（一）一個「去政治化運動」的形成與定位

施明德發起的倒扁行動並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從 2006 年 6 月，第一家庭貪腐案開始作為新聞焦點時，國親黨團就已經在醞釀倒扁行動。6 月 5 日國民黨的內部會議決議希望推動罷免案，並將與親民黨南北合擊、發動全面促扁下台活動。此舉可稱為馬英九拍板的「倒扁三部曲」：罷免、倒閣與群眾活動。馬英九並且強調希望倒扁變成「全民共識」，不要淪為藍綠對決。⁵⁴ 不過，隨著罷免案未過關、台聯又正式加入支持倒閣案的一方，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國民黨高層擔心李登輝會命台聯以支持立法院長王金平組閣為前提要求倒閣，這樣一來會讓國民黨進退維谷，因此國民黨對倒閣案持保留態度，原先要和親民黨結盟的倒扁行動也立即踩煞車。⁵⁵ 另一方面，有鑑於社會觀感，國民黨內高層指出：「由於近日朝野對峙、藍綠對決氣氛太嚴重，許多企業界人士、中產階級向馬英九反應，不希望再看到藍綠對立，讓台灣社會空轉；更不希望因為藍綠混戰，讓陳水扁總統與第一家庭弊案『暎混過關』…。」國民黨於是決議將基調轉為中產階層期待的溫和、中道路線，「與民休養、與民生息」，並承諾未來不再舉行大型街頭活動。⁵⁶

56

⁵⁴ 參考〈國民黨終於定調 馬拍板 罷免陳水扁〉，《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6 日；〈國親南北合擊 要扁下台〉，《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7 日；〈「領導人不對就換」李登輝一句話 催化馬要全民倒扁〉，《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7 日。

⁵⁵ 參考〈倒閣結盟壯大 第三勢力蠢動〉，《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8 日；〈藍憂李提「挺王組閣才支持倒閣」〉，《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28 日；〈下一步怎麼走？國親分流 倒閣 VS.不上街 宋馬不同調〉，《工商時報》，2006 年 6 月 28 日。

⁵⁶ 參考〈罷免表決後 回應中產階層期待 國民黨回歸中道路線〉，《中國時報》，2006 年 6 月 25 日。

其實由國民黨高層對於發動倒扁會導致藍綠對決、挑動社會不安的擔憂，便可以看出這些從政者在這件事情上掌握了「民心的向背」。台灣社會從 1990 年代以來的政治對立，已經讓人們非常反感。對國民黨而言，如果倒扁是由藍營政治人物發起，勢必又會被指控為藍綠鬥爭，如此一來更無法達到「全民倒扁」的目的。因此國親兩黨中斷剛剛醞釀起來的倒扁聲勢，實為政治考量的結果。

政治人物的止步，讓社會－文化場域的行動者接下第二波向陳水扁總統施壓的棒子，即所謂「親綠學者」和社運人士共同發起的「七一五聲明」。聲明內容除了籲請陳總統承擔政治責任自行下台之外，更期盼以公民對話提升台灣民主品質。⁵⁷這一波「七一五聲明」的意義在於：在政治場域之外，開啟向執政當局施壓的空間。要求陳總統下台負責不再是在野黨、從政者的專利，而也可以是知識份子、其他行動者、甚至任何公民的訴求。再者，根據他們「中立」的身份，這是比涉及從政者政治利益的任何行動更加有正當性的行動。⁵⁸因此自此之後，我們可以看見類似身分的人也不斷跟進，如民主行動聯盟召集人、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呼籲學界組成「全民倒扁聯盟」，發起的「秋鬥阿扁」；至於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更是一個號召「非政治人」倒扁的絕佳例證。⁵⁹

8 月 11 日，施明德開始發起一人一百元的「百萬人倒扁行動」，目標是募款人數到達一百萬時、發動群眾在總統府前靜坐。⁶⁰12 日，「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總部」則正式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宣示啟動。不少過去挺扁的學界、醫界、律師界、藝文界等代表人物，群聚二二八公園發表演說，並高舉倒豎的拇指與民眾高喊：「阿扁下台！」。⁶¹同日台北市長馬英九也表示，施明德的倒扁行動他將全力支持，先前國民黨連署倒扁的人數已經超過二百卅萬，當施明德發動百萬人倒扁活動，國民黨的二百卅萬人也一定會加入；而曾經在提出罷免案時於立法院前靜坐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說，希望大家支持施明德，讓陳水扁下台。⁶²對此，施明德於隔日強調，歡迎馬英九、宋楚瑜捐出一百元，但馬宋身為黨主席，並不適合動員國親兩黨加入人民倒扁運動，否則只會導向藍綠、統獨對立。⁶³針對施明德的回應，馬英九於 15 日親自下令，為避免民進黨惡意將倒扁運動曲解為藍綠對決或族群對立，減損施明德倒扁運動的正當性，國民黨不宜以黨的名義介入，但黨中央鼓勵黨員以個人名義踴躍參加。⁶⁴由施明德和國民黨高層的互動，我們

⁵⁷ 參考〈親綠學者、社運人士七一五聲明 吳乃德：扁下台為民主立典範〉，《中國時報》，2006 年 7 月 16 日；〈親綠學者呼籲：扁下台 不然開除黨籍〉，《中國時報》，2006 年 7 月 16 日。

⁵⁸ 這裡所使用的「政治」近似於「政黨」的涵義，也作為一般社會大眾對政治的理解。

⁵⁹ 參考〈黃光國提「秋鬥阿扁」 扁不下台 絶不終止〉，《中國時報》，2006 年 7 月 25 日；〈賀德芬：不期待陳總統改變 串聯各界倒扁 施下波動作更大〉，《中國時報》，2006 年 8 月 10 日。

⁶⁰ 參考楊渡（2006）。

⁶¹ 參考〈各界齊聚 228 公園聲援倒扁 阿扁下台！ 群情激昂〉，《中國時報》，2006 年 8 月 13 日。

⁶² 參考〈施發起倒扁 馬宋支持〉，《中國時報》，2006 年 8 月 12 日。

⁶³ 參考〈施籲馬宋勿動員 免藍綠對立〉，《中國時報》，2006 年 8 月 13 日。

⁶⁴ 參考〈馬英九：不宜以黨名義加入〉，《中國時報》，2006 年 8 月 15 日。

可以看到倒扁行動的形象和定位，可以說是兩方合作的結果。⁶⁵施明德發起運動、國民黨隨後跟進，兩方都相當清楚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操作」是對彼此最有利的方式。在這裡，醜聞的建構之所以可能，便是建立在發起者構築的象徵框架之上。在這個意義的世界裡，有一組組二元對立的符碼在作用。一邊是中立、純潔、去政治、充滿道德理想的「善」的象徵，對立著充滿政治目的、貪腐、不潔的「惡」的象徵。醜聞在這種象徵結構中成形，並落入惡的那一邊。

而對於宣稱不分藍綠的百萬人倒扁行動，民進黨人士有幾種反擊的方式。第一種是強調遵守司法程序、釐清真相的重要性，反對在陳總統沒有違法、也沒有證據證明陳總統涉及女婿親家弊案前，用所謂的「道德訴求」要求陳總統下台。代表人物有陳菊、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的回應。⁶⁶其次即強調「國家社會安定」的政治敘事，例如前台中市長張溫鷹的說法。⁶⁷第三種則是認為倒扁等於「倒台」，並拿出「護台」、「挺台灣」的旗幟來反制倒扁，如民進黨台南縣黨部、媒體人汪笨湖、民進黨主席游錫堃、牧師高俊明、市議員簡余晏等人的反擊。⁶⁸比較負面的則有批為「政治鬥爭」、或對施明德展開人身攻擊的污名式操作，發動者有施明德前妻艾琳達、陳麗珠，高俊明牧師，民進黨立委王世堅、林國慶等人。⁶⁹至於前總統陳水扁個人的回應，除了也強調「護台」的重要性之外，也重申將堅持推動「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落實社會公平正義」兩大路線，「增加投資台灣、創造就業機會、拉近城鄉距離、縮短貧富差距」四大施政目標，及「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催生台灣新憲法、追討國民黨黨產」三大運動。並指出會依法做完任期。⁷⁰而為了反制倒扁，民進黨也在基層發起「公投追討國民黨黨產」運動。⁷¹這些議題固然有其重要性，但在這個時候提出，於是被批評者認為有推託之嫌。這反而使得「貪腐」作為未被澄清的汙染源，隨著這些議題的爭論而更加擴散。在這種情形下，民進黨從政者的回應不僅少有幫助，還讓純淨／不潔這種二元結構的情勢愈演愈烈。

⁶⁵ 施明德在他撰寫的《總指揮的告白》一書中，也有提到「施馬密會」所商談的內容。

⁶⁶ 參考〈倒扁難服眾 陳菊促施尊重司法調查〉，《自由時報》，2006年8月12日；〈准許二十四小時連續的「倒扁」 蘇揆：北市府有責承擔〉，《自由時報》，2006年8月24日。

⁶⁷ 參考〈張溫鷹：國家社會安定最重要〉，《自由時報》，2006年8月20日。

⁶⁸ 參考〈反倒扁 兩路人馬今嗆施護台〉，《自由時報》，2006年8月26日；〈挺台灣、顧大局 南嘉鄉親誓師〉，《自由時報》，2006年8月27日；〈游批倒扁「倒閣倒黨倒台」〉，《聯合報》，2006年8月20日。

⁶⁹ 參考〈綠營痛批施明德搞政治鬥爭〉，《中國時報》，2006年8月16日；〈「一直接受藍軍資助」艾琳達痛批施墮落〉，《自由時報》，2006年8月18日；〈施明德前妻 公布施求饒衣 陳麗珠：內有施以她名義手擬2封陳情信 歡迎比對筆跡〉，《聯合報》，2006年8月24日；〈綠委爆：陳由豪餽贈施明德豪宅〉，《自由時報》，2006年8月22日。

⁷⁰ 參考〈扁強勢反擊 「絕不倒下」〉，《聯合報》，2006年8月20日；〈忍耐是有限度的 會依法做完任期〉，《聯合報》，2006年8月21日。

⁷¹ 參考〈反倒扁 綠營發起公投討黨產〉，《中國時報》，2006年8月19日。

8月21日，募款的承諾金已累計逼近一億元，施明德於8月28日宣布倒扁總部將在9月1日進駐凱達格蘭大道，開始帳棚搭設等部署工作，並將9月9日定為正式進場靜坐日。⁷²8月29日，倒扁總部發言人賀德芬表示，為避免「倒扁」與「挺扁」的對立，未來的行動將不以「倒扁」為主訴求，而強調百萬人「反貪腐」行動，完整名稱是「反貪腐倒扁行動」。⁷³另一方面，由於此行動並未確定結束時間，中央和地方對於「倒扁活動逾時」的處理問題爭論不休。根據台北市警察局的透露，台北市政府這次係罕見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等相關權限，基於維護首都重大治安的考量下，主動提升層級，將處理倒扁靜坐活動的主導權，由市警局轉移到市政府手上，意即由馬英九定奪。並在主辦單位同意「和平、安寧與不影響交通」三項但書下，開放倒扁陣營申請時期內二十四小時的靜坐路權。⁷⁴對此決議，謝長廷批評馬英九媚俗、耗費社會成本。民進黨市議員顏聖冠、藍世聰、徐佳青等人也抨擊馬英九知法玩法、越權包庇倒扁群眾。⁷⁵

（二）熟悉的對抗與運動逝亡

到了9月9日正式靜坐第一日，約有數十萬民眾湧進凱達格蘭大道，現場規劃凱達格蘭大道為靜坐區、其他為動區，由總指揮、副總指揮等人帶領民眾繞行范可欽提出的「納斯卡線」。⁷⁶同日也成立由施明德為首的「六人決策小組」，以決定運動方向與靜坐活動進退。總部並再擴大副總指揮群陣容，泛藍色彩強烈的立委林郁方、台北市議會副議長李新都入列。⁷⁷持續靜坐六天至9月15日時，施明德更發動「螢光圍城」活動，晚間七點由凱達格蘭大道出發，經衡陽路、中華路、和平西路、重慶南路、羅斯福路等路段，全長約5.5公里，最後返抵台北車站。⁷⁸

針對這些紅衫軍的大型造勢活動，⁷⁹親綠社團「台灣社」也申請到9月16日凱道的路權，舉辦名為「我們在向陽的地方」之大型群眾活動，旨在「愛台灣、

⁷² 參考〈承諾金預計今破億 活動最快8.27 最晚9.9 靜坐前3天 發出動員令〉，《中國時報》，2006年8月22日；〈施明德今宣布 倒扁9·1進駐9·9靜坐〉，《中國時報》，2006年8月28日。

⁷³ 參考〈避免對立 倒扁改名反貪腐〉，《中國時報》，2006年8月29日。

⁷⁴ 參考〈馬主導決策 靜坐可望24小時開放〉，《中國時報》，2006年9月2日。

⁷⁵ 參考〈批24小時靜坐 謝轟馬郝〉，《中國時報》，2006年9月6日；〈民進黨議員批 知法玩法〉，《自由時報》，2006年9月3日。

⁷⁶ 參考〈人民力量 集結凱道 倒扁靜坐今登場〉，《中國時報》，2006年9月9日。

⁷⁷ 靜坐現場總指揮：施明德；決策小組：施明德、陳耀昌、賀德芬、林谷芳、魏千峰、王麗萍；總幹事：魏耀乾。執行副總指揮：簡錫堦；副總指揮群：王麗萍、呂台年、李永萍、李新、林郁方、高金素梅、倪重華、許博允、張茂雄、張富忠、盛治仁、曾信超、詹澈、魏耀乾、韓國瑜、羅淑蕾、蘇盈貴。參考〈方向與進退 六人決策小組作主〉，《中國時報》，2006年9月10日。

⁷⁸ 參考<http://blog.roga.tw/2006/09/16/313>

⁷⁹ 以「紅色衣物」作為參加活動的顏色主要為范可欽的意見。根據他的說明，由於藍、綠、橘色衣服都不能穿，「白色」太像辦喪事、黑色又顯得「烏鵲」，因此擇定有喜事象徵的紅色。參考〈賀德芬開炮王麗萍反駁 倒扁總部為創意齷齪〉，《中國時報》，2006年9月2日。

護民主」，並受到民進黨的支援。⁸⁰自此之後，紅綠對立有激化的現象，根據反貪腐倒扁運動的議題建構，台灣社會有逐漸分裂成倒扁／挺扁二元對立的趨勢，愈來愈回到一種熟悉的對抗模式（只有顏色不同）。9月18、19日在高雄和台南分別發生兩造人馬衝突，9月29日開始的環島倒扁——「遍地和平開花」活動，過程中也引發了一些零星衝突。⁸¹再加上螢光圍城之前，倒扁總部就放出不排除考慮在十月發動大罷工的風聲，引起企業界很大的反彈，認為發動罷工將會對台灣產業與投資環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⁸²政治界和許多民眾也對此抱持否定的態度。隨著社會支持度的日漸降低，在10月10日「天下圍攻」之後，反貪腐倒扁運動漸漸走向尾聲。

10月10日的「天下圍攻」引來50萬人⁸³（警方估計）的參與，但隔日警方便出動3000名鎮暴警察強制驅離忠孝西路上近百名的倒扁群眾，內政部並向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施壓，要求不得再核准倒扁活動的申請集會遊行。台北市長馬英九對此舉則指出「尊重中正一分局的決定」。⁸⁴之後警方廢止倒扁總部原先申請核准的14至27日在凱道24小時集遊，但在台北車站南廣場的反貪腐靜坐則獲准到11月1日。11月4日清晨，警方又動用優勢警力驅離凱達格蘭大道上靜坐的200多名紅衫軍，其中包括施明德與其妻子。此時倒扁運動已是風中殘燭，馬英九市長的態度也轉為強硬，以「倒扁運動不合法」作為不再支持的理由。⁸⁵最後，反貪腐倒扁運動便在群眾散去、議題失焦（失溫）的情境下畫下句點。

儘管倒扁運動最終仍未達成要前總統陳水扁辭職下台的目的，但台北地檢署快速偵辦，在11月3日將吳淑珍、馬永成、林德訓、陳鎮慧四人起訴（陳水扁依憲法刑事豁免權卸任後由檢方追溯）。⁸⁶對運動參與者而言，這也不能說是毫無成果。某種程度上，這象徵被擾亂的社會秩序重新恢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司法單位起訴的時間晚於反貪腐倒扁運動的發生時間這件事情來看，足以說明醜聞的建構不是建立在「真憑實據」之上。趙建銘涉嫌內線交易的「台開案」、與第一家庭涉嫌的「國務機要費案」（台開案在先、國務機要費案在後）原先是並行發展的案子，當法務部長施茂林於2006年6月6日表示台開案即將偵結，

⁸⁰ 參考〈台灣社916護扁 民進黨相挺〉，《中國時報》，2006年9月6日。

⁸¹ 參考楊渡（2006）。

⁸² 參考〈倒扁揚言發動全國罷工，工商團體口徑一致反對：不管阿扁倒不倒 只要經濟顧好〉，《中國時報》，2006年9月12日。

⁸³ 倒扁總部估計150萬人。參考〈空城計破攻！總部估150萬人 警估50萬〉，《聯合報》，2006年10月11日。

⁸⁴ 參考〈3000鎮暴警力出動 抬走87人〉，《聯合報》，2006年10月12日；〈倒扁集會 內政部要求不得再准〉，《聯合報》，2006年10月12日；〈馬：尊重中正一分局〉，《聯合報》，2006年10月13日。

⁸⁵ 參考〈馬：再多自由 也不能濫用 請群眾給施明德掌聲 但仍堅持要合法〉，《聯合報》，2006年11月6日。

⁸⁶ 參考〈國務機要費案起訴 扁珍共犯貪污 扁刑事豁免卸任追訴 吳淑珍等4人起訴〉，《聯合報》，2006年11月3日。

國民黨與親民黨旋即於次日表示可能推動罷免或倒閣。⁸⁷近六月底，國務機要費案才正式登場。然而早在國務機要費案登場之前，平面媒體已經開始用「貪腐案」這種充滿道德意義的詞彙進行描寫，並在之後與從政者、社運人士、學者一起參與了醜聞的建構。最後使得陳水扁與第一家庭成為一種污染源，即使在倒扁運動落幕之後，仍然持續對國內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三節 多重去政治化敘事的鬥爭

(一) 四大報媒體報導風格

上一節已討論了反貪腐倒扁運動從形成到結束的過程。其中，資料來源來自四大報（中時、聯合、自由、蘋果）的報導。儘管各家報社因政治立場的歧異，影響媒體書寫的觀點，甚至也有選擇性報導的情形，但透過四報全部瀏覽的過程，資訊可以互相截長補短，最終可達到對事件整體較為完整的認識。

關鍵字：倒扁			
搜尋範圍：2006年6月1日-2006年12月31日 ⁸⁸			
中時報系	聯合報系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2772 篇	3844 篇	1448 篇	1065 篇

相較其他報紙而言，中時、聯合報系在運動初期至中期（8月11日-9月16日）是採取認同的態度來報導運動，其報導篇幅量均比《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多出很多。⁸⁹但在中期以後，這兩個報系對於運動的立場卻有顯著轉折：負面報導增加，紅衫軍開始被描繪成挑起社會不安的「麻煩製造者」。相比之下對運動始終採取反對立場的《自由時報》，以及用看熱鬧、嘲諷觀點進行報導的《蘋果日報》，在報導風格上則較為一致。

中時、聯合報系在運動中後期立場的轉折，正好提醒我們一種習以為常的政治常識需更加細緻。這種常識認為各大報均有不變的政治立場，它們各擁其主、並在政治／社會事件發生時，會自動倒向所屬的陣營。但這種看法落實在事件分析時，就無法說明我們所發現的立場轉折現象。究竟造成此現象的動因為何？要找出那條隱藏其中並牽動變化的因素，恐怕仍要回到事件本身的敘事元素來進行探究。我們必須先知道不同敘事類型的轉折，才能去解釋引起這種轉折的動因。

⁸⁷ 參考〈施茂林：台開案最近會偵結〉，《中國時報》，2006年6月6日；〈國親南北合擊 要扁下台〉，《中國時報》，2006年6月7日。

⁸⁸ 由於國親兩黨醞釀的倒扁始自2006年6月，故以6月作為時間的搜尋下限。

⁸⁹ 8月11日施明德發起一人一百元的「百萬人倒扁行動」，作為運動的開始。至9月15日螢光圍城、及9月16日民進黨舉辦「愛台灣、護民主」的群眾造勢活動為止，由於之後漸轉變為紅／綠對立的政治局勢，故以此時間點為中間的分界。

如 Ronald N. Jacobs 的敘事社會學研究也指出，新聞中有許多相互競爭的敘事，而分析不能假定新聞文本有任何敘事一貫的種類，社會學家必須研究其中的斷裂、矛盾，並決定它們和事件、社會背景有何關聯（1996: 1244-1245）。

就反貪腐倒扁運動而言，在四大報的投入之下，透過打斷正常播放頻率（某段時期之內幾乎只有紅衫軍的新聞）、「專業媒體人」的重複分析（如各式各樣的政治評論、特稿）、以及對其中重要的行動者放大檢視等過程，讓運動本身被建構成一個「媒體事件」（media event）。⁹⁰然而媒體工作者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的評論或觀點同時也反映著許多民眾的想法，如同政治人物也會猜測民心的內涵，並透過各種政治敘事說服民眾一樣。同一種敘事類型可能涵括了不同社會身分的人群的想法，而探討不同敘事類型的鬥爭有助於理解政治與文化的衝突，也才能釐清最核心的去政治化現象，並解釋社會的變遷或延續。以下我們便要從事件的過程和轉折，討論不同類型的去政治化敘事之間的關係。

（二）運動初期－中期（8月11日－9月16日）的敘事鬥爭

前文已談過反貪腐倒扁運動從醞釀到開始以後，其作為「去政治化運動」的定位，是如何在政治局勢中成型。這裡要進一步分析的則是運動發起者、及共同形構（參與）這個議題的人，是使用了哪些「去政治化的敘事」來建構具有說服力的象徵結構，以吸引人們的支持和參與。再者，即使這樣做、這樣說了，仍有另一股反對倒扁運動的勢力進行著反動員，這些反對敘事中信仰的象徵結構又是什麼？上述的問題，是這個部份要探討的內容。

1. 「超越藍綠」的去政治化敘事

根據資料的整理，反貪腐倒扁運動發起者、與支持者所生產的敘事特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強調運動的「超越藍綠」、無政黨色彩（中立）；另一種則與前者是一體兩面，即將自身政治性的抗爭行為化為「道德運動」的特質。

首先，我們可以來看倒扁運動發起人施明德試圖動員民眾參與而撰寫的〈民主進步黨還是民主退步黨——百萬人民倒扁日記〉一文中的去政治化敘事：「我將首先號召的人民，就是你們曾經在『百萬人民站出來』中號召過，現在感覺被你們欺騙了，不想再被牽著鼻子走的人民。其次才是在政黨惡鬥中，糊裡糊塗被劃歸藍營的人。最後我將號召血液中有藍有綠，既無懼大陸壯闊更嚮往海洋雄偉的世界公民，那些厭惡偏狹悲情的台灣人民，一起現身凱達格蘭。」（施明德 2006）

⁹⁰ 這個概念源自 Daniel Dayan (1992) 的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 Casting of History* 一書。參見 Ronald N. Jacobs (1996) 一文的討論。

⁹¹（粗體為筆者所加）再者，支持倒扁運動的著名作家與社會評論者南方朔，也以〈台灣需要一場「彩虹革命」〉一文呼應施明德的號召：「在這個百萬人倒扁已發動之際，主事者已必須深體成事不必在己，良心不分藍綠的基本原則，擴大參與，妥為籌謀，俾讓已被統治者切割得四分五裂的台灣，出現可以團結的新契機。無分藍、綠、橘、紫，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光譜寬廣的彩虹聯盟，讓彩虹的繽紛多元，替台灣創造出一場「彩虹革命」。」（南方朔 2006）

8月31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成員的學者趙剛、陳宜中、廖元豪則以〈自主公民進場〉一文，進一步建構出去政治化的議題和訴求：

「凡是為了挺藍而倒扁的民眾，或是為了挺綠而反制倒扁的民眾，都不是真正的自主公民，…新世紀以來，人民痛苦指數陡然攀升是一不爭事實。各種問題愈演愈烈，表現在高層政治腐敗化、政黨政治家族化、金權政治肌理化、貧富差距鴻溝化、兩岸關係敵對化、新聞媒體幫派化、弱勢群體邊緣化、人權保障書面化、多元文化口號化…這九化。其中，人民對高層的失德、失言與失態的憤怒最為尖銳，因為那牽涉到社會人群文明與國家賴以存在的道德底線，這個憤怒表現在百萬人要求總統下台與「反貪腐」等消極訴求。這些訴求雖然消極，但是，在傳統的專制、威權與家父長文化制約下的人民，能夠突破文化限制，提出「反對××當家作主」的明確訊息，的確是自主公民的突破性進步。」（趙剛、陳宜中、廖元豪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與此類似的言論，則如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也在〈打一場持久戰 全民倒扁 決戰在秋天〉一文中指出：

「面對台灣社會道德價值全面崩解的危機，當前台灣唯一的出路，就是由學術和文化界人士打破藍綠對立的政治藩籬，組織「全民倒扁行動聯盟」，等到入秋之後，發起「全民包圍玉山官邸行動」，以群眾運動，逼迫陳水扁下台。…這項倒扁行動之所以必須由學術和文化界發起，乃是因為當前統獨對立的政治結構，使得反對黨對貪腐的第一家庭已經無計可施：泛藍發動街頭抗爭，推動罷免總統，反倒使阿扁「愈錯愈勇」，不擇手段地捍衛第一家庭。…學術和文化人士是社會道德和價值的最後一道防線。」（黃光國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另外，《中時晚報》主筆楊渡則在〈找回「人」的價值觀〉一文裡，則強調倒扁運動的道德訴求的重要性：

⁹¹ 參見（楊渡，2006）。

「在這個廣場上，「禮義廉恥」是一種象徵。它固然是古老的道德，卻是恆久不變的價值。而我們已經失去很久了…這個污濁的成人世界，為了抹去他們的無恥貪婪，竟只會使用政治語言，但他們碰上了最根本的「人性語言」，就完全失效了。這是一場價值觀的「革命」嗎？不，不是「革命」，而是價值觀的「復歸」，人性的復歸」。這是歷經政治的「百劫」之後的「回歸」。…人們走上街頭，是為了要回「自己的生活」，要回自己的生命所希望活著的樣子。那是「人」的生活，「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價值觀，一種可以向未來的孩子交待的「意義」。…我已經不那麼在乎倒扁是不是成功了。倒扁是一種象徵，意味著我們拒絕某一種價值，反對某一種腐敗的生活。雖然它很重要，阿扁下台，也意味著對貪污腐敗的罪惡的懲罰。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找回自己的價值觀，那是超越統獨割裂、族群對立、語言、藍綠之上的一種抽象無比，但又如此具體的「價值」。」（楊渡 2006: 146-147）（粗體為筆者所加）

以上這些敘事所致力提倡的，是相對於「污濁骯髒」之現實政治世界的反面——一種超越的、理想的（現實社會不存在的）公民社會想像，同時他們創造了去政治色彩的「紅」色，用此顏色象徵的理想性召喚人們參與倒扁。此種強調「超越藍綠」的去政治化敘事，是建立在對「現實政治」的厭惡上，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了 1990 年代厭惡選舉政治、否定族群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再者，此種「超越藍綠」的去政治化敘事欲「道德化」的事物，也就是支持者企圖再政治化、再尋找其改變可能的事物。例如楊渡的文章就不斷強調「禮義廉恥」、以及倒扁運動作為一種價值觀革命的重要性。這種將運動「去政治化」並「道德化」的操作方式，增加了發起者、參與者的正當性。並且，在標舉「紅」色的同時，也等於創造出「紅」與「非紅」、「清廉」與「貪腐」等象徵符碼上的對立，構成了相對應的人群分類。他們所創造的敘事內容與要素，可以整理如表 3-1 的模式。

表 3-1 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敘事者	超越政治立場的公民
時間的演進	2000 年以來
中心主題	超越政治立場的自主公民，是社會道德良心的最後底線。
情節	<p>開始：民進黨執政以來，高層政治腐化、貧富差距惡化、人民的痛苦指數攀升。</p> <p>中間：如今政治高層的失德，已讓台灣社會道德價值面臨崩解的危機。</p> <p>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p>
結論或解決方案	我們呼籲超越政治立場、擁有道德良心的自主公民，一起現身向腐敗的民進黨高層發出抗議。

2. 「抹藍」、「倒施」的政治污名化回應

然而，這種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其意義終止之處正好發生於被排斥者（民進黨從政者與支持者）的人群類屬之中。以民進黨從政者、綠營支持者的態度為例，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場超越藍綠的運動，自然不可能認同倒扁者意圖建構的世界觀。對他們而言，施明德「綠反綠」的邏輯是一種「背叛」，是「投靠敵營」所進行的鬥爭。背叛者不值得信任、背叛者無論闡述什麼理念也都是假的。因此，這些反倒扁運動的敘事才會將矛頭指向施明德個人，不斷以「政客」、「騙子」的言論予以攻擊，並將整個運動污名化為一場政治鬥爭。

例如施明德在宣佈發起反貪腐倒扁運動的隔日，《自由時報》的一篇社論〈[自由談] 泛泛，泛藍！〉便這樣認為：

「最近的倒扁聲浪，大都是泛藍陣營人士，加上投靠泛藍、貼近泛藍的人士炮製的，明明都姓「泛藍」，不少卻不說自己是泛藍軍，顯然在製造全民倒扁假象！…最假的就是明明姓泛藍，卻假借學者、社運之名倒扁，還要搞焚香祭祖借關刀的倒扁戲碼，當他們祭「祖」時，其獨裁之祖—兩蔣幽靈，應該會「顯靈」才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餘孽」更充斥媒體，扁如涉貪腐，當然要批判，但泛藍媒體倒扁卻政治上綱，藉反腐之名，掩藏族群鬥爭，還有一、二名嘴，在泛藍媒體附和倒扁，又充當登頂政客的「幫閒」，穿梭放話倒扁，無恥！另外，如施明德，在長年被泛藍媒體捧著供養下，顯已被牽著鼻子走。」⁹²（粗體為筆者所加）

而《自由時報》的專欄作家曹長青則在其專欄中發表的文章〈施明德千萬別「自焚」〉中指責施明德是過氣政客：

「其實施明德「倒扁」是虛，出鋒頭是實。這位早已被台灣人淘汰了的政客，真是「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去競選高雄市長，只得到實在可憐的幾千張票（謝長廷獲三十八萬票），連從沒蹲過監獄的張博雅還拿到一萬三；去選立委，得票率不到半成，更是悲慘。政客落魄到這種地步還跳出來，就只有馬戲娛樂觀眾的份了。」（曹長青 2006）
(粗體為筆者所加)

黃明裕醫師也在〈變臉〉一文中批評施明德的背叛：

⁹² 參考〈[自由談] 泛泛，泛藍！〉，《自由時報》，2006 年 8 月 12 日。

「泛藍陣營裡，人氣飆升，媒體圍繞，話題焦點，他的說話又鏗鏘有力起來，那個人又回來了，只不過，今昔有別。風采依舊，立場對換、目標對換、群眾對換、顏色對換；換邊，換了一個人，換了一種思維，換了一個班底，換了一整個的環境。這個自許革命家的人，革掉了自己！革除了本土對他的認識，告別過去的屬性，從此，再怎樣的濃妝豔抹，本土都會記得他的變色，都已然清楚這個人原來也會變臉，不僅在國民黨追捕肅殺之時。…他舉手倒著大拇指的同時，喚來了新的支持者圍繞，卻揮別了曾經義務助他相挺的鄉親，很多的不甘，抗議他、罵他、聲討、批判，對他而言，有何妨？過去，泛藍就曾經如是的對待他。在泛綠，他的氣勢盡失之下，轉入藍色圈子，製造運動，掌聲響起，英雄的氣勢重現，站在舞台上，極目四顧，只有他一人與當政者抗衡，台灣敢如此者有幾人？」（黃明裕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從民進黨從政者、綠營支持者的回應，可以看到他們也使用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的外在形式，來攻擊施明德是「政客」，然而這些敘事的內涵和意義，已經被他們的立場和社會脈絡為了因應不同的需要而置換。這種模仿的現象呼應了第一章提過的：文化的「工具箱」（tool kit）論。當我們關注文化中的象徵資源是如何被行動者使用，就會發現文化是碎裂並跨越群體的、不一致且充滿變化的展現（Paul DiMaggio, 1997: 264-265）。在此，「抹藍」、「倒施」的政治污名化回應使用了「部份的」去政治化敘事形式，並在這個形式之內填入行動者自行賦予的新意義。

3. 「尊重法治」的反動員回應

在反倒扁運動的政治意見中，除了前文提到的「抹藍」、「倒施」這種較為激烈的反對聲浪之外，也有出現「尊重法治」、強調「社會安定與和諧」的反動員回應。其中，「尊重法治」的敘事生產者廣及民進黨從政者（與支持者）、過去被視為綠營反對者的龍應台、李家同，以及在《中國時報》、《聯合報》投書的部份民眾。由此可以看出這種觀點的普遍性。但這種敘事與過去威權統治時期的「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中所強調的「依法行政」不同。這種回應衝突的方式反映的是對於民主轉型後的法律制度的信心；不同於前者只是為了掩蓋權力不平等的政治結構，將政治問題「行政化」的去政治化敘事。

例如親綠社團北社的副秘書長王美琇便在〈聯中媒體的準政治內戰〉一文中發表這樣的看法：

「讓我們重新冷靜的回想：阿扁總統真的是「貪污總統」嗎？趙建銘或許貪婪無度罪有應得，但尚無證據指向總統本人涉案；而法務部調查局

偵辦SOGO案移送書出爐結果，更是說「吳淑珍確曾接受黃芳彥餽贈的SOGO禮券，但黃芳彥非公務人員，兩人均不涉違法。」這個幾乎置總統夫人於死地的新聞炒了兩個月，偵查結果卻見媒體輕輕帶過，彷彿不曾發生一樣；但是，對第一家庭的聲譽已經造成無可彌補的重大傷害。…不止於此，「媒體公審」的可怕力量還在進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摧毀陳水扁」，同時也摧毀掉台灣非常脆弱的司法。…媒體可以嘲諷陳總統的行事風格，甚至嚴厲批判他的政策措施，但是絕不能用缺乏證據的「貪瀆」罪名來污衊他，更不能用道德包裝的民粹力量來審判他、要他下台。如果我們心中還有一點民主法治素養和憲政概念，請尊重司法；若總統未涉違法，請讓陳總統做完任期。」（王美琇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類似的言論，如知名作家李家同也在〈街頭運動…今天倒扁 將來倒誰〉表達類似看法：

「雖然我認為陳總統應該下台，我卻擔心迫使陳總統下台的手段可能有問題。須知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一定也要是一個法治國家，包圍總統府，或者癱瘓了總統府附近的交通，都不可能合法，以非法的手段來達成一個目標，無論這個目標多麼偉大，我們仍不能做。因為這已經是近乎革命了。我們實行民主政治，卻又用革命手段，豈不矛盾？用街頭運動來使總統下台，在先進國家是從來沒有發生的。尼克森總統之所以下台，乃是由於高華德參議員勸他立刻下台，否則他就會在參議院提出彈劾案。…想請陳總統下台的老百姓只能以選票來表示意見。」

（李家同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一位來自台北縣新店的大學生林建宇也在其文〈平民的心聲 我支持龍應台〉中傳達支持龍應台選擇不捐一百元的決定：

「懇請在鏡頭前拿著麥克風的意見領袖們，想想台灣是不是已經沒有司法，為何要操弄民眾情緒，召喚激情的民粹，透過非法治的手段，去做一個無法達成倒扁目標的活動呢？在激情之餘，這把火已經被利刀拒馬隔離在總統府之前。…對事不對人，要罷免一位不受人民信任的總統，絕對不是光靠民意以及道德勸說就能達成目標，這紅色的一百元鈔票，我寧可捐給正在查辦總統府機要費的檢察官以及司法人員，藉由法制的手段準確達成目標，將總統彈劾罷免，因為這才是準確實踐民主法治的力量。」（林建宇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以上這些敘事雖然均強調「尊重法治」，它們之間仍有隱微的差異。像綠營支持者（如王美琇的文章）較重視「真相未被查明」、所以應尊重司法，依此批評「媒體公審」對於台灣社會的負面影響；但像李家同、林建宇的文章強調的則是倒扁手段本身「是否合法」的問題，由於街頭運動是不合法的體制外路線、故應否定之。相比之下，李家同、林建宇的文章認為「民主國家就是法治國家」、所以反對街頭運動的敘事形式，與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執政者生產的「去政治化的民主敘事」有較大的雷同。然而畢竟物換星移，即使敘事型式相似，意義也已大不同。從解嚴至 2006 年已相隔近二十年，隨著二十年來的民主化發展，選舉制度作為體制內路線的正當性，也因一次次的選舉而逐漸鞏固和確立。相對而言，體制外的街頭運動便有可能更不易被認同（因為人們認為選舉制度可以解決許多政治問題）。所以在此的去政治化敘事與過去「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有著不同的涵義：在過去不民主的時代裡，「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既是統治者為了壓制反對人士所生產出來，也在當時廣受支持而發揮了鞏固特定政權的作用。而在倒扁運動中出現的「尊重法治」的反應，其去政治化的意義則與人們相信民主制度的政治態度有較大的關連。只是這種「去政治化」也可能忽略了制度層面不夠完善的事實。

4. 強調「社會安定」、「和諧」的政治意見

除此之外，另外一種反對倒扁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後果的敘事，即強調「社會安定」、「和諧」的政治意見，部分延續了威權統治時期的去政治化敘事、部分則反映出新的意義。這些敘事關注的不是倒扁運動是哪種顏色（藍、綠、紅），而是運動究竟引起了何種社會效應。當社會分化成紅／非紅兩股勢力的對立、並開始瀰漫衝突鬥爭的氣氛時，就落入了這些敘事生產者最不樂見的情況。

首先，例如台北縣三重的文字工作者王新偉在〈倒扁保扁 台灣大撕裂〉一文中，便表達了他的憂心：

「從「保扁」和「倒扁」兩派民意的愈來愈升高的衝突和對立情勢來看，這場運動會否一發不可收拾，實在令人憂心。…從這段時間雙方陣營層出不窮的指責謾罵、互相攻訐的言語暴力充斥媒體的新聞事件，演變到日昨某電子媒體政論節目立場不同的來賓爆發嚴重的肢體衝突，最後甚至中斷錄影，血濺攝影棚，這樣脫序失控的畫面真是令人怵目驚心，卻也更讓人不敢相信，這場倒扁運動，會如主辦單位預期的平和的落幕嗎？還是變成無休止的暴力衝突和長期抗爭，使台灣社會更加對立，或徹底的分裂、仇恨加劇？」（王新偉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再者，臺南市一位筆名神農的讀者也在〈用大智慧化解大對立〉一文裡表示：

「倒扁活動蓄勢待發，挺扁群眾也不甘示弱，先發制人。…詭譎的政局是變調的交響樂，任由政治人物手中的指揮棒操弄，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節奏雜亂而刺耳，在挑動最敏感的神經，測試忍耐極限；不分藍綠，台灣人已然陷入集體的狂躁與焦慮。芸芸眾生，哀哀小民，平日為生活已夠勞碌，何苦再操這份心。…這次倒扁與挺扁的對峙風潮中，赤裸裸呈現政治人物的狹隘偏執，部分民眾也失去判斷力，甘願衝到最前頭，搖旗吶喊。聖嚴法師嘉言錄提到：「智慧來自煩惱」，換句話說，因煩惱而衍生出智慧，具有積極正面意義。再看看我們的政治人物，若非別有用心，某些時候，他們的智慧反而比不上一介平民。台灣這幾年藍綠對立嚴重，連帶影響族群融合，這是大家心中的痛。倒扁戲碼即將上演，結局難料，我們欣見執政黨以「不對抗，不動員」回應，希望說到做到，更希望抗爭者也能展現大智慧，做出最有利於台灣人的決定。」

(神農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另外，又如台北市一位筆名喬夫的上班族，則在〈我可以有不倒扁的權利〉一文中呼籲不同意見的民眾應相互尊重：

「昨日貴報刊登〈難道不挺扁就是壞人？〉筆者在此也想反問一句：「可不可以有不倒扁的權利？」我對阿扁同樣從期待變成失望，我希望執政者有作為，也期盼有個安定和諧的生活，阿扁下台的訴求雖然代表社會上很多人的聲音，但是沒有選擇這個方法表達不滿應該也是該被尊重的選擇。……我不在乎阿扁是否能夠做到任期結束，我在乎的是社會已經禁不起再一次動盪撕裂。在此祝福倒扁匯款民眾的訴求，能帶給社會更積極正面的意義，也希望其他不參與匯款的人同樣被尊重，唯此，台灣人民的民主素養才會向前再跨進一步。」(喬夫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

以上強調「社會安定」、「和諧」的政治看法，部分相當類似威權統治時期的「安定繁榮」敘事所強調的價值，在意義上都是不樂見社會中的政治鬥爭。但與過去「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的不同之處，是在於這裡的政治意見並非擁護執政當局、也沒有特別偏袒哪一方，更沒有否定街頭運動。其中以上述喬夫的敘事最為明顯，它強調的「尊重」和「包容」，呈現了與威權統治時期的去政治化敘事截然不同的價值。其中透露的新意顯示：台灣政治的民主化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確實有產生一些異於過去的、新的政治看法。這些看法在相當的程度上，已經落實為一般民眾的民主認知，因此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重要政治變遷。

總結來說，由倒扁運動初期到中期這些反對的政治意見：「抹藍」、「倒施」的政治污名化回應，「尊重法治」的反動員回應，與強調「社會安定」、「和諧」、「尊重包容」的民主政治認知，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議題最火熱的時期，所引發的多元公眾討論的性質。這些公眾討論部份融合了去政治化敘事的特質，部分則被敘事生產者依據不同的社會脈絡更改和加工、填入不同的意義。而這些現象，同時反映了台灣民主轉型的深化。以下我們要繼續談的則是，在什麼條件下，這些反對的聲浪會從各自的支流匯聚成主流，使得反貪腐倒扁運動被邊緣化、最後逐漸走向尾聲。

(三) 敘事轉向與「麻煩製造者」的出現

9月15日的「螢光圍城」活動，可說是反貪腐倒扁運動的高潮。但在這天過後，伴隨著紅／綠對立的激化，台灣社會中倒扁／挺扁的衝突日益嚴重。情況也愈來愈像台灣民眾很反感的藍／綠對抗模式。在此情境下，倒扁總部放出的「罷工」風向球，微妙的成為局勢的轉捩點。一方面它造成總部內意見分歧的路線之爭，使組織本身產生內耗；⁹³另一方面它幫助了各種反倒扁聲浪的整合，使得自己在主導議題上淪為弱勢的一方，最後加速了反貪腐倒扁運動的邊緣化。

從9月11日倒扁總部宣布未來可能發動全國罷工的消息傳出之後，立刻引起各界人士的反對。⁹⁴無論是工商團體、國民兩黨政治人物、或是民意論壇出現的言論，幾乎都對此消息採取否定的態度。其中少有的支持者多為工運人士（如鄭村棋）、或部分工會（如全國總工會）。⁹⁵就連倒扁總部提出的「罷工」計畫，都主要是社運人士簡錫堦的意見，而非全體決議的結果。

由於倒扁運動原先的訴求並不涉及勞資爭議，這種罷工的性質偏向「政治性罷工」。政治性罷工要成為可能，社會需有高度共識，且資方必須承擔所有可能的損失，這在過去台灣社會的反對運動中從未發生過。而這一次，也仍然無法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所以在遭遇各種反對聲浪之後，倒扁總部退而求其次，在10月5日上午11點45分，在各地捷運、火車、汽車站，以手勢、口號、喇叭聲「快閃示威」倒扁十五分鐘，以達到「柔性罷工」的目的。⁹⁶然而運動至此，畢竟已經過了最高峰的階段，柔性罷工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⁹³ 參考〈倒扁總部 罷免派壓倒罷工派 簡錫堦傳走人〉，《中國時報》，2006年10月7日。

⁹⁴ 參考〈倒扁揚言發動全國罷工 工商團體口徑一致反對〉，《工商時報》，2006年9月12日；〈罷工傷經濟 國、民兩黨都反對〉，《中國時報》，2006年9月13日。

⁹⁵ 參考〈鄭村棋贊成 總部急降溫〉，《聯合報》，2006年9月11日；〈全總：若宣布罷工 將號召集體請假〉，《聯合報》，2006年9月13日。

⁹⁶ 參考〈今11:45 快閃倒扁 在各地車站以口號、手勢示威 柔性罷工15分鐘〉，《聯合報》，2006年10月5日。

此外，如前文提及的、運動中期之後的「媒體報導風格轉向」，也是這裡要討論的重點之一。其中，以《中國時報》最為明顯。自罷工消息傳出之後，《中國時報》以題為〈全面罷工代價慘重不容兒戲〉的社論，表達報社對此事的立場。此後更開始以「師老兵疲、民氣流失、群眾激化」的負面語彙、描述中期以後紅衫軍的狀態。⁹⁷另外，《聯合報》則以公布「聯合報系民調」與「1111 人力銀行民調」的結果，傳達多數民眾反對罷工的立場。⁹⁸報社記者並撰寫評論、描寫倒扁運動的危機。⁹⁹若借用 Ronald N. Jacobs 使用「文體」(genre) 剖析新聞文本的方式，則可發現兩大報在詮釋同一場事件的「文體轉向」：由充滿希望的「羅曼史」敘事，轉向無法預期結局的「悲劇」敘事。¹⁰⁰文體的轉變反映了對事件期待的轉變，而對事件期待的轉變、則導因於潛藏的價值（象徵符碼），一種根植於文化的深層力量。以下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是不同行動者反對罷工的理由，看看這些敘事所具有的共同特質，以及深植的文化力量。

例如一篇題為〈倒扁揚言發動全國罷工 工商團體口徑一致反對〉的報導，呈現了工商團體的反應：

「倒扁總部內部評估陳水扁總統若不下台，十月擬發動全國罷工一事，工商團體負責人齊聲反對！工業總會理事長陳武雄指出，產業界沒有政治立場，也尊重不同的聲音，但是不要把社會搞亂掉，這樣大家都沒有好處，發動罷工將會對台灣產業跟投資環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不管阿扁倒不倒，經濟還是要顧好，讓企業向前走。」…工業協進會理事長李成家與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林秉彬也指出，罷工將傷害全民與產業界，不希望事件擴大、傷及無辜，更不希望因此變成沒有法律秩序。林秉彬反問：「這項活動抗議的對象到底是誰？是企業？還是政黨？」，台灣企業已經是在風雨中飄搖，若發動大規模罷工，將會傷害產業界與全民。」¹⁰¹（粗體為筆者所加）

同時，《中國時報》的社論〈全面罷工代價慘重不容兒戲〉，也指出：

「倒扁總部以及其他支持反貪腐政治理念的團體或企業，應知罷工，尤其全面性的罷工、罷市、罷課，不僅可能重創台灣的產業及經濟，甚至

⁹⁷ 參考〈師老兵疲、民氣流失、群眾激化…反貪倒扁運動 面臨質變危機〉，《中國時報》，2006 年 10 月 12 日。

⁹⁸ 參考〈本報民調 罷工迫扁下台 六成九反對〉，《聯合報》，2006 年 9 月 17 日；〈74%上班族反對罷工 逾半不參加靜坐 逾 8 成對藍綠二分不滿〉，《聯合報》，2006 年 9 月 22 日。

⁹⁹ 參考〈施的三危機 罷工增加社會成本 群眾基礎逐漸窄化 衝突可能隨時升高〉，《聯合報》，2006 年 9 月 15 日。

¹⁰⁰ Ronald N. Jacobs 借用 Frye 對文體的分類，指出四種文體：喜劇、羅曼史、反諷劇、悲劇。每一種文體指向不同的結局、與對結局的期待。(1996: 1245)

¹⁰¹ 參考〈倒扁揚言發動全國罷工 工商團體口徑一致反對〉，《工商時報》，2006 年 9 月 12 日。

可能讓台灣社會陷入長期不安絕境，造成幾十年來的經濟、民主發展成果付諸東流的後果。…對於政治活動竟然可能擴大至罷工、罷市、罷課並影響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我們一方面欣慰包括國民黨等政治團體、工總商總中小企業協會等工商業團體，立即表達明確反對，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正告朝野各界，台灣同胞經過數十年來的胼手胝足奮鬥才有今天的經濟成果，民眾也才能享有起碼的安定生活，豈可因為一時的政治對立，以及某些特定族群的政治訴求而忽視不顧？全部放棄？」¹⁰²（粗體為筆者所加）

從事金融業的王小敏也在〈我反貪汙 也反對罷工！〉的投書中提及：「靜坐要有理性，不能因靜坐倒扁而影響生活，所以我們不能罷工倒台灣，只能靜坐抗議。…反貪汙有理，但罷工則無用，因為罷工只會影響自己及台灣經濟發展，有個貪汙的總統已夠慘了，不要再把自己的唯一生機「工作」都罷掉了！阿扁你若是真是為民想的總統，請在罷工前，自己下台吧！」（王小敏 2006）（粗體為筆者所加）國民黨、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馬英九與蘇貞昌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馬英九表示：「罷工對經濟、社會影響很大，不到最後關頭不宜使用。…台北市政府員工如果「有事情」，只要請事假就好，市政府長官不會過問員工「去做了什麼事」。」¹⁰³而蘇貞昌也認為：「今天台灣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而來的，任何人都沒有資格破壞，也不應該破壞，尤其是經濟情形是最重要的，是台灣安身立命的命脈，無論任何的政治主張或立場，都不應該破壞經濟的成果。」¹⁰⁴

由以上的反對罷工的政治意見，雖然可以發現一種從「全民經濟」的角度出發，強調經濟發展不容許政治活動破壞的敘事，然而深入觀察此敘事根植的社會脈絡，可以發現其中有一層意義是認為「政治性罷工」缺乏正當的理由。由於「反貪腐倒扁運動」一開始的定位並非涉及分配正義的階級議題，會提出罷工目的只是要提高社會衝突的程度，因此在反對者的眼裡，在還未確定陳水扁總統貪污的情況就要把議題擴大，顯然不合理。如《中國時報》的社論〈全面罷工代價慘重不容兒戲〉便直接表示「罷工是特定族群的政治訴求、為何要整個社會付出代價」的看法。這些反對罷工的看法，在阻止罷工所付諸的行動之中，仍然習於使用最為熟悉、也最有效的「安定繁榮」、「經濟發展」敘事。

正是因為倒扁總部對「罷工」的提出，於是在各種歷史因素的幅湊匯聚下，讓原先反倒扁運動的各種敘事，有了整合的契機。無論是哪一種政治立場的行動者，似乎都因為這個議題找到了共同認同的價值。而當這樣的敘事被「異口同聲」地生產出來，也就等於對倒扁運動貼上致命的標籤，倒扁運動者便難以逃脫「麻

¹⁰² 參考〈全面罷工代價慘重不容兒戲〉，《中國時報》，2006年9月14日。

¹⁰³ 參考〈馬：非不得已不宜罷工〉，《聯合報》，2006年9月15日。

¹⁰⁴ 參考〈對倒扁總部決定發起全國罷工 蘇呼籲節制 不應破壞經濟成果〉，《聯合報》，2006年9月14日。

煩製造者」的形象，以及被邊緣化的命運。短期來看，強調「經濟發展至上」的敘事雖然阻止了社會衝突進一步的擴散，因此在當下造成了正面的社會效應。不過這一類的敘事透過此事件所進行的再生產，也更加鞏固了它在台灣社會的論述歷史中的位置。因此也讓日後的街頭運動更難以逃脫這種論述與標籤的牢籠。

第四節 小結

在第一章導論中，我們曾指出「去政治化」現象包含了三個層面：對政治的負面認知、對從政者的負面印象、以及反對國家政治干預的市場決定論。本章討論的，主要是第一、二層面的現象。從「反貪腐倒扁運動」的事件分析，可以發現對政治的負面認知、與對政客的厭惡，與「貪腐案」的建構過程習習相關。「台開案」、「國務機要費案」爆發之後，被媒體、政治人物大量使用的「貪腐」一詞，在司法檢調單位查案之前，便先促成了醜聞的建構。隨後在國親兩黨欲發動的「倒扁」聲浪中，「貪腐」的道德操守問題才進一步和「阿扁下台」（反對政客）成為一體兩面。而透過藍營政治人物退場、但卻轉而跟進施明德發起的「反貪腐倒扁運動」的事實，可發現這場「去政治化運動」是各種行動者（從政者、文化人、學者…）共同定位和建構的結果。

在這一章中筆者細究的是，「反貪腐倒扁運動」在議題建構上生產的去政治化敘事。運動者是以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把具有政治性的抗爭行為化為一種道德運動，依此動員民眾的參與。這種敘事反映出晚近厭惡選舉政治、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現象。但是，這種去政治化的議題建構遭遇了不同政治意見者的回應和抵制，如「抹藍」、「倒施」的政治污名化回應、「尊重法治」的反動員回應、強調「社會安定」、「和諧」的政治意見，以及「經濟發展至上」的敘事。其中特別以「安定繁榮」、「經濟發展至上」的敘事在遏阻倒扁運動進一步激進化最為有效，它發揮了某種類似文化整合的功能，在特殊的歷史時點上集結了所有反倒扁運動的各方力量，最後達成了反制的效果。

「反貪腐倒扁運動」做為原來有意恢復社會道德秩序的行動，其逐漸引起的社會效應卻讓它自己最後變成「社會的亂源」、「麻煩製造者」，而當「安定繁榮」、「經濟發展至上」的去政治化敘事最後發揮了「除亂」、反制的效果，從中勝出的實為與這種去政治化思維相應的道德秩序，亦即期待一個專心「拼經濟」、「安定的」社會的來臨。這種去政治化思維與敘事，將在後續的台灣政治中，尤其在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掌政權產生更大的作用，因而也引發更大的社會衝突，而這具體反映在本論文第五章將分析的陳雲林訪台風波中。

第四章 嘲諷政治：2007年「中正紀念堂」更名與復名事件

Mary Douglas 關於污染／純潔的理論指出，污穢是相對的概念，它的存在象徵著分類體系(社會認可的秩序邏輯)的存在。汙染意識有助於維繫現有的道德體系 (Seidman, 1997: 187, 192)。由此視角出發，可以發現 2006 年下半年在反貪腐倒扁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貪腐案」本身已經成為汙染的象徵。它散發出邪惡和不潔、並擴散污染著和它相關的一切人事物——綠營、民進黨。於是，貪腐案造成一種「象徵倒置」(symbolic inversion)¹⁰⁵，它不但讓先前綠營自我應許的改革角色蒙受污染、也連帶使他們失去象徵生產工具的控制權，在接下來的任何議題裡，他們的政治敘事便難再獲得正當性。另一方面，貪腐案作為「污染」所引起的社會反感，會產生強化舊道德象徵秩序的效果，並且鞏固「政治」與「貪腐」的關連性。這種厭惡政治與政治人物的態勢，使得接下來的「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也深陷在這種去政治化現象的情境之中。

第一節 轉型正義的失敗建構

2006 年倒扁運動前夕，由一向被視為親綠的學者發起的政治宣言〈七一五聲明〉中，學者吳叡人特別抨擊民進黨的執政「完全沒有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¹⁰⁶對此，雖然前總統陳水扁後來於 8 月 12 日回應，表示有意處理，然而其宣布的時機卻是在 8 月 11 日施明德發起「百萬人倒扁行動」的隔日。此時「貪腐案」處於剛被建構的時期，而「百萬人倒扁行動」做為一個炙手可熱、新鮮的新聞議題，自然是媒體最注目的焦點。因此這種淹沒在一片倒扁聲浪中的回應，使得轉型正義的議題相形失色，難以構成更廣泛的、深入的公共討論。¹⁰⁷

(一) 轉型正義與統獨議題的糾葛

根據 Louis Bickford 的定義，轉型正義做為晚近立基於人權觀念所開展出來的新的人權實踐方式，是一種涉及民主轉型後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傷的一連串社會工程(江宜樺, 2007: 67)¹⁰⁸。它雖然具有普世人權價值的具體實踐模式，卻會因為各國不同的歷史背景，而形成多元的在地經驗。這些經驗往往反映了不同社會的困境。

¹⁰⁵ 此概念借用於 Jeffery C. Alexander 的《文化社會學》一書，此為作者對大屠殺敘事轉變的分析所使用的概念 (2008: 81)。

¹⁰⁶ 參考吳叡人，〈把民主運動重新作起！〉，《中國時報》，2006 年 7 月 16 日。

¹⁰⁷ 參考〈上午在凱達格蘭學校授課 扁提「內閣制、轉型正義」回應〉，《中國時報》，2006 年 8 月 12 日。

¹⁰⁸ 參見江宜樺，2007，〈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思想》第五期，pp.67。

以台灣社會為例，從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欲推動的一連串措施中，「轉型正義議題」與族群政治中的「統獨爭議」相互糾纏。由民進黨政府從 2006 年 9 月開始推動的「中字企業正名」、或者 2007 年初推動的「去蔣化行動」，可以看到對過去威權暴政的控訴，不僅是訴諸於平反「單純的人權迫害」而已。¹⁰⁹將中正國際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撤離台灣各地的蔣介石銅像、或將中華郵政改為「台灣郵政」等等作為，除了具有瓦解過去威權統治強人政治的象徵意涵之外，也充滿一種驅逐國民黨過去建構的「中國」文化象徵的意味。因此相對的，這一波所謂「轉型正義行動」所引起的反對聲浪，其政治論述也就同樣和「統獨議題」牽扯不清。這種特殊的局面形塑了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的背景。

(二)「中正紀念堂」更名過程

「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的曝光和爆發，便是導因於這一波「去中國化」、「去蔣化」的轉型正義行動。在前總統陳水扁回應有意處理轉型正義議題之後，行政院在 9 月 6 日將中正國際機場正式改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接著行政院在九月底指示交通部、經濟部檢討轄下國營事業單位名稱，將矛頭指向「中」字企業，續推正名。¹¹⁰至隔年 2007 年 2 月 7 日，在民進黨中常會上，民進黨黨主席游錫堃提案，並通過一連串「去除獨裁統治遺緒」的決議，¹¹¹其中一項為「中正紀念堂」的更名。但事實上民進黨立委蔡同榮和台聯立委廖本煙、羅志明等人，早在 2006 年 2 月便已提案修改《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認為中正紀念堂是國民黨威權戒嚴統治時期之產物，應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這項提案當時如石沉大海，在沈寂一年後，因為民進黨政府一連串「更名運動」才再度浮上檯面。¹¹²

3 月 2 日，行政院召開跨部會會議，會中決議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並且不排除拆除外牆的可能性。¹¹³此舉立刻引起國民黨與親民黨立委的反彈，國民黨前立委秦慧珠、議員王正德、吳志剛等民意代表便針對拆牆一事，於 3 月 7 日發動萬人連署反對拆圍牆活動；國民黨高層更於 3 月底發動抗議「去蔣拆牆」的遊行。針對這些反對聲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吳澤成表示，會先進行民調、並納入外國觀光客的意見，再決定圍牆拆遷與否。¹¹⁴最後執行單

¹⁰⁹ 參考〈深綠固盤 攘外安內？政院低調續推中字企業正名〉，《中國時報》，2006 年 10 月 17 日；〈去蔣中正化第二波 目標 2008 年前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聯合報》，2007 年 2 月 5 日。

¹¹⁰ 參考〈深綠固盤 攘外安內？政院低調續推中字企業正名〉，《中國時報》，2006 年 10 月 17 日。

¹¹¹ 游錫堃在中常會後的記者會中表示：「去年有關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處理報告，清楚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但到現在蔣介石的生日和忌日還是國家紀念日，還有中正紀念堂，蔣介石的銅像在全國仍是到處挺立、全台各地也都有中正路，而蔣介石的相片還在鈔票上，這些都必須全面更改。」參考〈游錫堃籲馬英九 不再向獨裁者謁陵〉，中央社新聞，2007 年 2 月 7 日。

¹¹² 參考〈綠委：中正紀念堂更名 不須修法〉，《中國時報》，2007 年 2 月 6 日。

¹¹³ 參考〈教部確定改名「台灣民主紀念館」 拆牆尚無共識〉，《中國時報》，2007 年 3 月 3 日。

¹¹⁴ 參考〈反對中正堂拆牆 發動連署〉，《聯合報》，2007 年 3 月 8 日；〈抗議去蔣拆牆 國民黨月底大遊行〉，《聯合報》，2007 年 3 月 21 日；〈工程會民調 要問問民眾、觀光客意見〉，《聯合

位沒有行動、媒體也不再報導，拆牆一事便不了了之。事件的後續發展都聚焦在「更名」的爭議之上。

由於改名需要國會通過修改〈國立中正紀念堂組織條例〉，而民進黨政府為了避免因國會席次較少而影響修改的結果，於是便指示教育部和行政院研考會等單位於3月8日開會審查通過《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將中正紀念堂由目前的行政院三級單位降格為四級單位，讓中正紀念堂直接由行政院管轄。日後只要行政院通過《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中正紀念堂即可直接更名為民主紀念館。¹¹⁵4月13日，行政院長的蘇貞昌核定教育部所提的「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及編制表。5月19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廢止案，並且在當天舉行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揭牌儀式。¹¹⁶總統陳水扁並於揭牌儀式上強調「大中至正」也應更名為「自由廣場」，預告了下一波的更名行動。¹¹⁷

早在中正紀念堂更名的行動公開化之後，國民黨郝龍斌執政的台北市政府便準備要和中央的決策進行對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在2007年3月間啟動文資程序，¹¹⁸將中正紀念堂暫列古蹟，來防止中央對中正紀念堂「動手」的可能性。民進黨政府獲知之後，便在11月6日由教育部提出申請、獲文建會通過將舊中正紀念堂列為「國定古蹟」，以納入中央的管轄範圍，隨後教育部又向文建會提出「古蹟再利用」計畫，欲將「大中至正」牌匾改為「自由廣場」，將原先「中正紀念堂」標示全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¹¹⁹這個將中正紀念堂列為國定古蹟的動作，讓中央有了管轄職權，於是教育部決議於2007年12月6日起封園，進行「中正紀念堂」更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及「大中至正」牌匾更名「自由廣場」的作業，預計12月9日完成施工。不料在施工期間護匾、拆匾民眾對峙，甚至有激進民眾駕車衝撞綠營宣傳車後而遭追打，結果在意圖逃離現場時，連續撞倒在場採訪的記者，導致5人輕重傷。¹²⁰

除了駕車衝撞的事故之外，拆除「大中至正」匾額的現場所集結的立場相對的民眾也展現兩極的反應。12月7日下午五點半最後一個「正」字被拆下時，一方民眾不斷合唱「蔣公紀念歌」，高喊「捍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萬歲」；另

報》，2007年3月29日。

¹¹⁵ 參考〈中正紀念堂將降級 直接改名〉，《中國時報》，2007年3月9日。

¹¹⁶ 參考陳儀深，〈中正廟在法律與政治間浮沉－回顧2007年的一件大事〉，收錄於《漂流台灣 虛擬執政》，台北：前衛，2008，pp.322-323；〈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 陳總統帶領見證轉型正義〉，中央社新聞，2007年5月19日。

¹¹⁷ 參考〈中正堂更名 扁揭牌 藍拔牌 鬧哄哄逮4人 警：停休守破牌 政府無聊〉，《蘋果日報》，2007年5月20日。

¹¹⁸ 即文化資產保存的審查程序。

¹¹⁹ 參考〈台灣民主館具古蹟等三重身份 全台首例〉，中央社新聞，2008年2月29日；陳儀深，〈中正廟在法律與政治間浮沉－回顧2007年的一件大事〉，《漂流台灣 虛擬執政》，322-323。

¹²⁰ 參考〈中正堂更名 台灣民主館〉，《自由時報》，2007年12月31日。

一方民眾則熱烈鼓掌叫好、慶祝「大中至正」拆除。12月10日台灣民主紀念園區重新開張，部分民眾到場聲援「台灣加油」，也有不滿人士比中指及高喊「抗議自由廣場」，沸沸揚揚的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終於告一段落。¹²¹

(三)「中正紀念堂」復名過程

然而，此事件並未真正結束。2008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結束八年的執政，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於當選後，以「依法行政」的宣稱表示中正紀念堂是違法改名，因此希望尋求社會共識來決定復名與否，此舉使情勢開始轉變。對於馬總統的說詞，公民團體（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社區營造學會、外省台灣人協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認為民調只會複製「多數壓制少數」的暴力邏輯，因為法理之爭並無法解決台灣社會的認同歧異，最後恐怕又會挑起族群對立，因此反對用民調方式處理爭議。反之，他們提出「公民對話」的方式、希望做為解決之道。¹²²只是在執政當局這方，似乎已經有意按照既定程序、進行復名的行動。

首先是監察院審計部7月29日出爐的「中央政府九十六年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指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組織條例廢止案尚未經立法院審議、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也被立法院法制、教育文化委員會否決，機關更名未完成法定程序，因此屬於違法之案。¹²³至8月17日，經教育部次長周燦德證實，已向行政院提出廢止「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並向立法院撤回「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廢止案。此舉其實等同於終止前朝執政時未跑完的程序，使得更名不成功，只是此時行政官員仍表示，「自由廣場」牌匾是否卸下、以及「台灣民主紀念館」名稱標示是否停用等問題，將由公民論壇討論決定。¹²⁴

至12月，立法院撤回「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廢止案」，並於2009年1月13日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時，連帶通過主決議，要求教育部盡速把牌匾掛回原位。至於「中正紀念堂」牌匾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相關規定，向文建會及台北市文化局報送更名再利用計畫，核准後再辦理工程招標，程序最快需三個月才能走完，最快七月底才能完成施工。¹²⁵而「自由廣場」是否復名「大中至正」的問題因無涉法律，馬總統裁示召開公民論壇決定。¹²⁶此時才真正決定公民論壇的議題範圍——只限於自由廣場。於是教育部5月間將公民論壇委辦案上網公告招標，後來由世新大學以三百多萬元得標。執行長文念萱表示，雖然標案是公民論壇，但考量「公民」難以定義、經費有限、辦

¹²¹ 參考〈民主紀念館大中至正拆除 民眾反應兩極〉，中央社新聞，2007年12月7日；〈撤拒馬！民主園區罵聲中開張〉，《聯合報》，2007年12月10日。

¹²² 參考〈社團呼籲 公民對話 化解中正堂爭議〉，《中國時報》，2008年3月30日。

¹²³ 參考〈鍊震案、入聯文宣、中正堂改名 也被點名違法〉，《中國時報》，2008年7月30日。

¹²⁴ 參考〈中正紀念堂復名 交公民討論〉，《中國時報》，2008年8月18日。

¹²⁵ 參考〈「中正紀念堂」牌匾 7月底掛回〉，《中國時報》，2009年1月22日。

¹²⁶ 參考〈依法行政 府：中正紀念堂 7月復名〉，《中國時報》，2009年2月23日。

理時間匆促等，因此在與教育部溝通後，決定邀請政治、社會、社區營造、都市改革等專家學者 28 人，進行每人十到十五分鐘的對談。三場對談以「台灣民主發展契機—從中正紀念堂出發」為主題，分別於 6 月 18 日在中國時報、25 日在《聯合報》、30 日在世新大學舉辦，而論壇內容則於七月中旬之前，分別全版刊登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即結案。至於對談人物則由中時、聯合編輯部及世新大學決定，除考量專業性之外，藍綠也都邀請。¹²⁷

三場座談內容的與談人雖然對於復名與否觀點不盡相同，但其中主張中正紀念堂復名應該緩議的人卻居絕大多數，參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座談的十八位學者專家中，贊成復名並重新掛牌的其實祇有一人，其他人都主張暫緩處理。¹²⁸最後，國民黨執政者決定不更動「自由廣場」牌匾（位置請見圖 4.1 左側），但中正紀念堂的牌匾仍在 2009 年 7 月 20 日被火速掛回。¹²⁹表面上看起來，執政者似乎尊重公民論壇的決議，但其實早在公民論壇舉辦之前，行政院就已經表示對自由廣場採取「維持現狀」的態度。¹³⁰如此可見，三場論壇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復名之事，執政當局心中早有定案。

圖 4.1：中正紀念堂堂景平面圖



（圖片來源：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網站）

¹²⁷ 參考〈中正紀念堂復名 公民論壇變紙上論壇〉，《自由時報》，2009 年 6 月 29 日。

¹²⁸ 參考王建壯，〈唯法治國其實祇是法匠治國〉，《中國時報》，2009 年 7 月 23 日。

¹²⁹ 中正紀念堂牌匾掛於中正紀念堂建築物主體之上，環境位置如上圖所示。參考〈中正堂閃電復匾 教部：依法行政〉，《中國時報》，2009 年 7 月 21 日。

¹³⁰ 參考〈中正堂 7 月復名 綠斥搞復辟〉，《蘋果日報》，2009 年 5 月 29 日。

與統獨爭議、認同問題相互糾纏的「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在民進黨執政末期的強行推動之下，演變成一場中央與地方政府（台北市政府）的政治鬥爭。這場鬥爭具有兩個層面：一方面它反映在雙方都以「法律」為名義所展開的具體政治角力的層面；而其象徵層面的鬥爭，則反映在朝野政治人物相互攻防的政治敘事中。即使在政黨輪替之後，這場政治鬥爭也是依照這兩個層面進行。重新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以「依法行政」為名，進行復名的政治行動。而這樣做的同時，則又引起反對輿論的意義鬥爭。

第二節 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鬥爭

在前一節中，我們已從事件發展的歷程，討論此政治鬥爭的具體過程。這一節中，我們則要聚焦在象徵的層次，由政治人物與社會大眾生產的政治敘事，探討此事件中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現象，以及它們對台灣社會的意義。

（一）四大報媒體報導概述

觀察四大報對於中正紀念堂更名／復名事件的報導，除了《自由時報》自始至終都採取支持更名、反對復名的立場之外，《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均偏向「反意識形態政治」的立場進行報導。其中，《中國時報》反對更名、也反對復名；《聯合報》則在反對更名之餘，偏向支持後來國民黨執政者決議將中正紀念堂復名、並留下自由廣場的作法；《蘋果日報》最特殊，不管是報導方式或評論文章的內容，都充滿了多元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分裂敘事。《蘋果日報》政治新聞呈現的現象，就如同蔡佳青（2005）於其碩士論文《八面玲瓏：台灣蘋果日報政治立場之初探》中的觀察與解釋：《蘋果日報》作為外資的、新興的外來媒體，在台灣本土三大報已經占據了各大政治光譜的現實條件之下，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再加上以商業利益為目標的經營策略，既要做出市場區隔、又不要得罪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結果便造成報導內容極度搖擺、無軌跡可循的現象（蔡佳青，2005: 14-15）。

《蘋果日報》的分裂敘事作為台灣媒體現象的一環，也呼應著第三章提過的 Ronald N. Jacobs 的敘事社會學觀點：新聞中有許多相互競爭的敘事，因此分析時不能假定新聞文本有任何敘事一貫的種類（1996: 1244-1245）。根據這種視角，本章在分類資料、詮釋資料的準則，便是打破由各大報紙為分析單位的邊界想像，直接從敘事型態本身的特徵進行各種歸納。不過大體而言，《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仍可被粗略的納入偏向「反意識形態政治」的立場。而這種一致性，更反映了晚近台灣社會去政治化現象的普及化。

表 4.1 搜尋筆數整理

關鍵字：中正紀念堂（已刪除無關的新聞）			
搜尋範圍：2007 年 1 月 1 日 – 2009 年 9 月 30 日			
中時報系	聯合報系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113 篇	179 篇	287 篇	115 篇

筆者用「中正紀念堂」為關鍵字所搜尋到的各大報筆數統計，結果如表 4.1 所示。由於用此關鍵字搜尋時常包含一些無關的「生活新聞」，因此這裡的數字是扣除掉無關的新聞之後所整理的筆數統計。其中可以發現《自由時報》的新聞量明顯多於其他報紙，由此可見《自由時報》對此議題的重視。

（二）主張更名的政治化敘事

蔣中正在 1975 年 4 月 5 日逝世之後，行政院與治喪大員會議決議在台北市興建「中正紀念堂」，並於 1976 年蔣中正誕辰紀念日（10 月 31 日）正式破土動工興建，至 1980 年完工、才正式對外開放。¹³¹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在徵求設計公告時，於公告中載明「表達中國文化精神」作為設計準則之一¹³²（黃嘉琪，2004: 18-19）。這座充滿「中國」文化象徵的建築物於是從此成為台北市的重要地標。它不但是來台旅客最常遊覽的景點，對於台北縣、台北市市民而言，也是休閒活動的重要去處。（黃嘉琪，2004: 1）這樣一個原先具有威權神聖涵義的公共空間，在經歷台灣社會民主化、自由化的發展之後，也因多元的空間使用者被賦予了多重意義。¹³³中正紀念堂具有的政治性便逐漸退到歷史詮釋的場域，它的存在成為了國族認同鬥爭的戰場。

在前一節中，我們已提及此更名事件的背景根植於與統獨認同相關的轉型正義行動。對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而言，在所有「去中國化」、「去蔣化」的更名行動裡，「中正紀念堂」做為如此具有濃厚「中國」象徵以及威權統治遺緒意涵的建築物，自然成為重要的政策施行對象。於是他們站在推翻國民黨過去奠定的國族敘事的基礎之上，試圖揭露中正紀念堂名稱的威權統治意涵，並且透過更名行動，將這個公共建築與空間政治化，尋求改變的可能。

民進黨政治菁英推動一連串更名行動的論述基礎，是建立在 2006 年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由於書中的研究指

¹³¹ 參考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全球資訊網之【緣起沿革】：

<http://www.cksmh.gov.tw/index.php?code=list&ids=23>

¹³² 參考（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1975: 83）

¹³³ 例如黃嘉琪（2004）就在其碩士論文中指出三月學運、各種選舉造勢或政治抗爭對於中正紀念堂公共空間的「再政治化」，以及一般市民對其空間使用的「庶民化」。參考《都市公共空間的歷史轉化—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出蔣介石要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此宣稱因此成為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論據來源。以下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從政者為了向民眾論證更名行動的正當性所生產的政治化敘事，而這種政治化敘事的內涵扣緊了轉型正義的主題。

首先，發起更名提案的民進黨黨主席游錫堃，便在 2007 年 2 月 7 日表示：

「去年有關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處理報告，清楚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但到現在蔣介石的生日和忌日還是國家紀念日，還有中正紀念堂，蔣介石的銅像在全國仍是到處挺立、全台各地也都有中正路，而蔣介石的相片還在鈔票上，這些都必須全面更改。游錫堃表示，很多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屬仍主張責任不夠明確，站在執政黨、政府的立場，應該讓歷史大是大非很清楚、明確，民進黨必須加快腳步努力。」¹³⁴此後民進黨立委高志鵬也呼應：「經過歷史專家學者深入調查，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但台灣人民非常厚道，沒有對蔣介石的銅像有任何破壞行為，但是，台灣已經民主化多年，有必要再殘留舊威權時代象徵，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去供奉蔣介石嗎？」¹³⁵

當時的陳水扁總統也表達了對於更名行動的支持：

「總統認為，雖然直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對蔣介石抱持一份特殊的感情，但依據相關史料及政府檔案，確認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殆無疑義。今天我們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但二二八元凶卻繼續享有猶如封建帝王般特殊待遇，同時在二二八事件及整個戒嚴期間，所有戕害台灣人民基本人權的施暴者與加害人，無一人受到法律追訴與國法制裁，這對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情何以堪？…總統指出，去年介壽館正名為總統府，中正國際機場正名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並拆除國軍營區二百多座銅像，這是我們嚴肅面對歷史的第一步，至於慈湖陵寢與中正紀念堂，未來在處理過程必然會遭遇許多阻撓與對抗，但我們堅信公平與正義終究會實現，台灣人民也一定會以具體的行動和正確的選擇，讓台灣早日揮別舊時代的陰影，而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¹³⁶

而在 2007 年 12 月 7 日拆除「大中至正」匾額的當日，教育部主任秘書莊國榮則再度闡述更名行動的理由與正當性：「希望透過台灣民主紀念館更名，能給過去受難者一個比較公道的交代，也讓台灣對威權統治做象徵性的告別，使過去戒嚴及一黨獨大這種專制而不民主的時代畫下休止符，台灣才能往更自由民主的

¹³⁴ 參考〈游錫堃籲馬英九不再向獨裁者謁靈〉，《中央社新聞》，2007 年 2 月 7 日。

¹³⁵ 參考〈綠委促速「處理」中正紀念堂〉，《自由時報》，2007 年 2 月 12 日。

¹³⁶ 參考〈陳水扁：蔣介石詳知 228 屠殺事件〉，《自由時報》，2007 年 2 月 26 日。

未來前進。」¹³⁷

如第一章所談到的，從政者基於政治場域的運作邏輯，為了說服選民支持他們的政策，會從文化結構汲取出有說服力的政治敘事來獲取政治正當性。在中正紀念堂更名的議題上，民進黨政府延續了自八〇年代黨外時期批判「外來政權」的敘事，並且結合晚近關於「轉型正義」的敘事。這樣結合過去與新近浮現的文化建構的敘事強調：為了達到國家正常化、平反過去大規模人權侵害的目的，我們有必要將空間地景中具有威權象徵涵義的名稱、紀念物予以更換和去除，如此才是民主轉型的完成。如此將「中正紀念堂」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或是將一系列「中」字企業更名的作為，企圖用另一種國族敘事取代國民黨所教化的舊國族敘事。這種牽涉到認同鬥爭的敘事特質，也反映在贊成更名行動的政論文章中。

例如《自由時報》的一篇社論〈民主國家不應膜拜威權政權的象徵符號〉便提到：

「民進黨政府最近積極推動高中歷史教科書改版、中油等單位正名、移走蔣中正銅像，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撤走駐守兩蔣陵寢的憲兵等，實具有「去除威權遺緒」與「去除外來政權遺緒」的雙重意義。…只有落實轉型正義，徹底「去除威權遺緒」與「去除外來政權遺緒」，台灣方可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台灣的民主化正缺乏如此的臨門一腳，以竟改革之功，因此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領域不乏專制、獨裁的異化逆流，阻礙了民主制度的運作與社會公義的落實。」¹³⁸（粗體為筆者所加）

或者另一篇〈【自由談】獨裁者的捍衛隊〉也這樣認為：

「看呀！獨裁者蔣介石的徒子徒孫跳出來了，馬英九、郝龍斌、李永萍、蔣孝嚴、費鴻泰、賴士葆、林郁方、蔡正元、曾永權等等，紛紛跳出來「保蔣」，他們捍衛的是獨裁者蔣介石死後仍然騎在台灣人民頭上，獨裁者的徒子徒孫，眼中還有台灣人民嗎？…在台灣已是民主國家的現今，供奉獨裁者惡靈的皇陵殿堂仍然存在，已十分荒唐，而獨裁者的徒子徒孫們，還藉著獨裁政權遺留的政治惡勢力，反對將獨裁者蔣介石從霸座上拉下來，連皇陵宮牆要改造、拆除部分，都反對到底，還要發動遊行捍衛「蔣陵」。…屆時，誰是獨裁者的捍衛隊？誰是獨裁者的徒子

¹³⁷ 參考〈莊國榮：更名是對威權統治作象徵性告別〉，《中央社新聞》，2007年12月7日。

¹³⁸ 參考〈民主國家不應膜拜威權政權的象徵符號〉，《自由時報》，2007年2月9日。

徒孫？台灣人民正可看個清楚明白！」¹³⁹（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民主國家不應膜拜威權政權的象徵符號〉一文的敘事，我們可以發現「去除外來政權遺緒」的說詞，暗示了「兩蔣」、「中國」的文化象徵相對立於「在地的台灣象徵」，並幾乎等同於「威權統治遺緒」，且共同作為邁向真正民主國家的絆腳石。而上述〈【自由談】獨裁者的捍衛隊〉一文的敘事中，「獨裁者的徒子徒孫」與「台灣人民」的二元對立，則反映了此種轉型正義敘事所繪出的象徵疆界，將不支持更名行動的「保蔣派」人群排除在外、並將他們建構成轉型正義行動的敵人（妨礙者）。而「台灣人民」則被納入敘事的意義邊界，他們是轉型正義敘事訴說的重要對象。

中正紀念堂最初的政治性，來自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建構的中國民族主義敘事。在這個敘事結構中，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世界的偉人」，他做為反共抗俄的重要領袖，也是一個（中華民國）的象徵，因此死後需要被盛大的紀念。這是當初中正紀念堂興建的理由。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中，中正紀念堂作為一種象徵，被置放在崇高的、神聖的位置，完全相對立於台灣認同的轉型正義敘事中被賦予的政治意義，因而這種轉型正義敘事是在原先蔣介石與中正紀念堂的政治性之上，進行二度的再政治化。而這種對立的歷史詮釋現象，是由於從不同敘事者的主體位置出發，賦予歷史經驗或事件在不同的整體情節中不同的位置與意義所致（蕭阿勤，2008: 341）。

（三）反對更名的去政治化敘事

相對於民進黨政治菁英企圖更名的言論與行動，在野的國民黨政治菁英的回應中，「去政治化敘事」扮演重要角色。由於民進黨的轉型正義主張具有鞏固某種社會連帶、排除某些人群的效果，對於國民黨從政者而言，這種主張等於詆毀了他們過去所建構的認同。因此才會以迴避的、訴諸於其他價值的去政治化敘事，作為對轉型正義主張的反擊。國民黨在野期間，主要以「拼選票」、「挑起社會對立」、「破壞古蹟」等去政治化敘事，來反制、攻擊民進黨執政者政治化的更名行動。至於重回執政之後，則把復名的政治爭議化為一連串行政程序，同時運用舉辦專家學者論壇的方式，把論辯的過程和結果「外包」給學術界去承擔。對於國民黨從政者而言，復名變成一項「只做、不需要解釋」的行動。在此「恢復」的邏輯之下（相對於國民黨所指控的「破壞」而言），目的在於「還原古蹟的本來面貌」。然而「蔣中正」的政治象徵畢竟無法真的去除，這種去政治化的操作企圖造成「存而不論」的結果。對那些反對意識型態政治鬥爭的人們來說，「復名」只是顯現國民黨從政者依然在意中正紀念堂的名稱（真的不在意就不應有任

¹³⁹ 參考〈【自由談】獨裁者的捍衛隊〉，《自由時報》，2007年3月7日。

何作為）。復名行動期間所引發而具有「反意識型態政治」傾向的敘事，¹⁴⁰突顯出晚近台灣社會日益厭惡政治象徵鬥爭、甚至「厭惡政治」的普遍心態。這種厭惡意識型態政治的敘事，雖也被部分藍營從政者（甚至民進黨從政者）用來當作政治論述，但根據特定事件發展的情節，和此敘事出現的脈絡，仍可反映出它和國民黨從政者的一般去政治化敘事的差異。以下的討論，將以 2008 年的政黨輪替做為分界，分別探討國民黨從政者於在野和執政期間所展現的論述和行動，究竟有何去政治化的特質。並且在第四部份討論某種具有「反意識型態政治」意涵的敘事、及其社會效應。

1. 在野期間：「選舉操作」、「挑起對立」、「依法行政」的去政治化敘事

國民黨從政者在野期間針對民進黨執政者的轉型正義行動所生產的去政治化敘事，主要可以分為手段和目的兩個面向的批判。以手段而言，由於當時的民進黨政府繞過國會修法的程序，透過將中正紀念堂由行政院三級單位降格為四級單位的方式，讓中正紀念堂直接由行政院管轄、並依此推動中正紀念堂的更名。這種程序上的爭議，便被國民黨從政者指責為「違法」、「破壞古蹟」、「獨裁」，並且連結到「選舉操作」、「製造對立」這種目的和動機的質疑。

首先，我們可以來看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力抗中央 只為守護法治〉一文中，對民進黨政府更名手段的批評：

「我們不能接受的是，中央官員罔顧法律程序，逕以行政命令推翻法律強行改名，且在溝通過程中屢以不實訊息欺騙市府對於揭牌當天所做的安排。如果我們的社會對於行政單位公然違法亂紀的作為視若無睹，對於以欺瞞手段達成目的的政客無所譴責，那我們無法想像台灣的民主政治將會如何沈淪。我們反對以假民主之名，行違法之實的新威權巨靈，摧殘了得來不易的台灣民主。作為台灣民主價值的信仰者及守護者，不管中央政府如何阻撓，我們別無選擇必須以市府的力量依法來捍衛台灣的民主法治。這不但只是執行文資法與否的層次，更是為了捍衛我們大家共同珍惜的民主成果。」（郝龍斌 2007）（粗體為筆者所加）

另外，《中國時報》的社論〈行政命令能輕率的改變法律位階嗎？—評中正紀念堂降階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中，也有類似的批評：

¹⁴⁰ 這種敘事類型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推動更名行動時就已經存在。一直到政黨輪替之後，也持續否定國民黨從政者的復名行動。如前所述，它同時也是三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傾向的立場。

「執政當局既將中正紀念堂之更名視之為「正名」，卻竟然捨棄法定的修法途徑，以取巧的方式，企圖以行政命令變更中正紀念堂的法律位階。這個遊走法律邊緣的構想，視法律於無物，甚至視憲法於無物，名不正而言不順，民進黨政府的做法，不折不扣是所謂「正名運動」的反諷。…我們曾多次提出呼籲，政府不是一黨一派之政府，而是全民的政府，所有的施政應以多數民意為依歸，施政符合多數民意的基本表徵，就是重大施政、法律、預算需經國會同意，這也是依法行政最根本的精神。…不要忘記：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她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我們的國號並未變更，照陳水扁總統或民進黨政府的說法，至少迄無修憲變更國號的打算，民進黨政府執著於「中華」與「台灣」的統獨圖騰，卻將憲政與法制踩在腳底下。坦白講，民進黨政府不是不能推動其政黨理想，但政黨一切的理想必須依法行之，不是執政即可無視其他民眾感受，一意孤行，上述施政舉措未能得到國會過半數同意，就代表多數民意無法接受，民進黨政府強行為之，就是製造衝突和社會的對立，與民主背道而馳。」¹⁴¹（粗體為筆者所加）

再者，有不少由批評更名的「手段」，進一步到對其「目的」和「動機」的質疑。例如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便批評民進黨政府的更名行動是為了選舉利益：

「馬英九總統候選人表示，牌匾可不可以拆是一項公共議題，是可以被討論的，但民進黨政府卻沒有經過社會共識凝聚，而以獨斷的方式拆除，像是創造另一項威權的體系、獨裁的政府，而且主要目的是為了挑起仇恨、製造對立、奪取選舉利益，他要呼籲大家要冷靜，不要上當，也不要聚眾抗爭，給民進黨一個操弄的藉口。馬英九呼籲反對拆除的人，用選票來制裁這個威權獨裁的政府，而且在他當選總統後，將依據社會共識與法律的程序，對被拆除的名稱，採取必要的回復或重建，讓大家都能夠在法律與民主原則下，保護我們的古蹟。」¹⁴²（粗體為筆者所加）

那麼，為何上述三則例子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敘事」？這要回到第一章導論中，我們對「去政治化」及其現象的定義。如 Palonen 所談到的，政治化創造了行動的機會、讓真實的另一種建構有了可能性；反之，「去政治化」的目的則是限制或抹去其他可能性，它妨礙了行動的機會 (Chilton and Schäffner, 2002: 48)。相對於民進黨從政者用來打開行動空間的政治化主張與行動，「去政治化」在此便是對「政治化」行動的否定。其中「選舉操作」的敘事更呼應了去政治化現象

¹⁴¹ 參考〈行政命令能輕率的改變法律位階嗎？—評中正紀念堂降階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中國時報》，2007年3月10日。

¹⁴² 參考〈大中至正牌匾拆除爭議 馬英九籲選票制裁〉，《中央社新聞》，2007年12月5日。

中的兩個面向：對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負面觀感。這種敘事一方面指責這個場域的行動者是基於自利邏輯奪取選舉利益，而在這種批評中又同時否定了政治本身。但最矛盾的地方是，敘事者本身也是政治人物，為何還會使用這種敘事？我們可以說，這是敘事者（從政者）從社會所沉澱累積的文化結構汲取出有說服力的去政治化敘事來獲取政治正當性的一種方式。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執政者用來反制政治異議份子的「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一）」，以及政治自由化初期產生的「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都沉澱在文化結構之中，成為後來敘事者得以繼續使用的象徵資源。而敘事者生產這種敘事的目的是要說服人民不要被政治化敘事動員，同時將「人民」變成自己的「選民」。而政治人物生產「去政治化敘事」的現象，也等同於反映、強化了去政治化現象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去政治化敘事具有的動員／反動員作用，無疑是強化了黨派政治、加深了政治立場的對立和分裂。

至於「挑起仇恨」、「製造對立」的去政治化敘事，則有把民進黨從政者定位為「問題製造者」、「麻煩製造者」的去政治化功能。「依法行政」的敘事則有突顯前者（「挑起對立」敘事）的效果，並且藉此正當化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啟動文資程序、將中正紀念堂暫列古蹟的作法。「依法行政」敘事呼應了導論提過的「去政治化」特質：它是一個關於建構新的國家「中立」的公眾觀感的方式（Bonefield and Psychopedus, 2000: 22），法律在此被用來掩蓋議題本身的政治性。

如前文所提，國民黨從政者生產的去政治化敘事，也具有「反意識型態政治」的色彩。為了進一步了解這種敘事特質，我們可以參考以下三篇政論的內容：

首先在 2007 年 2 月 8 日時，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於〈希望不在一人〉中，傳達出一種否定意識形態政治的看法：

「在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中，「政治」的本來面目應該是關心全民的福祉，而「人民」也應該是主導和決定政治和自己未來的最終依據。但是台灣目前的問題是：「政治」被扭曲成政治人物的「權力競賽」，「人民」根本只成為這場競賽中的棋子。換句話說，政治人物的私心主導一切，「人民」不但沒有真正當家作主，而且成為政治人物權力鬥爭的馬前卒。…台灣人民現在每天面對的問題是自殺率攀升、薪資縮水、產業外移、貧富差距擴大、犯罪率增加，無力、無奈、無助感充斥我們的社會。…反觀執政黨現階段重視的卻是：移除蔣公銅像、撤離慈湖警衛、中正紀念堂改名、追討國民黨黨產，彷彿意識形態的「淨化」重於人民的快樂、執政能力就是只要會「討債」，而不是有能力為人民創生更多的利益。」

(林火旺 2007) (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中國時報》的社論〈去蔣的政治算計：以轉型正義包裝選舉造勢〉一文中，也以否定意識形態的去政治化敘事、否定轉型正義的正當性：

「政權輪替快七年了，不久前才說要為兩位蔣總統隆重移靈的陳水扁總統，最近突然態度丕變，行政部門也很配合地多方位進行「去蔣」、「去中正」、「去陵寢」的動作，要說這完全沒有選舉考量，大概很多人是不會相信的。…和之前國營機構和郵政公司改名一樣，這些都是政治表態動作，除了象徵意義外，幾乎沒有國計民生的實質價值。由於民進黨執政七年來政績乏善可陳，國家一路倒退萎縮，如今面臨立委及總統兩大重要選舉了，只好再唱起意識形態的樣板戲，在台灣內部切割，激化敵我意識。其功能，首先在凝聚本土深綠選票，強調蔣中正的歷史罪惡，再把昔日的蔣中正和今天的國民黨貼黏在一起，喚起基層對國民黨的惡劣記憶，再對國民黨進行猛烈攻擊。…台灣從威權蛻變到民主，對昔日領袖的施政功過，當然會有新的評價，但必須以理性與事實為基礎。如果一味反向地把昔日領袖從「神」打成「魔」，抹煞所有對台灣的正面貢獻，也不考慮當時的國際環境，那也同樣是反智而不理性的。我們應該學會，不再以陣營立場或標籤出身來作非友即敵的裁判，不必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台灣已經在內鬥殺伐中虛耗了很久，一次又一次地喊殺喊打，找出一個又一個需要痛恨的對象，已經讓民眾非常疲倦了。」

¹⁴³ (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非常接近 2008 年總統選舉的 2007 年底，《中國時報》記者韓國棟在其特稿〈歷史人物 留給歷史評斷〉中，也表達出類似看法：

「蔣介石已成歷史人物，他的是非功過，應由歷史評斷。如果歷史評價功大於過，那是歷史；歷史評價若是過大於功，那也是歷史。歷史人物就該讓他進入歷史，政治人物不該利用歷史人物製造意識形態對立，賺取政治利益。…兩蔣陵寢，早已變成許多台灣民眾及國外觀光客的遊覽勝地，觀光價值高於政治價值；台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堂)的蔣介石銅像，也是觀光價值高於偶像崇拜。…台灣政黨輪替七年多了，「台灣不是早就民主了嗎？」既已民主，就該朝未來的光明大道走去，為什麼現在還要捲進過去的歷史恩怨中？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了，總在選舉之前搬出兩蔣。身為小老百姓的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明年還是民進黨執政，我們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擺脫兩蔣的夢魘？我們不該再讓歷史人物跳回現實的政治舞台，再利用兩蔣製造對立，理性的選民就真的要用選票

¹⁴³ 參考〈去蔣的政治算計：以轉型正義包裝選舉造勢〉，《中國時報》，2007 年 3 月 2 日。

唾棄這些政客了！」（韓國棟 2007）（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以上三段引文，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敘事不斷強調「歷史已經過去」、「不要在現在繼續困守意識形態鬥爭」等等反意識型態、進而反政治的特質。這種意識形態政治被等同於「無意義的政治操作」，而關於「政治」的規範性定義，則被扣連到與國計民生問題相關的範疇，並且進一步形塑了對「執政者」的規範性定義：能為人民創造更多民生福利的利益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這種反意識型態政治的敘事，如同前面已指出的，影響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針對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及民進黨發動種種「去蔣化」行動的回應和處置。「反意識型態政治」變成一項批判政治對手的利器。

此外，綜合以上「選舉操作」、「挑起對立」、「依法行政」、「反意識型態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的特質，我們可以發現反對更名的去政治化敘事，綜合反映了前兩章提過的幾種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它們分別是：

[表 2-1] 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頁 36）

[表 2-3]「民主」、「法治」、「反暴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二）（頁 50）

[表 2-4] 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頁 52）

[表 2-5] 厥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頁 54）

[表 3-1] 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頁 68）

回顧這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的樣貌，我們便會發現在這一章分析的反轉型正義的去政治化敘事，實為前述這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集大成的結果。

表 4-1 反對轉型正義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敘事者	厭惡選舉操作而挑起對立的人民
時間的演進	民進黨執政以來
中心主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強行改名罔顧法律程序、與民主背道而馳。[表 2-3]• 改名是為了挑起仇恨、製造對立、奪取選舉利益。[表 2-5]• 一連串更名行動只是政治表態，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國計民生價值。[表 2-1]、[表 2-4]• 政治應該是關心民生問題福祉的政治、為人民創造更多利益的政治。[表 2-1]、[表 2-4]• 政治不是政治人物進行權力競賽的政治。[表 2-5]• 政治人物不應利用歷史進行意識型態對立、賺取政治利益。[表 2-4]、[表 2-5]、[表 3-1]

情節	<p>開始：民進黨執政以來毫無建樹，不顧國計民生、只會在選前操弄意識形態政治、挑起社會對立。</p> <p>中間：政黨輪替七年多至今、台灣已經民主了，為何要捲入過去的歷史恩怨，在選舉前操弄兩蔣議題。台灣人民現在每天面對的問題是自殺率攀升、薪資縮水、產業外移、貧富差距擴大、犯罪率增加…，這些民進黨政客卻還在操弄意識形態政治，心中無人民，枉顧民生問題。</p> <p>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p>
結論或解決方案	<p>我們要用選票懲罰這個政府，才不會讓台灣社會繼續空轉、虛耗、退步。</p>

從上表的整理，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從政者在野期間對於民進黨政府更名手段的批評，例如對民進黨政府違法、違反民主法治的譴責，呼應了「民主、法治、反暴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二）[表 2-3]；而以製造對立、奪取選舉利益的去政治化敘事，來批評更名動機的方式，則是使用了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5]。再者，認為更名行動缺乏國計民生價值、因此沒有意義的批評，則反映出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1]、與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4]。從以上對轉型正義議題的批評，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批評背後立基於一種對政治的想像，認為政治應該是關心民生問題、為人民創造更多與經濟民生有關的利益的政治，而非政治人物進行權力競賽的政治，所以政治人物不應利用歷史進行意識型態對立、賺取政治利益。綜合來看這些思維呼應了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1]、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4]、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5]、與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3-1]。

我們可以發現，過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形塑了某些人們對政治的認知，而這樣的認知又反過來有利於政治人物以特定方式企圖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議題的態度。從轉型正義的立場來看，它所引起的去政治化的反制，正好反映了此議題動員所面臨的困境。台灣社會分裂的集體記憶，固然是轉型正義無法獲得社會共識的原因；但是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迴避、扭曲此議題的方式，則又更加深了這種分裂。

2. 執政期間：政治=行政程序、「兩蔣」商品化的去政治化邏輯

前面我們討論了國民黨從政者在野期間反對更名的去政治化敘事，這裡要呈現的則是他們重回執政之後，如何進行去政治化的實作。2008 年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國民黨總統馬英九表示會根據社會共識與法律程序進行中正紀念堂的復名。然而如前文所述，為了尋求社會共識所舉辦的公民論壇，實質上邀請的是政

治、社會、社區營造、都市改革等專家學者的社會菁英，並非讓全民參與這個議題；而且論壇討論的主題是「自由廣場復名與否」，而非台灣民主紀念館要不要改回中正紀念堂這個課題。對於中正紀念堂本身的復名爭議，國民黨從政者並未交付社會討論，就直接化為一連串行政程序進行復名。這種作法所依據的便是前文討論過的：「依法行政」的去政治化敘事。依據法律來行政、來進行治理，這種邏輯本身便是將政治爭議懸置的去政治化操作；而公民論壇也是一種將論辯的過程和結果「外包」給社會菁英去承擔的方式。所謂依法行政與公民論壇，正如第一章中指出的，無疑將具有決策能力的政治人物在政治過程中的角色加以排除，有助於建構其中立的角色。這個復名的過程中，從政者並沒有正面回應、解釋復名的原因，中正紀念堂名稱的「政治性」因此被懸置起來，但實際上復名行動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議題。

至於重回執政的國民黨從政者如何進行「反意識型態政治」的實作，我們可〈去政治化〉一文中的觀察做為補充。胡俊佳發現，相對於民進黨在執政期間以「去蔣」作為建構台灣人身分認同的方式，桃園和台北市這兩個國民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則是在「去蔣」的社會脈絡下，透過重新包裝如兩蔣文化園區、草山行館等與蔣介石、蔣經國兩父子有關的建築物，把「兩蔣」這概念聯繫到觀光發展，再從中強調其對陸客的吸引力，重新賦予「兩蔣」在經濟的發展價值，來對抗民進黨執政者的「去蔣」策略和背後強調蔣介石的政治意義（胡俊佳 2010: 5）。「兩蔣」作為地方觀光資源的政治性，反映在其表面上去政治化的經濟想像，把政治上歌功頌德的一面再現為藝術和創意產業，並隱藏政治爭議的面向。但去政治化的淡化和藝術化處理後再現的，其實是再政治化的效果，再鞏固兩蔣作為「領袖」、「偉人」的政治想像，以及國民黨治理上的意識形態（胡俊佳 2010: 9）。

若我們檢視民進黨執政期間就已經存在的、強調「兩蔣」景點之觀光經濟價值的去政治化論述，則可以較深入的理解胡俊佳的論點，以及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對此議題的種種作法。例如 2007 年 2 月 6 日，傳記作家王丰便在〈去蔣中正化 和鈔票過不去〉一文中認為，「蔣中正」的象徵（symbol）是可以賺盡鈔票的「財源」，充分表達了商品化的去政治化邏輯：

「中正紀念堂改名？有沒有搞錯！台北的中正紀念堂，桃園的慈湖和頭寮陵寢，一年光是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就何止上百萬人，週邊地區的商家都受惠於蔣中正；地方經濟活動，有一大半靠死後的蔣中正庇佑他們。…別再關門暗爽了，整天搞狹隘的「去XX化」，搞到最終，只不過是和老百姓的鈔票過不去，只不過是想搞砸老百姓愈來愈小的飯碗。…如果中正紀念堂可以為台灣賺鈔票，可以帶來如潮水般的觀光客，為什麼要改名字？一個開明而智慧的政府，不但不應去改中正紀念堂的名字，反而應該投下更多經費預算，把紀念堂裡裡外外好好維護修繕。政府的角

色是要扮演財神爺，而不是去當擋人財路的光棍。立委也不是整天只知意識形態鬥爭，盡幹些把財神爺往外推的傻事。如果中正紀念堂真的要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日後還有什麼觀光客要到這裡來？…你們以為台灣民主有多偉大嗎？政府和立委除了「正名」，什麼施政成績單都拿不出來，這種蠢政府和笨立委要他幹啥！」（王丰 2007）（粗體為筆者所加）

類似這種看法，如《中國時報》的時論〈兩蔣效應迷思〉中，也強調要多一點民生、少一點政治：

「兩蔣議題爭論既難論斷，e 世代年輕人已想出「去講話」創意作品，巧妙地把 1200 張生活照片，拼湊成「蔣公遺像」；搞怪作品甚至加入 kuso 元素，顛覆威權政治刻板印象，兩蔣創意商品因應而生。對照台灣年輕人的創意，大陸浙江奉化溪口鎮不必搞什麼創意，光靠炒高台、蔣經國故居幾個蔣氏故里景點，一年就吸引 370 多萬人次觀光客，足以讓溪口鎮民安居樂業。…多一點民生、少一點政治，自然可以走出兩蔣效應迷思。不論縣府推出的慈湖創意市集、或大溪鎮公所有意原樣展示被支解銅像碎片，都可以吸引更多觀光人潮，總比竟日為兩蔣功過爭吵不休，來得更實際、有意義。」¹⁴⁴（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甚至還有一種認為「兩蔣」作為一種商機，能夠促進兩岸和解的看法，例如《中國時報》記者黃文杰在〈搭起觀光橋樑 兩岸人人有蔣〉中指出：

「在一片「去蔣(中正)」、「護蔣」聲浪中，桃園縣選在春江水暖之日，遠赴對岸奉化溪口，進行觀光文化交流，確實跳脫出傳統政治思維，努力開闢「第三條路」。…大陸如何看待兩蔣定位？對大溪兩蔣文化園區有無興趣？不是政商高層嘴巴說說，這需要面臨嚴峻考驗，觀光旅遊人數肯定騙不了人。不論台灣或是大陸，早就不分彼此，成為一大商圈，「商機」是共同語言，過去漢賊不兩立，感情不夠親，如今蔣家給了大陸台灣和解機會，別忘了：「人人都有獎(蔣)」。」（黃文杰 2007）（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以上三段強調要利用「兩蔣」的商機拼經濟、讓民眾安居樂業的敘事，可以發現這是一種用「兩蔣」強調蔣氏政權歷史背後的觀光發展和經濟效益，來擱置、甚至否定民進黨政府欲指出的政治爭議，並作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操作。此敘事中強調的「民生」、「經濟」的價值優位性，呼應了威權統治時期以「人民」為角度出發所強調的「拼經濟價值」，即[表 2-1]的「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

¹⁴⁴ 參考〈兩蔣效應迷思〉，《中國時報》，2007 年 4 月 5 日。

模式」。此外，透過對民生問題的強調、來否定「去蔣化」的意識型態政治，也反映出 1990 年代出現的「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4]。而上述記者黃文杰的敘事所顯示的意涵，更是一種晚近浮現的新現象，即用「經濟活路」達成「兩岸和解」的思維。儘管這是 2008 年政黨輪替之後才明顯興旺的現象，然而在此時卻已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這種表面上去政治化、實際上再政治化（亦即將兩蔣再政治化為「領袖」、「偉人」的政治想像）的邏輯，反映在執政後的國民黨極力推銷兩蔣文化園區、開放後慈湖等文化觀光產業的措施上。2008 年 4 月，桃園縣政府特別規畫慈湖系列活動，在慈湖遊客中心南北廂房規畫了「農特產紀念品展售中心」和「黃埔食堂」，提供民眾商品展售服務，讓遊客能在慈湖遊客中心品嘗到在地美食、蔣家菜或購買當地農特產與兩蔣紀念品。¹⁴⁵另外，4 月 4 日起則有一連三天的公仔嘉年華，在慈湖雕塑公園邀請近 10 家民間業者，展示各式創意公仔。¹⁴⁶6 日，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前往頭寮謁陵、並參加慈湖旅遊季，為這項活動及全國最大蔣中正座像再造重生揭幕，並在活動上指出：「兩位蔣總統的歷史功過應待歷史學家討論，他們留下的許多資產，已成為重要歷史文化及觀光資產，縣府應好好發展利用。」¹⁴⁷至 2009 年，由於適逢慈湖行館籌建完成五十周年、及蔣經國先生百年誕辰，桃園縣政府更結合慈湖風華五十年、慈湖遊藝嘉年華、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湖上音樂會以及 5 月 1 日「後慈湖的重新開放」等系列活動，組合成 2009 年「來桃園遊蔣慈湖旅遊季」。¹⁴⁸

回顧國民黨從政者由在野到執政所生產的去政治化行動敘事，可發現這些「選舉操作」、「挑起對立」、「依法行政」、「反意識型態政治」、以及將「兩蔣」商品化的去政治化敘事，充滿了第二、三章提過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的特質。其中有：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民主、法治、反暴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二）、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以及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我們可以看到，透過轉型正義的議題與其引發的事件，讓這些不同的敘事模式有了整合起來的機會，並因此造成晚近興盛的去政治化現象。這些不同的敘事模式相互貫穿、連成一個更大的整體，形塑了更普遍的去政治化文化。

（四）冤冤相報何時了？針對復名行動的社會回應

2008 年總統大選之後，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即表示有意恢復中正紀念堂名稱。即使國民黨從政者依據的理由是「改名違法」，所以要依法行，政將名稱改

¹⁴⁵ 參考〈遊後慈湖 買紀念品吃蔣家菜〉，《中國時報》，2008 年 4 月 2 日。

¹⁴⁶ 參考〈春遊慈湖 公仔與蔣公同在一起〉，《中國時報》，2008 年 4 月 5 日。

¹⁴⁷ 參考〈慈湖再爆人潮 馬噙淚祭兩蔣〉，《中國時報》，2008 年 4 月 6 日。

¹⁴⁸ 參考〈兩蔣慈湖旅遊展 商機可期〉，《中國時報》，2009 年 3 月 27 日。

回，但「復名」行動仍充滿了恢復威權統治時期賦予的舊政治意涵的意味。國民黨從政者的作為易讓人質疑：他們是否仍然在意中正紀念堂的名稱？否則為何要冒著引起社會對立的風險、來推動這件事？對於國民黨執政者的作為，社會輿論也產生了以下的回應。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各打五十大板」式的政治評論。如《蘋果日報》的蘋論〈幼稚荒唐〉一文便指出：

「台灣政治文化之幼稚荒唐可笑，可由中正紀念堂招牌又被掛回去看出來。兩年前，扁政府拆下那塊招牌，掛上自由廣場時，我們就預測馬當選後一定換回來，因此建議用跑馬燈代替招牌匾額，以免換黨執政就換招牌，浪費我們納稅的錢。現在果然如此。兩黨都沒把納稅人的錢當回事，非常可恨。」¹⁴⁹（粗體為筆者所加）

再來則是由反意識型態政治的觀點出發，批評國民黨執政者作為的政治看法。如《中國時報》的短評〈不必以牙還牙〉便寫道：

「當初沸沸揚揚的「正名」運動，包括中華郵政、國營事業、中正紀念堂及牌樓、中正機場等等，被批評為程序粗暴，政府正事不做，卻勞民傷財大搞意識形態，造成社會對立，這是中間選民最後拋棄民進黨的原因之一。…如今政權即將再度輪替，也許若干藍營支持者覺得終於出頭天了，想把被改變的東西重新復原，讓台灣再回到熟悉的模樣，但馬英九能夠勝選，就是因為台灣大多數民眾實在厭倦了無謂的意識形態對抗，這些圖騰不是施政的當務之急，如果民進黨勞民傷財改一次，國民黨上台後又勞民傷財再改一次，難免給人以暴易暴的觀念。…國民黨好不容易才得到重新執政的機會，必須好好珍惜，應該對已經受傷很深的深綠群眾給予更多體諒包容，才能弭平八年來的社會撕裂。執政權都拿到了，格局應該放大點，不要再忙一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¹⁵⁰（粗體為筆者所加）

還有一種從民主社會的角度來批評的政治意見。如《蘋果日報》中某兩篇蘋論的看法。一篇題為〈封建幽靈〉的評論指出：

「深藍有意要逼馬英九還原中正紀念堂、郵局等改過的機構名稱，是完全沒必要的。試想，一個民主總統，還要去紀念一個過去的獨裁者，不覺得奇怪嗎？國民黨深藍文化的危機其實不只是黑金復辟、國會亂政，還包括復辟過去的保守封建和宮廷文化。那種封建宮廷的屍居餘氣，也是過

¹⁴⁹ 參考〈幼稚荒唐〉，《蘋果日報》，2009年6月30日。

¹⁵⁰ 參考〈不必以牙還牙〉，《中國時報》，2008年3月29日。

去民間厭惡國民黨，而兩次要它下台的原因。…有意要恢復中正紀念堂等等的復辟做法，就是在反映他們過去靈魂上的舊烙印。阿扁專門搞這套，把民進黨政權搞垮；深藍若逼馬拼老命搞反攻倒算，與扁何異？徒然讓支持馬的綠色選民失望罷了。」¹⁵¹（粗體為筆者所加）

另一篇〈風雨蔣陵〉則認為：

「馬英九以國民黨的改革者自居，首先就該釐清現在的國民黨和威權時代的國民黨的關係。更應告訴國人現在的國民黨不再搞個人崇拜，不再把過去獨裁總統、威權領袖當成皇帝、把他們的墓當成皇帝的陵寢。…馬英九也應該表明日後將以私人身分，而非率領文武大員，到大溪憑弔蔣經國。馬英九別忘了，蔣經國生前是個托派革命者，反個人崇拜不遺餘力，馬英九去「謁陵」對蔣經國並非推崇，對民主台灣則絕對是個羞辱。」¹⁵²（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第一、二則敘事，可以看到其中反映了厭倦兩黨意識型態鬥爭的政治態度，這種態度認為「改名」、「復名」與否的爭議幾乎是無解的，而且都是與老百姓生活無關的政客之爭。〈幼稚荒唐〉一文的敘事以一種較為嘲諷的眼光看待兩黨推行更名與復名的行動；〈不必以牙還牙〉的敘事則站在反意識型態政治的立場，試圖糾正國民黨執政者的復名行動，並強調社會和諧的重要性。至於後兩則的〈封建幽靈〉與〈風雨蔣陵〉，則呈現了較為深刻的政治思考。這種看法意識到轉型正義議題試圖揭露的社會矛盾，即紀念一個獨裁者究竟是否適當的課題。它從民主社會的角度出發來看待這個歷史議題，也因此對重新上台的國民黨執政者產生新的期待。這兩則敘事反映了解嚴二十年以來，台灣社會邁向成熟民主社會的進程中，所發展出來的對歷史更深入的反省與批判。這種民主化所培育的民主意識，值得正視與肯定。

¹⁵¹ 參考〈封建幽靈〉，《蘋果日報》，2008年3月31日。

¹⁵² 參考〈風雨蔣陵〉，《蘋果日報》，2008年4月7日。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首先透過「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始末的回顧，指出這樣一個與統獨爭議、認同問題相互糾纏的轉型正義議題，如何在民進黨執政末期的強行推動之下，演變成一場中央與地方政府（台北市政府）的政治鬥爭。在此過程中，民進黨從政者藉由政治化的轉型正義敘事來正當化更名行動，並引起國民黨從政者以去政治化的敘事、做為反對更名的武器。這種去政治化敘事呼應了「對政治的負面認知」與「對從政者的負面印象」這兩個層面的去政治化意涵。它將與統獨、認同問題相關的政治等同於好鬥的、挑起對立的政治，並指出操弄這種議題的政治人物是追逐自身政治利益的政客。這樣的去政治化敘事在 2008 年二度政黨輪替之後，仍繼續影響民進黨執政末期以來的「去蔣化」議題，因而上演更名行動的續集——中正紀念堂復名事件。

國民黨從政者重回執政以後，便持續透過去政治化的政治敘事與行動，以「依法行政」為由，將政治爭議化為行政程序並展開復名。同時他們也經由強調「兩蔣」具有的觀光和經濟價值，重新開放慈湖等相關景點，以此抗衡民進黨從政者的政治化敘事、淡化「兩蔣」的政治爭議。但實際上在操作的過程中，仍然強化了兩蔣作為「領袖」、「偉人」的政治想像，做為去政治化之後的再政治化。而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從政者從在野到執政所生產的種種去政治化敘事，一再呼應了過去曾經生產過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這些從歷史中存續下來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通過了此一事件而被重新集結起來，成為反制轉型正義行動時包羅更為廣泛的敘事，也形塑出晚近更普遍的去政治化現象。

在這種興盛的去政治化現象中，「政治」成為一顆燙手山芋，而涉及統獨、人權、省籍、轉型正義等被歸於「政治議題」的相關政治爭辯，也共同揹負起「政治」的污名。在此種去政治化的政治中，被再政治化的政治則成為「與民生經濟議題相關的政治」，對政治人物的期待則變成「政府應是老百姓的財神爺」。當對「政治」的規範性定義日益變成如此，也就離強調經濟優先、反對政治干預的第三個去政治化現象的層面愈來愈近了。強調經濟優先、反對政治干預，正是 2008 年底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支持者主要的去政治化敘事的中心主題，而這有待下一章的分析。

第五章 經濟優先：2008 年陳雲林訪台風波

從 2007 年年頭至年尾「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發生的時間點，適逢 2008 年總統選舉前的競選過程。而在上一章裡我們也談到民進黨執政末期、至國民黨執政初期之間，台灣社會中「反意識形態政治」的去政治化傾向，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同時強調了「民生經濟議題」的重要性。民生經濟議題，正是國民黨在競選過程中政見的主軸。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經貿政見，便是用「全球化」的語言為台灣社會的經濟議題指出一個方向。如馬英九與蕭萬長候選人的競選海報中，便以「開放見藍海、活水救經濟」作為海報的標語，強調參與全球經濟整合活動、整合全球與亞太市場等等經濟策略。¹⁵³

因此，從這個角度可以發現，「反意識形態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與強調市場力量、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在意義上可以相互連結，成為一個更大的整體，兩者之間也具有相互強化的作用。而在本章我們便要討論去政治化現象的第三個層面：反對政治干預的市場決定論，如何從最近台灣的歷史中生成，它又如何透過陳雲林訪台引起的風波更加成形，產生了何種社會後果。反對政治干預的市場決定論，在二十世紀末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在國際上相當流行，而台灣也不例外。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又給予這種去政治化現象延燒猛烈的燃料。

第一節 一個去政治化的經濟議題

(一) 兩岸經貿交流的昔日與今日

兩岸經貿交流是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漸進過程。1987 年尚未解嚴以前，兩岸處於敵對狀態，國民黨政府對中共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1987 年解嚴以後，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台商開始到中國大陸投資，兩岸經貿交流才日趨頻繁。特別是 1992 年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實施，讓兩岸經貿交流正式確立法源基礎（魏艾，2009: 8,10）。

由於台灣與中國特殊的政治敵對關係，使得兩岸之間的經濟議題充滿了政治的考量，並非一個純粹的經貿問題。例如 1979 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裡，首次提出三通（通郵、通商、通航）的主張，這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對台政策由武力解決轉變為和平統一，而「三通」成為中共「以通促統」對台最重要政策方針（柯春共，2003: 159）。¹⁵⁴ 1992 年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更於中共「十四大」政治報告上重申：「我們將繼續

¹⁵³ 參考馬蕭競選網站：<http://www.ma19.net>

¹⁵⁴ 參考《人民日報》，1979 年 1 月 1 日。

促進兩岸直接通郵、通商、通航，推動兩岸人民的往來和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特別是大力發展兩岸經濟合作，共同振興民族經濟。我們再申：中國共產黨願意同中國國民黨儘早接觸，以便創造條件，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在商談中，可吸收兩岸其他政黨、團體和各界有代表性人士參加」。(柯春共，2003: 161)

面對中共領導人的政治喊話，1996年時，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的李登輝，才會於「國統會」上提出「戒急用忍」的具體政策，要求兩岸經貿往來須考慮政治風險、並放緩兩岸經貿交流的步伐，作為對中共對台經貿政策的間接回應。在此原則之下，許多交流項目被擱置或取消，同時也嚴格管制和審查大企業赴大陸投資(魏艾，2009: 8,10)。然而，這種對兩岸經貿交流的政治考量仍然效果有限。如郭圍洲(2002)對「戒急用忍」政策的研究便指出，企業本身對於「戒急用忍」政策表面雖然遵從，但絕大部分還是採迂迴方式赴大陸投資，增加企業成本。中共方面則採反制「戒急用忍」政策給予台商優惠措施，加強招商(129)。這種現象顯示：台灣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政治干預相對鬆綁，大企業不像過去那樣依賴國家機器對國內市場的保護為利益基礎，相對的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聽從國家機器。資本家的政治勢力甚至還可能進入決策中心，其主張和利益反過來影響決策的方向和執行(王振寰，1997: 26)。

此外，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則作為影響兩岸經貿關係的另一個外部因素。從1990年代開始，由於受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影響，亞洲在1989年由澳大利亞總理霍克(Robert Hawke)的倡議之下，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官方經濟合作論壇之一。¹⁵⁵而東亞也在1993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sian Free Trade Area, AFTA)(傅雅伶，2004: 96)。當亞洲、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成為一種新的局勢，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此新遊戲規則成為用來矮化台灣主權、「以商促統」的極佳政治籌碼。

1991年台灣成為APEC正式會員，但由於中國政府的阻撓，台灣只能派相關經濟部長或官員參加APEC的部長級會議與其他專業部長(專家)會議，台灣元首或正副外交部長無法出席APEC會議。從1995年開始，台灣雖然積極爭取舉辦會議的權利，並希望由總統親自參加往後的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然而都因中國政府的介入而作罷(傅雅伶，2004: 82-83)。在中國、台灣於2001、2002年相繼成為WTO會員之後，中國政府不僅積極進行經貿外交、洽簽FTA，同時也把FTA當成是圍堵台灣的外交工具。中國透過與東協FTA的簽訂與其他政治外交條約的締結，以及對「一個中國」的共同宣示，使東南亞形同中國的後院，

¹⁵⁵ 參考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32163&ctNode=291&mp=1>

台灣在該區域的外交空間已被大大壓縮。具有強大經濟實力與龐大的貿易總額的台灣，照理應是各國尋求洽簽 FTA 的主要對象之一。然而，由於中國的打壓與排擠，使得台灣現階段要尋求加入東亞地區多邊或雙邊的 FTA 皆有困難（傅雅伶，2004: 125）。

伴隨著中國政府孤立台灣的經貿政策，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台灣與中國共同加入 WTO（世界貿易組織）、並在同一經濟架構下運作，對於兩岸經貿關係產生的影響。WTO 做為經濟全球化的產物，自然會促成兩岸經貿交流更密切的互賴關係，讓前總統李登輝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更不可能持續下去。2001 年 8 月 26 日，當時的總統陳水扁召開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經發會）會議上，便決議鬆綁「戒急用忍」政策，改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來取代之。（傅雅伶，2004: 123）顯示出政黨輪替初期，執政黨對於全球化趨勢的妥協。然而在經濟日趨依賴中國、政治卻依然敵對的矛盾情況下，為了解決此問題，晚近台灣社會內部逐漸出現一種試圖將統獨議題懸置不理、以此向中國政府表現善意，用改善兩岸關係來換取經濟利多的去政治化論述。這種強調「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並以經濟為優先的論述生產者，以藍營政治人物為最。例如國民黨於 2008 年的總統大選的經濟政見，便是以「經濟優先、台灣再起」、推動「兩岸共同市場」等強調經濟開放的政策為主軸，其內容都是提倡解除兩岸經貿交流的政治考量與政治干預。但除此之外，不少坊間強調國家競爭力的大眾書籍（如大前研一的書系）、以及關於研究兩岸經貿關係、晚近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的學術作品，也持相似的論點。

因此，台灣晚近的這種去政治化現象，實為民主轉型後政治權力結構改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兩岸政治關係的特殊歷史背景所共同造就的結果。兩岸經貿交流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議題，但在晚近它的政治性卻遭到去政治化思維的消解。與此同時，這股力量也引起了相反的作用力——即試圖與它抗衡的政治化力量的對抗。這樣的態勢構成了 2008 年陳雲林訪台風波的背景。

（二）兩岸經貿的新自由主義政治

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後，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於 2008 年 11 月來台簽訂的四項協議（直航、海運、郵政合作與食品安全問題四個面向），不但屬於「三通」的範疇，也與國民黨「兩岸共同市場」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兩岸共同市場」最早由國民黨副主席蕭萬長於 2001 年提出，當時蕭萬長卸下行政院長職位之後，便於 3 月 26 日成立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擔任董事長，致力推動兩岸共同市場經貿合作的理念。¹⁵⁶ 蕭萬長曾在「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成

¹⁵⁶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主要透過台灣企業家（包括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前台灣大哥大董事長孫道存、台泥董事長辜成允等人）的捐助而成立，參考〈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張忠謀等人捐資

立的茶會上表示：「『兩岸共同市場』乃是針對兩岸經貿往來作出制度化的保障，俾使兩岸日後交流能有新方向」，他並認為「兩岸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下，應該求同存異——求的是兩岸經貿合作的合，存異則是暫時擱置政治爭議；俾使兩岸能從經濟上的『合』，推展至政治上的『和』，乃至獲得雙贏互利。」¹⁵⁷

2001 到 2007 的七年間，蕭萬長密集奔走於中國大陸南北各地、洽談兩岸共同市場經貿合作事宜，並與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錢其琛等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有過多次的溝通接觸。¹⁵⁸2005 年，國民黨與共產黨於「連胡會」後的〈連胡公報〉更指出，連胡會有達成「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共同市場問題」的共識。¹⁵⁹至 2007 年總統大選的競選過程時，「兩岸共同市場」已成為國民黨其中一項重要的政見，其要旨在透過「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來解決台灣的經濟問題、提高產業競爭力。

兩岸共同市場作為強調自由貿易協定及區域經濟整合的經濟政策，充滿了全球化論述的去政治化特質。其中要求擱置兩岸政治爭議、降低政治干預，促進資本相互流通的廣度和速度，其實就是第一章導論中談到的第三種去政治化現象，這種現象反映了市場決定論的思維模式、以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更弔詭的是，兩岸共同市場政策也同意在「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前提下進行談判協商，這正好是中國官方希望臺灣接受的談判前提；而蕭萬長提到的，希望從經濟上的「合」推展至政治上的「和」，更符合了前述 1992 年江澤民指出「希望進行兩岸和平統一」的期待。這種模糊主權議題的經濟策略，除了政治人物一再保證不會損害主權的口頭承諾之外，並無法真正說服台灣社會內部在意主權問題的人民，也因此「兩岸共同市場」一再被綠營政治人物質疑其威脅主權的可能性。¹⁶⁰對於選戰期間綠營的攻擊，當時副總統候選人蕭萬長只回應會以「三要」（要尊嚴、要市場、要談判），和「三不要」（不要中國勞工、農產品及偷渡走私）作為政策的但書。¹⁶¹

2008 年 3 月 23 日總統大選之後，國民黨重回執政的舞臺，之後便開始進行「兩岸共同市場」政策下的各種政治議程。先是準副總統蕭萬長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名義赴中出席 4 月 11-13 日的「博鰲論壇」，作為協商「兩

成立》，《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 年 4 月 8 日。

¹⁵⁷ 參考〈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成立誌要〉，基金會網站：

<http://www.crossstrait.org/version1/index.html>

¹⁵⁸ 參考〈奔走對岸 推動兩岸共同市場〉，《中國時報》，2007 年 6 月 23 日。

¹⁵⁹ 《連胡公報》指出，連胡會有達成「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共同市場問題」的共識。參考〈馬蕭配北京回應 兩岸復談 可優先討論共同市場〉，《中國時報》，2007 年 6 月 28 日。

¹⁶⁰ 參考〈兩岸復談 機會之窗悄悄打開〉，《中國時報》，2008 年 4 月 6 日；〈政治、經濟一中 為終統鋪路 扁炮轟馬蕭：一中市場災難開始〉，《中國時報》，2007 年 7 月 1 日。

¹⁶¹ 參考〈蕭萬長：主張兩岸共同市場〉，《中國時報》，2008 年 3 月 3 日。

岸共同市場」的試金石，其「兩岸破冰」、「和解」的象徵意味濃厚。¹⁶²再來是5月27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率團訪中、以及六月海基會長江丙坤赴中進行兩岸官方復談。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位訪中特使都是由國台辦主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接待。¹⁶³6月14日的「江陳會」中，江丙坤與陳雲林共同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和「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兩項協議，確定7月份實施兩岸周末包機直航，並自7月18日起開放大陸一般人民來台觀光。¹⁶⁴4月18日，江丙坤便透漏將邀陳雲林訪台的消息，至7月16日，經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王在希確認，陳雲林將在奧運之後夏末秋初時訪台，至於談判內容，則包括航線截彎取直、包機正常化與常態化及航空、海運貨運直航等議題。¹⁶⁵

(三) 陳雲林訪台風波始末

經歷過2008年初的總統大選、以及多場兩岸政治人物的會面，在陳雲林即將訪台的秋日，台灣社會躁動的氣氛已醞釀多時。綠營政治人物先是質疑馬總統稱呼陳雲林的稱謂問題、及其訪台期間的維安問題；¹⁶⁶9月又爆發中國查驗出二十幾家廠商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氫胺的「毒奶粉事件」，引起民眾對於中國進口食品安全的疑慮和恐慌、質疑「兩岸共同市場」政策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順著這個議題，民進黨於10月25日舉辦「反黑心・顧主權」大遊行，訴求反對一中市場、反對掏空主權及反對無能政府。¹⁶⁷10月21日，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因反台獨的言論被民進黨市議員王定宇襲擊事件，更在政壇引起軒然大波。¹⁶⁸這個意外被批評者譴責為暴力事件，宣稱它是損害台灣形象、不民主的象徵，而由此事件被指出的維安缺失，更強化國民黨政府對陳雲林訪台期間擺出高規格維安的正當性，泛綠陣營在這種態勢之下，更加淪為挑起紛亂的「滋事者」、「擾亂者」角色。

¹⁶² 不少報紙都以「破冰」、「融冰」的報導方式形容之，例如「此行不但可望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重啟兩岸中斷近十年的協商，以『會員』身分出訪的蕭萬長，更有與東協國家交流的機會，與大陸破冰、和東協搭橋，意義重大。」參考〈博鰲破冰 又可拉近與東協關係〉，《中國時報》，2008年4月7日。

¹⁶³ 蕭萬長、吳伯雄訪中時，陳雲林仍是國台辦主任，與江丙坤會面時才成為海協會會長。

¹⁶⁴ 參考〈馬首張兩岸支票兌現〉，《蘋果日報》，2008年6月14日。

¹⁶⁵ 參考〈江丙坤：將邀陳雲林訪台〉，《蘋果日報》，2008年4月18日；〈王在希透露 陳雲林奧運後將訪台〉，《蘋果日報》，2008年7月16日。

¹⁶⁶ 由於馬英九總統先行提及「可與陳雲林互稱先生」，似乎欲用來避免政治稱謂的尷尬。此舉遭到綠營政治人物的批評。參考〈與陳雲林互稱先生 綠譏：乾脆叫馬統〉，《蘋果日報》，2008年6月19日；〈陳雲林訪台 維安「比照元首」住總統套房樓層管制 綠批：矮化國格〉，《蘋果日報》，2008年10月16日。

¹⁶⁷ 參考〈毒奶粉 國人吃下1.25噸 其餘已下架查封 不排除向中國求償〉，《蘋果日報》，2008年9月16日；〈綠25日上街嗆馬反一中 提前一周舉行 避與陳雲林訪台掛鉤〉，《蘋果日報》，2008年10月14日。

¹⁶⁸ 參考〈丟臉 粗暴襲擊張銘清 各界譴責 損害台灣形象〉，《蘋果日報》，2008年10月22日。

10月27日，中國海協會在與海基會完成二次「江陳會」預備性磋商會議後，發函海基會向台灣民眾道歉，強調：「大陸方面絕不姑息任何傷害兩岸消費者健康權益的不法份子。」對此舉動，總統府表示「大陸展現善意，有利兩岸協商」，民進黨則認為，是中國因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的緣故才會低調道歉，並要求中國官方正式出面道歉、承諾賠償。¹⁶⁹此外，針對民進黨10月25日舉辦的遊行，總統府在10月27日的輿情會報中回應，陳雲林來台是要討論貨運直航、兩岸包機航線截彎取直等經濟議題，民進黨將之轉移為反一中、顧主權議題，「根本就是在搞內鬥，而不是拼經濟」，將民進黨從政者欲政治化的議題去政治化。警政署並且在陳雲林11月3日抵台時，動用七千名警力進行高規格維安。¹⁷⁰

儘管馬政府以「來者是客」作為高規格維安的正當理由，11月4日起發生的幾樁事件，卻開始讓民眾質疑警方執法過當的問題，以及此一經濟議題所具有的政治性：例如強力攔阻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圖案雨傘的婦人通過圓山飯店附近、將持有圖博（Tibet）雪山獅子旗等旗幟之人士押入警車、因上揚唱片播放台灣之歌而被警方強制關閉的事件等等。¹⁷¹執政當局的執法一方面危害了憲法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另一方面，這種除去各種主權象徵物品、與相關表意方式的作為，更曝露出此一經濟議題的政治性——表面上無涉政治的「江陳會」，是建立在「懸置」政治敏感爭議的操作之上，而不是真正的無政治。此外，陳雲林所到之處的封鎖、淨空等維安管制，更是近一二十年台灣社會不曾發生過的現象，¹⁷²這些畫面在短短幾天之內透過新聞畫面不斷傳送，醞釀成為11月6日民進黨及本土社團舉辦的「圍城計畫－黃絲帶行動」遊行的衝突張力。11月6日當日，民進黨原定在下午發動群眾向在台北賓館舉行的馬陳會抗議，不料馬英九總統上午提前接見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使得綠營的圍城行動破功。支持者在極度不滿的情況下，從北市中山南路景福門一路挺進陳雲林下榻的中山北路圓山飯店附近進行示威抗爭，並在兩區域爆發激烈警民流血衝突，全天逾80人受傷，釀成十餘年來最嚴重的群眾事件。¹⁷³

¹⁶⁹ 參考〈毒奶風波 海協會向台道歉 府：有利兩岸協商 綠罵沒誠意促賠償〉，《蘋果日報》，2008年10月28日。

¹⁷⁰ 參考〈府：直航機票年省兩百億〉，《蘋果日報》，2008年10月28日；〈陳雲林今抵台 7000警維安 兩岸新紀元 將簽4協議〉，《蘋果日報》，2008年11月3日。

¹⁷¹ 參考〈婦持國旗傘 警強力攔阻 記者依規定採訪 竟遭粗暴拉離〉，《蘋果日報》，2008年11月3日；〈挺陳嗆陳 全遭警驅離〉，《蘋果日報》，2008年11月4日。關於「上揚唱片事件」，主要是因為11月4日晚上許多抗議的群眾聚集在上揚唱片門外，並要求老闆放映《台灣之歌2》，播放音樂不到幾分鐘，群眾在店外隨節奏跳舞，警方見狀卻進店裡要求關掉音樂，此時群眾突然衝進來，警民爆發激烈衝突，最後鎮暴警察將群眾推出店外。參考〈600人圍國賓飯店 警民爆衝突 連戰美酒宴陳雲林 鎮暴部隊驅趕群眾〉，《蘋果日報》，2008年11月5日。

¹⁷² 參考〈帝王級禮遇陳雲林 機場今淨空〉，《自由時報》，2008年11月3日。

¹⁷³ 參考〈80傷 警民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蘋果日報》，2008年11月7日。

陳雲林訪台引起的社會衝突，標示了晚近兩岸經貿交流的一個新的現象。國民黨從過去戒嚴時期禁止「與匪通商」的堅決立場，¹⁷⁴轉變成主動拋出「兩岸共同市場」經濟政策的積極態度，不僅顯示出國民黨在兩岸關係策略的調整，也象徵了台灣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巨變。其中，全球化的力量是這個現況的重要推手，中、台在共同加入 WTO 之後，貿易依存度便急遽攀升。如表 5.1 所示，2001 年、2002 年中國和台灣陸續加入 WTO 之後，中國商品對台的進口數額便快速成長。2002 年以前本來維持在 10000 百萬美元以下，2002 年之後便大幅上升。這種情況更加促成國民黨、共產黨的從政者與兩岸資本家，在近年一起使用新自由主義的去政治化敘事，利用將政治爭議、主權議題懸置的方式，快速進行「三通」等實際上具有政治性的經濟議程。至於此種去政治化敘事的面貌為何，反制它的政治化敘事又說了什麼，這便是第二節要更進一步詳細討論的部份。

百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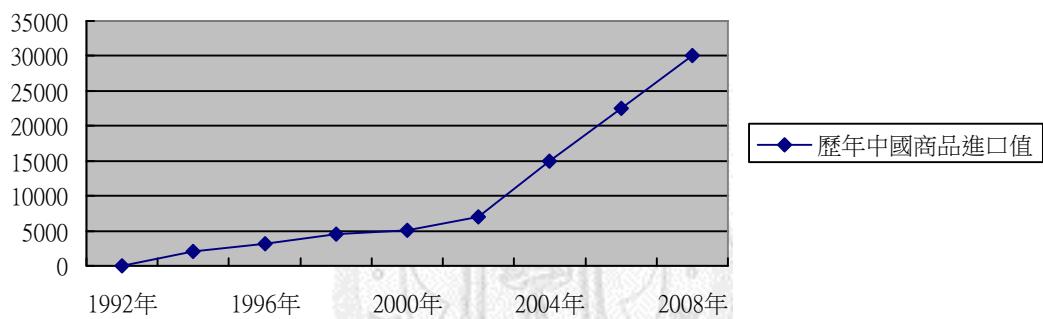


表 5.1 歷年中國商品進口值。(作者製表。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第二節 迎「財神」還是迎「敵人」？

(一) 四大報媒體報導情形

從國民黨於 2008 年 3 月贏得總統大選之後，一直到同年 11 月初江陳會結束這段期間，針對多場兩岸從政者會面、與陳雲林來台的相關報導，《自由時報》始終採取反對的立場，《蘋果日報》則以質疑的眼光看待這些政治事件和現象，並且透過集合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政治評論、來平衡報社的立場。至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則對此「去政治化的議題建構」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其中《聯合報》更幾乎從頭到尾都支持國民黨執政者，包括高規格維安、警察執法過當等問題，《聯合報》均少有批判。

¹⁷⁴ 蔣經國於 1981 年曾提到：「共匪所提的通商、通航、通郵等問題，拆穿來看，都是共匪和談陰謀的一部份，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其作用在利用通商、通航、通郵，來便利他們對台灣的滲透與破壞。所以我們不與共匪通商、通航、通郵，乃是堵塞共匪對我國進行滲透與破壞的必要措施。」(李立偉，2010: 3)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時報》雖然支持國民黨執政者的兩岸經貿政策，但是同時也非常在意這種政策推行是否會引起社會對立。所以在江陳會期間社會衝突發生時，《中國時報》便是以「和諧」、「安定」為核心價值，用一種「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看待國民黨、民進黨從政者在江陳會期間的行動，並且偏向譴責國民黨作為執政當局該負的政治責任。

搜尋筆數整理

關鍵字：陳雲林			
搜尋範圍：2008年3月23日－2008年11月30日			
中時報系	聯合報系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883 篇	1132 篇	1042 篇	465 篇

以「陳雲林」為關鍵字搜尋各報紙的報導筆數統計如上表所示。在時間範圍的部份，為了掌握第二次江陳會（即陳雲林來台）風波之前的政治情勢，便將時間設定為 2008 年總統大選後，一直到陳雲林來台後的 11 月月底。其中可以發現《自由時報》的新聞數量最多、其次為《聯合報》，而《蘋果日報》的新聞量最少。

（二）迎「財神」：救台灣經濟的去政治化敘事

第一節中，我們已鋪陳了在陳雲林訪台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強調「擱置政治爭議」、「兩岸經濟合作」的去政治化現象。這些去政治化現象言論，與國際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若合符節。如社會學家 Bourdieu 所言，一個純粹而完美的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實現，是透過對所有政治措施的改造及破壞行動，其目的在質疑所有會阻礙純粹市場邏輯的集體結構。新自由主義政綱的社會力量來自其利益代表者的政治經濟力量，藉此在現實中建構符合其理論描述的經濟系統，即一種機械邏輯，一連串牽引經濟行動者的限制 (Bourdieu, 2002: 159-160)。Bourdieu 的觀點頗為符合在此討論的「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反對政治干預的邏輯。然而，這種去政治化敘事型態的內涵不只具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特質，還包括與台灣在地歷史經驗相關的敘事元素。即一種「去歷史」、強調「兩岸民族和解」的思維模式也蘊含其中。這種敘事伴隨著 2008 年總統大選後，多場兩岸政治人物的會面不斷地出現，並且延續到陳雲林首次訪台（第二次「江陳會」）之後。

首先在 2007 年 10 月 15 日時，台灣社會便彌漫著一種強調「救台灣經濟」的敘事。如《工商時報》的社論〈經濟是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便表示：

「長期以來，我們不斷提醒政府，經濟是台灣生存發展命脈；經濟要搞好，國力才能強盛，台灣才能受到國際社會重視，才有條件爭取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2000 年民進黨執政以後，雖然口口聲聲要拚經濟，但因為意識形態作祟及選舉掛帥，經濟施政受到嚴重扭曲，愈拚愈讓台灣經濟向下沈淪。過去七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僅三%出頭，不但落居四小龍之末，而且是除日本外亞洲國家的最後一名。…台灣所得分配快速惡化，貧富不均問題愈來愈嚴重…更弔詭的是，民進黨不斷激化兩岸政治衝突，但在經濟上卻愈來愈依賴大陸，這種政治與經濟背離的現象，對台灣經濟已構成愈來愈大的潛在威脅。而民進黨為求勝選，不斷以正名、制憲等政治議題激化統獨意識及藍綠對立，不但對台灣經濟造成持續傷害，而且讓台灣國際模範生的良好形象，變成國際社會眼中的麻煩製造者。謝長廷認為：「經濟是現象，問題從政治來」，印證 2000 年來台灣的改變，可說一點都沒錯。」¹⁷⁵（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還有一種敘事，則進一步指出台灣經濟發展與兩岸良好關係的高度關聯性。如《工商時報》上，一篇題為〈台灣經濟救命藥 做好兩岸互動〉的文章便認為：

「台灣目前猶如大病未癒的患者，挽救經濟關鍵首要建立信心，同時一定要與大陸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堪稱台灣財經長者的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針對當前台灣經濟與台商經營蒙受這波全球金融風暴肆虐，提出上述建言。江丙坤認為，台灣經濟的「藥方」，最主要的仍在於與中國大陸保持穩定良好的互動關係，趁勢利用大陸崛起的經濟力量與資源。他表示，這 20 年來大陸崛起後，台商利用大陸市場不斷成長，目前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中有 3 個百分點來自大陸，顯見大陸市場對台灣的重要性。」¹⁷⁶（粗體為筆者所加）

再者，一種「去歷史」、強調「兩岸民族和解」的敘事，如《聯合報》的社論〈台北江陳會：和平共榮是歷史的方向〉一文就提到：

「將台北「江陳會」置於六十年來「歷史與現實」的座標點上，可以看出兩岸互動有一條由隱而顯、由微而著的主軸線，那就是「民意與和平」。…民意嚮往和平，兩岸均須回應民意。兩岸當局只要堅持「和平」的最高原則，兩岸的互動即可能滿足「共榮雙贏」的民意；而兩岸當局只要多置心力於「共榮雙贏」的民意，兩岸的「和平」即得以維繫。…這二十年的兩岸互動顯示，中國大陸若不能尊重「中華民國」有足夠的

¹⁷⁵ 參考〈經濟是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工商時報》，2007 年 10 月 15 日。

¹⁷⁶ 參考〈台灣經濟救命藥 做好兩岸互動〉，《工商時報》，2008 年 10 月 27 日。

空間，台灣的動盪及兩岸的危機將始終存在。北京當局從二十年前「中華民國已死」的政策觀點，走到今日「維持現狀」及「九二共識」（潛台詞是「一中各表」）；這非但是因穿越了五、六十年前「解放／反攻」的歷史硝煙，也是因深受過去二十年統獨惡鬥之痛，而有所體驗及省悟吧？…較諸五、六十年前「解放／反攻」用槍礮相互殘殺，及較諸二十年來的統獨惡鬥，今日台北「江陳會」所站的「歷史與現實」的座標點，卻無疑是正面的、進取的，也是足可慶幸與肯定的。…我們期盼，馬英九、胡錦濤及今後的兩岸領導人，在內部治理的思維及方法上能有超越蔣經國及鄧小平的境界及成就，而這類思維、方法及境界、成就，亦必可反映在「和平共榮」的兩岸關係上。」¹⁷⁷（粗體為筆者所加）

與此近似的看法，如新黨主席郁慕明也在〈兩岸協議 經濟闢活路〉一文中反映：

「從李登輝執政算起，到陳水扁下台，歷經二十年以上綠營政策理念的「鎖台拒陸」統治，已經證明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如今馬政府打開三通，兩岸擴大交往已有良好的條件。兩岸擴大交往，如何影響未來兩岸的政治走向，現在尚難以判斷；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對防範衝突絕對有益。僅此一點，即足以讓國人力挺政府的決策。不過，二十年的綠色執政，當然在政府和社會的體制及結構中，留下大量的影響，形成政府執行政策的障礙；認清兩岸三通政策有利於己的國人，當然要做政府的後盾！」（郁慕明 2008）（粗體為筆者所加）

觀看以上從 2007 年總統大選競選期間、橫跨至 2008 年陳雲林訪台後的四段文字，可以發現一種融合了「民族和解意涵」的去政治化敘事。首先，這種敘事將兩岸的政治爭議去政治化、將兩岸經貿交流設定為「經濟議題」，認為應該遵循兩岸經貿交流的市場力量，並強調經濟優先的重要性、否定與統獨相關的意識形態政治，因為後者是前者的絆腳石。再者，它否定這二十年來，從前總統李登輝到陳水扁執政時期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國家路線，原因是這種路線拉開了「兩岸」的距離、讓兩岸更為分歧對峙。此外，這種敘事同時也放棄了國民黨政權過去做為流亡政府的歷史。過去「反共抗俄」、在台灣實施長達 38 年戒嚴的歷史，在頌揚今日國共兩黨和解的同時，彷彿變成一種錯誤。而由國共兩黨以「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互動交流前提的態度來看，他們僅僅對各自過去黨化教育的國族敘事做出些微修正，但都仍堅持文化上的中國認同（都是中國人）。簡言之，這種敘事融合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潛藏在台灣社會裡「統」的力量。兩者在此歷史時點上，以一種微妙的態勢結合在一起。

¹⁷⁷ 參考〈台北江陳會：和平共榮是歷史的方向〉，《聯合報》，2008 年 11 月 3 日。

不過「一個中國」這種充滿政治爭議的表述，根據去政治化的邏輯而言，並不適合堂而皇之的宣稱。如 2008 年 5 月底，一篇《中國時報》的報導便指出，除了博鰲論壇「蕭胡會」後，中國商務部發出一份新聞稿中短暫出現「一個中國」的字眼之外，新華社新聞稿已不用這類詞彙。取而代之的是蕭萬長與胡錦濤的「十六字箴言」。準副總統蕭萬長在博鰲論壇率先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口號。相隔不久的連胡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再以「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予以回應。十六字箴言成了雙方共同的語言，尤其是「擱置爭議、追求雙贏」成為兩岸間的最大共識。¹⁷⁸當國民黨、共產黨從政者均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建構此議題，並獲得能夠從中得利的資本家的支持，在這個去政治化敘事所形構的象徵秩序之中，試圖挑起此經濟議題內含的政治爭議的民進黨從政者，便會淪為「麻煩製造者」的角色。

透過各種場合與媒體宣揚的去政治化的經濟敘事，在陳雲林訪台引發的種種風波尚未發生之前，預言了某些行動的結局（異議者只會製造麻煩、把事情搞砸），因此對某些行動已經事先產生制約。例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動員民眾加入民進黨發動的遊行活動時，除了強調挑起主權爭議的政治正當性之外，更特別以「非暴力抗爭」作為行動的但書，此舉顯示出執政當局的「和平」、「非暴力」、「守法」等宣傳，使異議者為了避免被污名化而必須正視與回應，形成對行動的制約。相對於握有行政權的國民黨政府，當黨主席蔡英文這樣呼籲的同時，在野黨也等同於片面承擔了可能發生暴力事件等社會衝突的最大責任。¹⁷⁹因此，若觀察陳雲林訪台前夕到離台之後，國民黨從政者、工商業者與民眾的政治評論，則可以發現一種由前述的去政治化敘事邏輯衍生出來的敘事元素，即「麻煩製造者」的指控，已經逐漸成為加諸抗議者身上極為方便的標籤。

首先在 10 月 25 日民進黨發起的「反黑心・顧主權」大遊行當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便以新聞稿呼籲藍營支持者「離遊行隊伍愈遠愈好」，他說：「台灣光復以來，引導華人世界推動民主，但這種光榮和驕傲，最近受到嚴重摧殘，慶祝光復節要全力防止民主倒退，全民應建立反暴力的共識，找回真正的台灣精神。…在野黨上街頭，是民主社會的常態，但主辦單位和參與者都應依法守法，同時希望主辦單位和執法機關要盡全力維護社會安定和諧。」¹⁸⁰遊行過後，總統府則在〈輿情會報〉中進一步表示：「民進黨是在「搞內鬥」，不願拼經濟。與會者認為，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是要討論貨運直航、兩岸包機航線截彎取直等經濟議題，

¹⁷⁸ 參考〈不再挑敏感「一中」 兩岸更有默契〉，《中國時報》，2008 年 5 月 30 日。

¹⁷⁹ 蔡英文在她《中國時報》的投書上提到：「政府不要的尊嚴與主權，我們人民自己來捍衛。這是唯一的路，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要用和平、理性、堅定、非暴力的方法來捍衛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尤其是民進黨的黨員，不管任何時候、狀況，一概不准使用暴力。民主是民進黨唯一的武器，和平是民進黨唯一的方法。這是我唯一的懇求，也是我唯一的命令。」參考〈用非暴力捍衛尊嚴與主權〉，《中國時報》，2008 年 11 月 3 日。

¹⁸⁰ 參考〈國民黨：離遊行隊伍愈遠愈好〉，《中國時報》，2008 年 10 月 25 日。

民進黨將之轉移為反一中、顧主權議題，根本就是在搞內鬥，實不足取。」¹⁸¹（粗體為筆者所加）

同時，《聯合報》一篇題為〈憂國內瀰漫抗議氛圍 7 大工商團體代表面見馬期盼兩岸和諧、合作雙贏〉的報導也指出：

「陳雲林 11 月 3 日來台，國內氣氛瀰漫在綠營強烈抗議氛圍中，為謀求兩岸良性互動、避免遭不必要意識形態干擾江陳會，包括工總、商總、工商協進會、工業協進會、中小企業協會、電機電子公會及工商建言會等國內七大工商團體等 25 位企業代表將在下午 2 點晉見馬英九總統，表達企業界關心此次江陳會對兩岸經貿發展的重要性。七大工商團體在下午召開記者會發表「加強協商對話、共創合作雙贏」的共同聲明，其中引用研考會的統計顯示，五成的台灣民眾認為陳雲林來台將是「好處多於壞處」、五成一民眾認為陳雲林來台有助於大陸了解台灣的民主經驗、四成七民眾認為兩岸軍事外交對立局勢可望和緩。因此希望「透過交流增進了解」的兩岸和平共處基石、運用智慧，透過對話解決兩岸長久以來複雜糾葛關係。」¹⁸²（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陳雲林來台、11 月 6 日爆發大規模群眾事件之後，一位台北市的文字工作者孫亦文在〈民進黨抗爭 呥緊弄破碗〉一文裡，發表了對抗議者的非理性抗爭行為的看法：

「民進黨人士難道不知道，現在之所以搞得國安單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還不是因為綠營不斷提出在陳雲林來訪期間進行所謂「奇兵盡出、遍地開花」等抗議活動，本土社團並號召群眾攔堵陳雲林，向陳雲林丟雞蛋、領賞。面對這些不理性的抗爭行為，警方焉能不緊張？…何不用和平理性的方式適度宣洩情緒即可，而不需要以這些劍拔弩張的方式。」
(孫亦文 2008)（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馬英九總統也對此集會遊行產生的後果表示譴責：

「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前晚受困晶華酒店近八小時，馬英九總統相當不悅，昨日上午召開記者會，公開譴責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違背承諾，未負起責任，馬英九痛斥：「如果做不到和平理性，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馬英九說，上一次在臺南發生的事件，國際媒體大幅報導，已

¹⁸¹ 參考〈府：直航機票年省兩百億〉，《蘋果日報》，2008 年 10 月 28 日。

¹⁸² 參考〈憂國內瀰漫抗議氛圍 7 大工商團體代表面見馬 期盼兩岸和諧、合作雙贏〉，《聯合報》，2008 年 10 月 28 日。

經嚴重影響台灣的形象，甚至影響台南觀光業，國內的和諧一寸一寸的流失。…馬英九指出，他一再堅信集會遊行是人民的權利，不是政府的恩賜，但集會遊行一定要和平、合法，如果不能做到，警察機關的原則保障合法、取締非法，這是任何一個法治國都應做到的。」¹⁸³（粗體為筆者所加）

類似地，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也批評：「不要被少數個人為了私人的政治利益所矇騙，台灣現正在拼經濟、拼投資，大家要多往這方面努力。只有和平才能帶來經濟繁榮，經濟繁榮，人民才能享受民生樂利。」¹⁸⁴（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於陳雲林來台期間的高規格維安升高了社會衝突對峙的態勢，從 11 月 4 日起便陸續發生因警方執法過當的衝突事件，到 6 日則因民怨的累積爆發了重大的警民衝突。這些社會不滿在陳雲林離台之後並無立刻消失，反之，一片「究責」的聲浪四起，整個社會落入譴責這方或另一方的相互對立。在此，依據之前執政者的去政治化邏輯所生產出來的「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都偏向譴責作為「麻煩製造者」的民進黨從政者（與其支持者），認為他們要負最大責任。「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消解了抗議者行動的正當性，並將暴力行為與社會對立的後果相互連結。在這些敘事中，批評「意識形態政治」會使台灣經濟向下沉淪、毀壞兩岸關係，並進一步將「良好兩岸互動」指為台灣經濟的救命藥方。這種看法，呼應了戒嚴時期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1]。不同的是，在過去舊的敘事中對「台灣社會安定」的強調，在新的敘事裡被置換成對「兩岸和平」的重視。此外，認為街頭抗爭行為應該守法、和平、理性的觀點，則呼應了威權統治時期「民主、法治、反暴力」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一）[表 2-2]。而認為抗爭者是一些基於私人政治利益的政客的看法，則反映出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5]。這種對政治人物的污名化，以及對政治異議者的厭惡，一直都是晚近台灣社會核心的去政治化現象。最後，認為和平安定才能帶來經濟繁榮的政治意見，也同樣呼應了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表 2-1]。這個由陳雲林來台所激發而近乎集大成的去政治化敘事的要素，可以整理如表 5-1。

表 5-1 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敘事者	救台灣經濟、重視兩岸和平共榮的執政者
時間的演進	從前總統李登輝執政以來的二十年來
中心主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搞意識形態政治只會讓台灣經濟向下沉淪、也毀壞了兩岸關係。[表 2-1]• 台灣經濟的救命藥在於良好的兩岸互動關係。[表 2-1]• 街頭抗爭行為應該守法、和平、理性。[表 2-2]

¹⁸³ 參考〈馬拍桌：蔡英文背諾 不負責任〉，《中國時報》，2008 年 11 月 7 日。

¹⁸⁴ 參考〈郭董也困晚宴 難掩怒氣〉，《蘋果日報》，2008 年 11 月 7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發起抗爭者多為少數人為了私人政治利益而發起的行動。[表 2-5] • 和平安定才能帶來經濟繁榮，人民的生活才會幸福。[表 2-1]
情節	<p>開始：從前總統李登輝執政、到陳水扁下台，歷經二十年以上的「鎖台拒陸」政策造成兩岸關係惡化，已證實是一條錯誤的路。</p> <p>中間：台灣的經濟愈來愈依賴中國大陸，因此台灣經濟的成敗也繫於兩岸關係的互動。如今以三通政策擴大兩岸經貿交流，應有防範兩岸分裂衝突的正面影響，同時也才能為台灣拼經濟。所以我們應該支持「江陳會」。</p> <p>然而陳雲林訪台之後，民進黨政客卻為了私人政治利益搞「意識形態政治」、徒增社會對立，並妨礙江陳會的進展。黨主席蔡英文曾經承諾非暴力抗爭，如今卻食言，害台灣背上民主國家的形象。</p> <p>結尾：(按照解決方案而發展)</p>
結論或解決方案	民進黨是不守誠信的「麻煩製造者」。人民應該不要受影響、繼續支持政府的施政，和平才能帶來經濟繁榮。

由國民黨從政者針對江陳會議題所生產的「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可以發現它綜合了許多過去去政治化敘事模式的元素，並且以一種新的方式將它們重新排列組合，而成為一種強勢的言論。它所形成的社會效應，除了將政治異議者標定為「麻煩製造者」之外，也產生如胡俊佳（2010）於〈觀光作為文化治理：「兩蔣」、「陸客」與觀光的（去）政治化〉一文中對「去政治化的政治操作」的論點所指出的社會後果：當這種去政治化的邏輯強調把中國政權充滿威脅的負面象徵轉換為正向的經濟效益、藉此隱藏政治上的爭議時，事實上並無法擱置任何爭議，而只是把擱置在兩岸談判桌之外的政治爭議，轉嫁到台灣社會內（17）。在此如此去政治化的政治操作下，不單讓中國政府在台灣爭取更多利害關係者（shakholder），也讓中國成為當中重要的利害關係者，增加中國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台灣社會內部則加劇了原來因中國所引起的社會分歧（18-19）。

（三）迎「敵人」：憂心主權流失的社會不滿

對許多反國民黨的人士而言，去政治化的操作並無法真的擱置政治爭議，去歷史化的政治敘事更顯現出國民黨與其過去「反共抗俄」的民族主義信仰相互矛盾的悖論。當國民黨從政者否定過去的歷史，也就等於否定過去 38 年戒嚴時期的意義，也否定了台灣社會民主轉型的意義，並且再度證成了「被統治者無權決定他們的未來」這種從統治者出發的思維心態。對反國民黨人士來說，屬於台灣

人民的歷史、過去被壓迫者的歷史，在國共和解的去歷史、去政治化敘事中便不復存在。這種現象因此造成再度淪為在野黨的民進黨從政者與其他反對者的高度不滿，而釀成 11 月 6 日的群眾衝突事件。以下舉例的言論，清楚呈現這些不滿的認知與感受。

陳雲林來台前夕，《自由時報》的一篇社論〈鐵幕中的江陳會〉便表達了對國民黨執政者作為的不滿：

「馬政府為了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以進行江陳會，用盡各種手段，隔絕台灣人民的嗆聲抗議，簡直成了在「鐵幕」中進行江陳會！…「鐵幕」一辭出自英國名相邱吉爾，用以形容共產世界，中國國民黨兩蔣時代，經常用來形容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不過，當年口口聲聲號召「滅共」的中國國民黨，現在卻個個成了「媚共」急先鋒。…不但滅共變成媚共，國民黨馬政府為了迎接陳雲林，使出幾近宵禁、戒嚴手段，禁止人民在陳雲林住宿及所經之處示威遊行，更擺出逾百檢察官、上萬警力及國安情治人員的空前大陣仗，威嚇人民不得當面向陳雲林嗆聲。…民主開放的台灣，人民有表達意見自由，政府必須接受人民監督，但馬政府竟要與中國代表在情治人員包圍如鐵桶的「另類鐵幕」中談判，不但令人匪夷所思、大開民主倒車，根本就是視台灣人民為敵！」¹⁸⁵（粗體為筆者所加）

另外，知名政論家李筱峰也在其專欄文章〈歡迎參加「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中，批評國共和解的去歷史、去政治化敘事：

「歷史的轉折竟是如此弔詭。雖然時過境遷，但令人不齒的是，今天急著抱中共大腿的人，正是當年效忠蔣政權呼喊著要「消滅共匪，解救同胞」的一群。當年，我們若不跟著他們喊「消滅共匪」、「反攻大陸」，隨時就會獲罪；而今我們要向「共匪」嗆聲，卻受到起訴判刑。有人說：「王定宇生錯時代了。」我說：「不是我們生錯時代，而是不論我們生在什麼時代都錯！」…在整個民主運動過程中，當年這群「反共革命青年」不但不曾參與其中，反而是站在對立面。而當年他們反對民主化的最大理由就是因為「非常時期」要「反共救國」，不能開放民主。如今，民主的潮流讓台灣有了起碼的形式民主，但他們卻不反共了，反而坐享他們當年所反對的民主，進而開始媚共諂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到了二〇〇一年改名為「中國青年救國團」，把「反共」兩字拿掉了。撫今追昔，我想請問，你們不再反共是因為你們的良心血性消失了呢？還是中共變好了嗎？…基於良心血性，在「共匪」來臨前夕，我與林保華、楊月清、陳達

¹⁸⁵ 參考〈鐵幕中的江陳會〉，《自由時報》，2008 年 11 月 1 日。

成等同志呼籲成立「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反侵略，反殘暴，掀起青年救國的高潮」！」（李筱峰 2008）（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陳雲林來台當日，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則發表了〈向台灣人民報告：我們為什麼不歡迎陳雲林〉一文：

「從五二〇以來，台灣人民已經多次被這個政府欺騙，我們不能再允許這種現象繼續下去。…這次的台北會談之後，台灣將往一中市場的路邁進一大步，在這個重大的歷史時刻，我們要告訴當政者，你們錯了，一個國家的經濟不是這樣治理的。再這樣下去，台灣的經濟將更不可逆轉地全面依賴中國，台灣將會變成另一個香港，在不久的未來，台灣還有主權的空間嗎？台灣人民除了接受「統一」，還有其他的選擇嗎？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放棄宣導自己的主權，不過，很不幸地，馬政府就是一個例外。現在，圓山飯店內所有的中華民國國旗都已經被收起來了，如果有尊嚴的談判，為何要為了客人而收起國旗呢？馬政府正在讓這個國家受到屈辱。…中國正在撕裂台灣，從這次陳雲林的行程安排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台灣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被選擇性的忽略。全世界沒有任何政黨會與威脅自己國家的政黨聯手對抗自己國內的政敵，然而，國民黨這幾年來就是這麼做。這種情形必須立刻停止，因為這樣下去會讓台灣陷入萬劫不復的分裂與對立之中。陳雲林來台灣不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個政黨的之間的「家務事」，而是整個台灣國家的公共事。」（蔡英文 2008）¹⁸⁶（粗體為筆者所加）

11月6日，一位高中生林孟潔也在〈胡錦濤來還得了〉一文中，質疑國民黨執政者高規格維安的措施：

「一個陳雲林來台就動員了七千警力大陣仗的全面戒備，那要是以後胡錦濤來了怎麼辦，難道要全島戒嚴嗎？更令人費解的是警方對於人民自由的限制與過度執法，從拿國旗飄氣球發布條到播放台灣之歌，統統不准，什麼時候台灣又開倒車回到了過去風聲鶴唳的時代裡？…馬總統呼籲不要過度執法，但是結果呢？有誰真正出面捍衛民眾發聲與媒體採訪的自由？筆者身為一個高中學生，面對每天升旗時需立正敬禮的國旗忽然感到相當的迷惑。為什麼國旗在自己的領土內不允許被舉起，那麼我們天天唱的國歌究竟是在歌頌何物？實在很想問那些阻止民眾舉國旗的「執法」單位，你們究竟把台灣定位在哪裡？而你們又究竟把台灣人民放在哪裡？」（林孟潔 2008）（粗體為筆者所加）

¹⁸⁶ 同樣的文章，在同日以不同標題〈用非暴力捍衛尊嚴與主權〉同時刊於《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

面對「去政治化的敘事」，憂心主權流失的言論與行動，其目的便是揭露此議題被擱置的政治性。這些言論與行動最關鍵的特質為展現中國對台灣具有的政治威脅，同時突顯國民黨從政者現在和過去面對中國政府相互矛盾的立場。例如在上述《自由時報》社論與李筱峰的敘事中強調國民黨從政者從過去「滅共」到現在「媚共」態度的丕變，以及故意用成立「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方式，反串（模仿）過去國民黨從政者面對共產黨的態度，以突顯其立場轉折的荒謬。因此，刻意拿出國旗並經過高規格維安地帶的類似作為，並非意味反對者真的認同國民黨政府在過去教化台灣社會的「中華民國認同」。他們是要突顯國民黨從政者竟然為了陳雲林來訪，就收起過去自身認同的重要象徵。在這種操作之下，雖然模糊了「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分野，也不再去強調「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卻因此讓「中華民國」的符號象徵成為認同的最大公約數，而有利民進黨從政者的動員。

此外，這種不滿的社會聲浪也抨擊國民黨執政者的高規格維安限制了人民的言論自由，彷彿視自己的人民為敵人。在國民黨從政者去政治化的操作之下，不僅邊緣化民進黨，也深化了社會內部認同分裂與對立的程度。在上述的文章中，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更直接指出此經濟議題具有的政治性，亦即「政治統一」的政治效應。

（四）衝突之後重視「和諧社會」的看法

當去政治化的敘事與行動引起了尖銳的社會對立，一種厭惡社會對立的看法則從中誕生。此敘事的特徵在於：它並沒有落入「去政治化敘事」的邏輯，並未單單追究抗爭群眾這一方的責任；同樣的，它也不是憂心主權危機的問題。它所重視的核心價值在於「社會的安定和諧」，因此它抨擊因為執政者使用去政治化邏輯而使得政治爭議被轉嫁到台灣社會內部的作為。於是在責任追究的部份，它也偏向譴責執政當局。

陳雲林訪台期間，《中國時報》記者梁鴻彬便在〈別搞得像警察國家〉一文中提到：

「江陳會是兩岸發展的歷史紀事，相較於陳雲林來台所踩下的每步歷史軌跡，台灣軍警維安如臨大敵的不安景象，卻顯得格格不入。客人的安全當然要維護，但在國人面前把台灣搞成像警察國家，不僅貽笑國際，更減損江陳會可能會有的任何成就。…這次因應陳雲林來台，警政署可說是佈下天羅地網，連進入機場的道路都設下攔檢點，不但擾民，讓台灣不像在迎接兩岸會談喜事，反而有如進入戰爭狀態。…警方如此執

法，就連馬總統都看不下去，要警政單位拿捏執法的尺度，注意人民的感受。其實，多數台灣民意是歡迎陳雲林來台，但是警政單位將全民當「暴民」的態度，卻是適得其反。執法者拿著雞毛當令箭，賠上整個政府的形象。」（梁鴻彬 2008）（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文史工作者邱德宏也在〈台灣一個國家 兩個世界〉裡談到：

「馬政府執政以來，為發展兩岸三通直航以及發展兩岸政經互動，一再宣稱兩岸和平與擱置爭議，然對於島內民進黨「反中（國）」的情緒與主張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或莫可奈何，甚至以壓制的態勢進行處理；筆者以為，如果島內沒有最大公約數的兩岸關係共識，單方面就執政黨執意推動兩岸關係，即使有更實質的進展，在台灣島內的衝突必然會更加劇烈燃燒；而島內因藍綠兩黨對兩岸認知（做法）所帶來的內耗，馬政府難道不以為意嗎？相對而言，馬政府擱置島內的爭議，執意讓陳雲林來台，也算是另一種擱置爭議詮釋，只不過，捨一國分裂就兩岸和平的作為，台灣真能因兩岸和平而共謀解救台灣大業嗎？兩岸和平交流所激化的島內衝突，真能帶來台灣的榮景嗎？或者是可以就此打消民進黨反中的情結或馬政府賣台的疑慮嗎？如果馬政府沒有把握處理好島內因親中反中所起的衝突，那兩岸和平又所為何來？而兩岸互動或只會讓島內的相對民意以為是胳臂往外彎的氣憤，馬政府又得到了便宜嗎？台灣真的已陷入「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的國度嗎？島內已不見「打火親兄弟」的團結，卻存在儼然是兄弟鬭牆的悲劇，對於自許「全民總統」的馬政府無非是很大的諷刺。」（邱德宏 2008）（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 11 月 6 日爆發群眾衝突之後，自稱來自台北縣淡水的時事評論員李華球則在〈安內應優於兩岸交好〉一文中認為：

「為政乃在使民安居樂業，而非釀致社會不安。面對今日亂象，追究根源端在：政府的剛愎自用與輕忽民意；反對勢力背負貪腐原罪與暴力本質難棄致之。台灣無寧日，內部安定不了，外部豈能交好。一個好的政府是要能夠化暴戾為祥和，解衝突於事前，更重要的是，時時要注意民氣的流動與變化，而不是讓民意變成民怨，將這股民氣發洩在政府身上。反對勢力的某些工具性的演出和情緒性的宣洩，只是為反對而反對，不但無濟於事，又會釀成災禍，不能不慎！江陳會談簽署的「四項協議」，固然促進兩岸關係，但以目前台灣現況，恐怕內部安定比起外部交好要來得重要而實際。所以，應先將台灣內部融合安定起來，有了和諧的內部關係，再來進行外部交往，是不是比較穩當呢？」（李華球 2008）（粗體為筆者所加）

隔日，《中國時報》短評〈分裂如何前進〉也指出：

「沒有人會反對兩岸關係改善，但如果付出的代價是台灣民主的倒退，是國家內部的分裂，那將是社會的悲哀，人民的苦難。經歷二次江陳會之後，為政者要勇於反省，在野者也要懂得體諒，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喧鬧的民主裡追求進步。…任何偉大的政治領袖，都曉得要團結自己子民，在痛苦艱難道路奮勇前進。因為他明瞭，分裂的國家是無法往前走的，要能看得到未來，記住領袖的責任，而不是只管眼前的幸福，或者忘記過去的教訓。」¹⁸⁷（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以上四段文字，可以發現抱持「和諧社會」的看法的言論，譴責執政當局過度的維安和警察執法問題，並且認為執政黨為了兩岸和諧互動，犧牲了社會內部的和諧，挑起藍綠對立，其作風不像一個照顧全民的「全民政府」。此種視「台灣社會整體的安定和諧」為大局的看法，是在紛亂對立的情境裡，重新將台灣的主體性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並從這個角度呼籲執政當局應該要調整施政的優先順序。不過，由於這種重視「社會和諧」的看法所提倡的價值，和「去政治化敘事」所強調的「和平」、「理性」價值相互呼應，因此它不同於憂心主權流失的不滿聲浪，異於與執政當局完全對立的立場，因此更能夠影響執政當局下一步的行動。例如 2009 年 4 月 26 日的第三次江陳會，國、共兩黨從政者為了避免歷史重演，便把會議地點選在南京舉行；¹⁸⁸至於在 2009 年 12 月底舉行的第四次江陳會，國民黨政府則刻意安排陳雲林到台中參訪，並且以行程保密的方式、避開陳雲林與抗議者接觸的機會，來降低衝突的可能性。¹⁸⁹由此可見，這種重視「社會和諧」的看法雖然在當時產生了抑制衝突、糾正執政當局的正面效應，但它畢竟不具有解構去政治化的敘事和手段的能力。這些言論，反而有助於提醒國民黨執政者調整手段，以更細緻的做法，在「和諧」的原則下，持續使用去政治化的統治邏輯，來進行兩岸經貿交流的種種互動。

¹⁸⁷ 參考〈分裂如何前進〉，《中國時報》，2008 年 11 月 8 日。

¹⁸⁸ 參考〈三次江陳會 26 日登場 金管會 備妥 18 套劇本〉，《聯合報》，2009 年 4 月 20 日。

¹⁸⁹ 第四次江陳會安排陳雲林於 2009 年 12 月 21-25 日至台中參訪。參考〈兩會完成預備性磋商 江陳會 敲定 22 日將簽協議〉，《聯合報》，2009 年 12 月 10 日。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首先從兩岸經貿交流的歷史切入，探討晚近兩岸之間去政治化的經濟政策的濫觴。過去在冷戰時期，國民黨、共產黨政府因為政治上的敵對，導致經貿完全不來往，兩方的統治者都有著「經濟議題即政治議題」的立場。隨著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1979 年台美斷交之後，中國也將對台政策由武力解決轉為和平統一，並以「三通」做為促進統一的手段。另一方面，當全球化的力量形塑了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中國也利用與東亞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將台灣邊緣化。

隨著台灣社會的自由化、民主化發展，選舉政治的運作邏輯讓過去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都浮上檯面，其中缺乏共識的統獨爭議、認同政治等問題，形成晚近台灣社會去政治化現象的重要背景。如第四章提到的，將統獨、認同政治議題懸置的反意識形態政治現象，在在顯示無法解決的政治爭議、無法深化的政治議題，均構成社會內耗，使人們產生厭煩疏離的心態；此時再加上經濟轉型面臨的困局，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便使得「擱置政治爭議」、強調「拼經濟」的去政治化敘事，在晚近成為一種較強勢的意識形態。而當主導這種敘事的藍營從政者，再進一步將它化為兩岸經貿交流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時，便使得「經濟議題即政治議題」的命題，被翻轉成「經濟議題非政治議題」，因此形成了第三個層面的去政治化現象，亦即反對政治干預的市場決定論。

當一個去政治化的經濟議題被建構出來，它同時也意味著歷史詮釋的改變。從「江陳會」的去政治化敘事中，可發現一種改寫國、共歷史的「去歷史」特質。在其中，國民黨遷佔台灣社會、將台灣視為反共基地的歷史似乎均不復存在。這種去政治化的操作，最終只是把更多政治爭議轉嫁到台灣社會內部，引發憂心主權流失的社會不滿，因此引起更劇烈的社會對立，在「江陳會」期間一併爆發出來。然而，「江陳會」期間因高規格維安、警察執法過當等侵害言論自由的問題，轉移了此議題真正的焦點。它引出的重視「和諧社會」的看法，雖然表現了台灣社會中對此議題似乎更加成熟的觀點，但卻反而造成國民黨執政者後來以「避免社會衝突」為目標，執行接下來的經濟會談程序。國民黨執政者依然使用同樣的去政治化邏輯與敘事，推行實際上具有政治性的經濟政策（例如 ECFA 議題）。¹⁹⁰ 在這種施政運作之下，台灣社會將持續去政治化與反去政治化的激烈對立，對民主政治與生活造成相當負面的影響。

¹⁹⁰ 例如 2009 年 3 月 11 日 ECFA 議題剛剛開始討論時，行政院長劉兆玄便指出 ECFA 是經濟議題、無關政治，因此不需經過公民投票決定，依此回應民進黨的質疑。參考〈劉揆：ECFA 是經濟議題 毋須公投〉，《中國時報》，2009 年 3 月 11 日。

第六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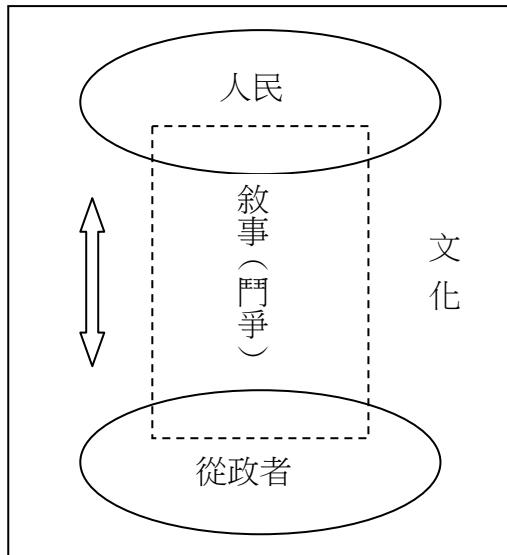
Clifford Geertz 曾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尼西亞政治的文章〈意義的政治〉一文中提到：「所有國家的政治進程，都比設計出來規範它們的正式制度更廣泛和更深刻。」這是由於他觀察到印度尼西亞其官方統治和人民大眾的嚴重斷裂，使得被設計出來的政治制度從來就不可能好好實現。政府活動變得沒有意義，其例行的事務往往一次又一次被屏風後面的政治進程突然干擾，而這個國家實際上正沿著這個進程前進（Geertz,1999: 374）。從這個案例，Geertz 發現推動印度尼西亞政治發展的真正力量，是它的文化設計（Geertz,1999: 368）。戰後印度尼西亞與台灣的政治情況大相逕庭，然而 Geertz 的研究指出文化對於政治的重要作用，對於我們研究台灣去政治化現象中的文化定義與作用，相當有啟發。

這篇論文從文化社會學與敘事社會學的研究角度切入，探討台灣「去政治化」的政治敘事如何產生、及其轉變的過程，以及「去政治化」敘事的延續與變遷反映何種社會意義、產生何種社會效應。在這一章，我要回到「去政治化」的基本概念，由此出發，總結說明這篇論文的經驗研究發現，並且釐清晚近台灣社會這種愈演愈烈的去政治化現象所具有的理論意涵。

敘事與文化生產及再生產：敘事社會學取徑的研究發現

探討政治現象的文化意涵與文化作用，必須思考如何將文化操作化，使文化成為可以具體研究與分析的對象。換句話說，如果從文化社會學作為一種較宏觀的視角來理解台灣的社會政治變遷，要使這種較宏觀的文化社會學分析成為可能，那麼輔以更能貼近經驗現象的「敘事社會學」的分析，是一個相當有利的研究方式。伴隨人們的社會行動的種種具體的敘事，承載、複製、建構文化價值、象徵與意義。人們的社會行動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的實作，而在文化實作的過程中，「敘事」是一種社會行動的形式、是社會行動本身的一部分。敘事不只是簡單反映或表達現存的結構和意識形態，它同時也參與了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再生產（Ewick, 2005: 49）。本研究中的「敘事」所指涉的具體資料類型，是媒體評論、政論、讀者投書、與政治修辭中那些具有「故事性」的文體。各種「去政治化的敘事」其共同點均為：它們是介於「人民」和「從政者」這兩種行動者之間的言論，「人民」和「從政者」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脈絡，可以分別扮演敘事的敘述者或閱聽人。不管是從政者為了將人民變成自身的「選民」，而從文化結構中汲取有效的敘事來進行政治說服，或是人民（也包括媒體人在內）透過各種媒體發表對政治的看法，這一來一往的敘事鬥爭和政治說服，都參與了對「政治」的內涵所進行的意義鬥爭，也構成了意義上範圍更廣泛的「文化」。這樣的文化建構情境，可以用圖 6.1 來表示。

圖 6.1 去政治化敘事的文化建構示意圖



透過敘事社會學取徑，我們一方面掌握了歷史的、縱向的去政治化敘事的延續和變遷，另一方面也經由對事件的研究，來描繪橫向的、不同類型敘事之間的關係。大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發現，從威權統治時期奠定下來的「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以及「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是屬於台灣社會政治論述中最歷久不衰、最核心的敘事。無論是 2006 年的「反貪腐倒扁運動」，2007-2008 年的「中正紀念堂更名／復名事件」，或是 2008 年的「陳雲林訪台風波」，都可以看到這些敘事特質在這些事件中發揮的效用。它們讓人難以反駁，透過不同行動者使用與再生產的過程，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它們是台灣社會政治生活中最深層、固定的文化力量。

表 6.1 1990 年代以來台灣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章數	事件	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
第二章	(1) 1972 年《大學雜誌》引發的意識形態論戰 (2) 1979 年「美麗島事件」 <i>1990 年代 轉型期</i>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 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一） • 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二） • 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 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第三章	2006 年反貪腐倒扁運動	• 超越政治立場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第四章	2007 年中正紀念堂更名與復名事件	• 反對轉型正義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第五章	2008 年陳雲林訪台風波	• 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

表 6.1 歸納整理了本文在經驗研究上的發現，呈現了 197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主要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從表 6.1 的整理，可以發現在威權統治時期，奠定了兩種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安定繁榮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以及「民主、法治、反暴力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一）」——在台灣社會流行的基礎。這兩種敘事模式做為國民黨維繫其統治正當性的意識型態教化與宣傳的利器，對台灣社會留下深遠的影響。而到了 1990 年代政治自由化初期，省籍議題的浮現與喧鬧的選舉政治氛圍，則讓兩種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被催生出來：「否定省籍問題存在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厭惡選舉政治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這些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又成為 2000 年後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的重要元素。特別是第四章、第五章談到的「反對轉型正義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及「經濟優先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都因為綜合、累積了之前的去政治化敘事模式，而變得更加龐大、意義上也更為複雜。而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在於：當行動者透過象徵資源來建構敘事，隨著時間的演變、象徵資源的積累，行動者能夠運用的象徵資源也會更為豐富，同時也可以挪用先前的敘事要素來建構新的敘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晚近去政治化現象的浮現，事實上是醞釀已久的結果。就現實政治的變遷而言，去政治化敘事的愈形發展，內容包羅更加廣大，也顯示台灣社會的政治分裂不僅沒有趨於消解反而有更加嚴重的態勢。去政治化與反去政治化、企圖再政治化的力量互相激盪。然而，在這些現象之外，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不同於以往的政治看法，例如第四章中針對復名行動的社會回應、及第五章中重視社會和諧的政治評論，它們反映了台灣社會在面對社會衝突和政治爭議時，所形成的一種較為成熟的政治態度。這些研究發現在本文中雖然不是分析的重點，卻值得未來其他研究來進一步探究。

「文化」的相對自主性：文化社會學取徑的研究發現

本文旨在探討「去政治化的政治現象」從威權統治時期以來到民主轉型後的延續與變遷。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不平等的政治權力結構使得「禁談政治」成為去政治化現象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同時執政當局更以生產特殊的「去政治化敘事」來壓制社會中的異議份子，以鞏固其統治的正當性。在此時期，「去政治化敘事」所生產的文化價值、象徵、與意義，都對台灣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認為政府應該要讓人民擁有「安定」、「繁榮」的政治生活，所謂「政治」應是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政治、重視「民生問題」的政治等等，這些去政治化

敘事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正是建立在「去政治」、「否定政治」的論述特質之上。而這些思維不但在 1987 年解嚴之後透過敘事持續再生產，也轉化成一種厭惡選舉政治和意識形態政治的政治態度。如此的認知參與了對「政治」的內涵進行的意義鬥爭，是形成晚近普遍去政治化現象的一部分重要基礎。

Clifford Geertz 對文化著名的定義告訴我們，文化是由人所編織的意義之網 (Geertz, 1999:5)。對「政治」的內涵進行的意義鬥爭，同時也是文化的象徵鬥爭。因此去政治化的政治現象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反映出 Jeffrey C. Alexander 所指出的：文化具有「自變項」的作用，在形塑行動和制度時具有相對自主性的角色 (Alexander, 2008: 13)。去政治化的現象本身與社會後果，很難為那些著重政治的制度變遷的研究者所掌握。因此當我們以文化社會學取徑研究去政治化現象時，可以發現那些探討政治制度變遷的研究文獻所掌握不到的問題。雖然台灣社會的政治制度已經歷民主轉型，去政治化的文化仍然不斷的形塑著人們的政治生活、影響著我們對民主政治的觀感。本論文的研究發現，顯示文化社會學取徑在研究台灣的政治／社會變遷上所具有的重要性與可能的貢獻。

此外，若以政治化／去政治化的觀點來回顧台灣政治發展的相關學術研究，便可發現這些研究注意到的問題值得被進一步深化。例如許多這些研究都認為國家認同分歧、省籍族群矛盾等課題是影響台灣社會運作的重要因素，這樣的發現的確指出了台灣政治問題的事實。不過如果注意去政治化的文化在這些衝突鬥爭中扮演的角色，那麼將可以使我們更掌握台灣政治變遷的特殊性。事實上，台灣社會中國家認同分歧、省籍族群對立的現象，夾雜著「政治化」與「去政治化」這兩股文化力量所展開的意義鬥爭。而這種鬥爭，又與國家認同分歧、省籍族群對立的現象互相激盪。當「政治化」的這方試圖將社會矛盾（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當下的）議題化、問題化時，所遭遇的便是「去政治化」文化的反制。儘管「政治化」與「去政治化」都同樣為政治操作，「去政治化」的操作卻是透過對政治（人物）的否定來掩蓋自身行動的政治性，因而是一種更隱諱、更不易察覺的政治，有利於隱藏某些由於特定認同或立場而來的言論、政策、或行動。透過本論文的研究，相信可以對此經驗現象有更清楚的了解。

透過文化社會學取徑，尤其是文化的「工具箱」(tool kit) 論，我們觀察到文化如何被不同社會行動者使用。「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文化反映了文化實作的不同方式，即人們對於「政治」的規範性定義（政治應該如何）的不同想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敘事生產者並非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固定、各自界線分明的兩個群體，儘管在多數情況下是如此。「去政治化」的敘事做為一個有效的文化工具，在某些社會脈絡下也會被原本不習於使用的人部份沿用，或轉化作用，並拿來當作論述武器。例如 2006 年「反貪腐倒扁運動」中，民進黨從政者與其支持者生產的「抹藍」、「倒施」的政治污名化回應、

「尊重法治」的反動員回應、強調「社會安定」的政治意見，以及強調「經濟發展至上」的反罷工看法。這些敘事部份延續了過去去政治化敘事的形式或元素，但在內涵上又因為新的社會脈絡而有所更動。這種看似矛盾而混雜的現象，透露了台灣社會政治變遷的樣貌。一方面，它反映出台灣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價值，這些價值已被人們內化到一種程度，才會使得平常不習於使用這些去政治化敘事的人，在某些關鍵時刻也必須競逐這種論述武器，來說服民眾支持自身的政治正當性。其次，這個現象支持了文化的「工具箱」(tool kit) 論做為一種理論觀點的有效性。不同於將「文化」視為意義體系的舊傳統文化觀點，當我們聚焦在「人們如何使用文化」的層面，便會更清楚人們如何透過文化進行各種抵抗和鬥爭，從而發現更鮮活、動態的文化圖像，以及行動者在其中的能動性 (agency)。

去政治化的比較研究背景：國族認同政治與經濟發展論述

基於本論文對晚近台灣去政治化現象的考察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歷史過程的演變具體呈現而與文獻所指出的「去政治化」概念三個面向的運作邏輯。在第一章中，我們曾指出「去政治化」概念包含了三個面向：人們對「政治」的負面認知、人們對政治人物的負面看法、以及「反對政治干預經濟」的去政治化現象。其中第三個層面往往以前兩個層面為前提，因為人們對政治（人物）的負面觀感，以及所導致的低落政治參與，是構成政治人物在表面上除去自身決策責任、將國家再現為中立者的重要條件。台灣的特殊情境，也使得去政治化現象有其獨特的展現方式。從本文對晚近三個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2006 年「反貪腐倒扁運動」中「貪腐案」的建構強化了人們對政治（人物）的反感和厭惡，進而讓 2007-2008 年「中正紀念堂更名／復名事件」也陷入這種厭惡政治的情境，並且在民進黨政治菁英在政治論述上陷入被動防禦的情況下，讓先前種種去政治化的敘事模式有了集結的機會。於是，統獨、國族認同問題相關的轉型正義議題被否定為「政治操作」，形成「反意識形態政治」的去政治化現象。關於「政治」的規範性定義被再政治化成「與民生經濟議題相關的政治」，而這種內涵的轉變，則讓強調市場力量、反對政治干預經濟的去政治化現象，有了萌生茁壯的空間。隨著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而成為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的治理邏輯，如 2008 年第二次「江陳會」的經濟議題建構及引發的事件，便是此去政治化邏輯的例證。

由本論文觀察到的經驗現象與「去政治化」概念的相互印證，我們可以進一步延伸思考一個新的問題：亦即政治上的國族認同政治、與強調經濟發展的論述之間互相抵觸的關係。為了更深入探討這個重要的現象，在此我們要藉助香港的去政治化現象的個案研究，來比較說明。陳奕麟（1999）曾於〈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一文中指出：二次戰後初期，英國殖民政府在提倡香港的經濟發展中採取主導的角色，並不僅是為了本身現代化的緣

故，而且更是蓄意地將香港脫離甚囂塵上、危及殖民政體的民族主義衝突。從1967至1984年間，為消滅民族主義情感而培養出的功利氣氛，甚至變成政治冷漠的態度，促成了一個幾乎無政治性的香港文化的興起。這項發展的一個明顯後果是由大量資本利益所資助，並由媒體所導向而成長的大眾文化，就如Max Horkheimer與Theodor Adorno所說的文化工業，全面複製了自由市場社會的功利價值。例如功夫電影和無厘頭喜劇等藝文類型的出現，皆根植於這自行推展的文化工業，既離開、也無涉於文化認同的政治議題（113-114）。

與此相關的研究，如香港政治學者Wai-man Lam在*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一書裡也指出香港去政治化的文化與政治激進主義間的衝突與張力。其中去政治化文化也強調安定(stability)、繁榮(prosperity)等維護社會秩序的價值，或將左翼激進份子指為「麻煩製造者」(211-213)。作者認為，香港政府和右翼群體始終是塑造去政治化文化的要角，而此種去政治化文化促成了香港政治的另類形式，使得劇烈的政治活動往往偽裝成社會活動，不同的行動者都異口同聲的宣稱他們的活動與政治無關。這種去政治化文化對於香港社會的政治動員能力而言，產生負面的影響。它藉由建構去政治化的認同，限制了政治參與，並導致激進主義和去政治化的自我悖論。因為安定和繁榮論述的風行，形成對「政治」的負面聯想，致使香港人普遍對政治缺乏興趣(219-221)。

雖然香港與台灣的去政治化現象根植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因此有不同的成因，然而從兩者的個案研究似乎可以發現，在過去由強勢政府（香港是英國殖民政府、台灣是國民黨威權政體）對於社會進行的「去政治化的治理方式」，都對社會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是，當國民黨威權政府過去一面對台灣社會實施中國民族主義式的教育、一面又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政治壓制時，英國殖民政府基於不同的統治利益，卻是全然迴避民族主義而實行一種更為去政治化的統治，這種統治使得香港社會很早就被資本的力量進駐，也形成似乎比台灣社會更為嚴重的去政治化現象。不過在台灣社會民主轉型之後，許多民眾對族群政治的發展有所疑慮，漸生反感，再加上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滲透，讓過去強調民生經濟的思維與晚近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了結合的契機，而使得台灣社會愈來愈朝向「政治勿干預經濟」的去政治化現象演變的態勢。對族群政治的反感、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則有利於某些人們迴避族群問題、國族認同問題存在的現實，因而也有利於他們遮掩這些問題所造成的政治不正義。香港與台灣的案例顯示，國族認同政治的式微似乎與強調經濟發展的論述有一種微妙的關係：當前者失去它的位置，後者便會取而代之；而當兩者並存時，後者對前者則造成一種威脅。

去政治化現象何去何從？

在理解了台灣晚近去政治化現象的運作原理與敘事建構的模式之後，我們不免會好奇：未來會是如何？去政治化現象的後續發展可能如何？然而歷史一直在演進，知識永遠有其限制，研究者多半能貢獻的是朝向過去觀看的「後見之明」。所以筆者在此至多也只能透過歷史已經走過的軌跡，來推估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從本論文的分析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台灣社會過去到現在的政治發展，是經由政治化與去政治化力量所形塑出來的動態境況。雖然晚近幾年去政治化現象的程度有提高的趨勢，卻不表示不會有變化的機會。一方面因為台灣的國族認同政治並非一個「假議題」，中國對台灣政治、經濟上的威脅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實質存在的。回看過去的歷史，透過政治化的手段試圖建構的台灣人認同對於現實政治的變化，也曾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時刻。民進黨贏得的兩次總統大選，這種認同在其中扮演重要的作用。晚近加劇的去政治化現象，其轉折點在於 2006 年「反貪腐倒扁運動」之後。一開始被「建構」出來的貪腐案，隨著司法機關的審理偵辦過程，最後也成為許多人們接受的社會真實。「貪腐案」做為一種污染源，使得綠營從政者失去清新的形象，也失去象徵生產工具的主動控制權。這種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情境提高了去政治化現象的嚴重程度，而非表示國族認同政治已經完全不受重視，成為不重要的議題。

我們可以說，未來台灣政治的樣貌，決定於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內涵和策略；而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內涵與策略，也將形塑未來台灣政治的樣貌。人們如何想像政治、如何理解政治、認識政治應該是什麼，與實際的政治過程與樣態，兩者互相激盪、互相形塑。對於至關重要的議題如何有效的政治化，這有賴於行動者進行文化實作的技巧。遵從去政治化的遊戲規則，但生產出另類的政治化敘事，也不無可能成為一種行動者進行文化實作的方式。也許某些意想不到的、新穎的政治動員或社會運動方式，又會帶出未來另一波社會與政治變遷。不管是對台灣本身，或對更廣大的國際社會來說，追求更公平正義的民主政治與更美好的生活，都有賴人們對政治的無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參考書目

(一) 期刊

王人傑等，1971，〈我們對釣魚台列嶼問題的看法〉，《大學雜誌》。第 40 期，頁 18。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1979至1989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第1期，頁129-209。

王甫昌，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1-45。

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臺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2 期，頁 89-140。

王振寰，1997，〈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7 期，1997 年 9 月，頁 1-36

丘宏達，1971a，〈釣魚台列嶼問題大事記〉，《大學雜誌》。第40期，頁20-24。

_____1971b，〈從國際法觀點論釣魚台列嶼問題〉，《大學雜誌》。第 37 期，頁 20-23。

尼洛，1980，〈血與淚中的勝利——評高雄暴動事件〉，《疾風》第七期，頁 41-42。

行健，1971，〈留美同學的愛國運動〉，《大學雜誌》。第 40 期，頁 20-24。

江宜樺，2005，〈西方「政治」概念之分析〉，《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2 期，頁 1-57。

江宜樺，2007，〈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思想》第 5 期，台北：聯經出版，頁 64-81。

李永然，1980，〈高雄暴力事件是陷阱嗎〉，《疾風》第七期，頁 56-58。

吳乃德，2001，〈反動論述和社會科學——台灣威權主義時期的反民主論〉，《台

灣史研究》，第 8 卷，頁 125-161。

胡俊佳，2010，〈觀光作為文化治理：「兩蔣」、「陸客」與觀光的（去）政治化〉，
2010 年文化研究年會會議論文。

倪炎元，1986，〈走出政治文化的「迷宮」——評介《政治文化》〉，《中國論壇》，
22 卷第 2 期，頁 61-64。

郭紀舟，2007，〈70 年代的夏潮雜誌〉，《思想》第 4 期，台北：聯經出版，
頁 103-114。

湯志傑，2007，〈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
《台灣社會學》。第 13 期，2007 年 6 月。頁 71-128。

陳佳宏，2007，〈「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勢之發展〉，《台灣史研究》，
第 14 卷第 1 期，頁 191-230

陳奕麟，1999，〈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3 期，頁 103-131。

陳鼓應，1972a，〈開放學生運動〉，《大學雜誌》。第 49 期，頁 64-68。

黃秀端，1997，〈政治文化：過去、現在與未來〉，《東吳政治學報》，第八期，頁
47-85。

黃景裕，2001，〈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政治文化面向之探討〉，《台灣人文》，第六
期，頁 349-370。

詹振國，1972，〈學生運動是覺醒與向心的表現〉，《大學雜誌》。第 53 期，頁
26-27。

蕭怡靖，2006，〈台灣閱報民眾的人口結構與政治態度變遷—1992 至 2004 年〉，
《臺灣民主季刊》，第 3 卷第 4 期，頁 37-70。

魏艾，2009，〈經濟全球化下兩岸經貿關係的戰略選擇〉，《海峽評論》第 217 期，
頁 8-12

DiMaggio, Paul , 1997 , “Culture and Cognition”, *Annual Reviews*, 23:263–87

Jacobs, Ronald N. , 1996 ,” Civil Society and Crisis: Culture, Discourse, and the Rodney King Beat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5, pp.1238-1272

Jacobs, Ronald N. and Sarah Sobieraj , 2007, “Narrative and Legitimacy: U.S. Congressional Debates about the Nonprofit Sector,” *Sociological Theory* 25(1): 1-25.

Loseke, Donileen R. ,2007, “The Study of Identity as Cultural,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8: 661-688.

(二) 專書

王甫昌，2004，〈由民主化到族群政治：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1970s-1990s）〉，《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頁 535-590，台北市：國史館。

吳易叡，2005，《焦土之春之 2004 年備忘錄》，臺北縣新店市：正中出版。

洪三雄，1993，《烽火杜鵑城》，台北：自立晚報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1970，《中華民國當代文藝作家名錄》，台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陳鼓應，1972b，〈再論學生運動〉，《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台北市：環宇出版。

陳儀深，2008，〈中正廟在法律與政治間浮沉—回顧 2007 年的一件大事〉，《漂流台灣 虛擬執政》，台北：前衛。

楊渡，2006，《紅花雨：我們不會忘記的時刻與事情》，台北市：南方家園文化出版。

楊國樞，1972，〈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台北市：環宇出版。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Alexander, Jeffrey C. ; 吳震環譯，2008，《文化社會學 社會生活的意義》，台北市：五南。

Aristotle 著、高思謙譯，2006，《尼各馬科倫理學》，台北市：台灣商務出版。

Bauman, Zygmunt；李培元譯，2002，《定位政治》，韋伯文化出版。

Bonefield , Werner and Kosmas Psychopedus, 2000, *The politics of change: globalization, ideology, and critique*, Hounds 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New York : Palgrave.

Bourdieu, Pierre；孫智綺譯，2002，《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台北市：麥田出版。

Bourdieu, Pierre；孫智綺譯，2003，〈反對去政治化的政策〉，《以火攻火：催生一個歐洲社會運動》，頁 67-84，臺北市：麥田出版。

Brooker, Peter；王志弘、李根芳譯，2003，《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

Chilton , Paul and Christina Schäffner, 2002, *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 analytic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 John Benjamins Pub. Co.

Dayan, Daniel , 1992, *Media events :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wick, Patricia and Susan S. Silbey；陸益龍譯，2005，《法律的公共空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Geertz, Clifford；韓莉譯，1999，《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

Giddens, Anthony ,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First Published 1984 b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Oxford.

Giddens , Anthony；李康、李猛譯，2002，《社會的構成》，第 1 版，台北縣：左岸文化出版。

Hay, Colin , 2007, *Why we hate politics*, Cambridge, U.K. ; Malden, Mass. : Polity

Rosenbaum, Walter A ；陳鴻瑜譯，1984，《政治文化》，台北市：桂冠。

Rosenbaum, Walter A ；陳鴻瑜譯，1991，《政治文化》，台北市：桂冠。

Seidman, Steven, 1997 ,《文化與社會》，立緒文化。

Swidler, Ann , 2001, *Talk of love : how culture matters*, Lond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i-man, Lam, 2004,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 M.E. Sharpe

Zerubavel, Eviatar ；黃佳瑜譯，2008，《沉默串謀者》，台北市：早安財經文化。

（三）學位論文

江文孝，2005，《政治疏離感對民眾政治參與的影響》，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呂翠燕，2005，《2004 年總統大選後台灣民主發展之驗證》，台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介民，1989，《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 1980 年代》，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立偉，2010，《台灣民族認同的日常形構——以中國商品的治理與反消費為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柯春共，2003，《從國際區域經濟整合探討兩岸自由貿易區之建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袁公瑜，2002，《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佛光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圍洲，2002，《戒急用忍政策之政經分析》，成大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雅伶，2004，《全球化下民主轉型後之政經發展分析》，東海大學政治系碩士論

文。

葉子豪，2006，《台灣選民的政治疏離感：以 2001 年與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葉春嬌，2007，《敘事與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轉折——1994~2004 年報紙讀者投書的分析》，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黃嘉琪，2004，《都市公共空間的歷史轉化：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分析》。世新大學社發所碩士論文。

楊惠婷，2003，《台灣政治民主化民粹批判論述的歷史形構》，台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陳明君，2009，《暴力與文明——暴力的「再」理解》，東海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

簡士偉，2003，《從台灣地區政權輪替論政治文化之發展》，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立欣，2007，《媒體時代的群眾運動：試論倒扁運動的框架演變》，台大政治所碩士論文。

蔡佳青，2005，《八面玲瓏：台灣蘋果日報政治立場之初探》，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安琦，1999，《台灣BOT制度之研究－以台灣高速鐵路為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報紙與網路資料

王小敏，2006，〈我反貪汙 也反對罷工！〉，《聯合報》，9月15日。

王丰，2007，〈去蔣中正化 和鈔票過不去〉，《聯合報》，2月6日。

王美琇，2006，〈聯中媒體的準政治內戰〉，《自由時報》，8月15日。

王新偉，2006，〈倒扁保扁 台灣大撕裂〉，《中國時報》，8月27日。

江明修、劉祥孚，1995，〈抱黑金搞派系 扭曲真正民意〉，《聯合報》，12月3日。

李家同，2006，〈街頭運動…今天倒扁 將來倒誰〉，《聯合報》，8月18日。

宋憲，1972，〈誠意與謙遜——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進一解〉，《中央日報》，6月8日。

余德培，1994，〈拒絕被政治套牢 他們移民〉，《聯合報》，10月20日。

李筱峰，2008，〈歡迎參加「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自由時報》，11月2日。

李華球，2008，〈安內應優於兩岸交好〉，《中國時報》，11月7日。

孤影，1972a，〈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中央日報》，4月4日。

孤影，1972b，〈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中央日報》，4月6日。

孤影，1972c，〈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中央日報》，4月7日。

孤影，1972d，〈最後幾句話〉，《中央日報》，6月13日。

林火旺，2007，〈希望不在一人〉，《中國時報》，2月8日。

林孟潔，2008，〈胡錦濤來還得了〉，《自由時報》，11月6日。

林建宇，2006，〈平民的心聲 我支持龍應台〉，《中國時報》，8月25日。

邱德宏，2006，〈台灣一個國家 兩個世界〉，《蘋果日報》，11月4日。

青雲白，1994，〈政治化暗流 混淆企業方向〉，《聯合報》，9月10日。

神農，2006，〈用大智慧化解大對立〉，《中國時報》，8月28日。

南方朔，2006，〈台灣需要一場「彩虹革命」〉，《中國時報》，8月14日。

郁慕明，2008，〈兩岸協議 經濟闢活路〉，《聯合報》，11月10日。

孫亦文，2008，〈民進黨抗爭 呷緊弄破碗〉，《中國時報》，11月5日。

郝龍斌，2007，〈力抗中央 只為守護法治〉，《聯合報》，5月23日。

梁鴻彬，2008，〈別搞得像警察國家〉，《中國時報》，11月4日。

曹長青，2006，〈施明德千萬別「自焚」〉，《自由時報》，8月14日。

曹婉容，1994，〈移民潮再現 台灣人心脆弱〉，《聯合報》，10月10日。

張媛貞，1994，〈政客的支票 留下債務誰扛〉，《聯合報》，10月10日。

張馨尹，1994，〈都是台灣人 分啥本省外省〉，《聯合報》，9月27日。

黃文杰，2007，〈搭起觀光橋樑 兩岸人人有蔣〉，《中國時報》，3月9日。

黃光國，2006，〈打一場持久戰 全民倒扁 決戰在秋天〉，《中國時報》，7月24日。

黃明裕，2006，〈變臉〉，《自由時報》，8月29日。

黃耀明，1994，〈希望別出現「綠色」的威脅〉，《聯合報》，9月28日。

喬夫，2006，〈我可以有不倒扁的權利〉，《中國時報》，8月18日。

趙剛、陳宜中、廖元豪，2006，〈自主公民進場〉，《中國時報》，8月31日。

蔡英文，2008，〈向台灣人民報告：我們為什麼不歡迎陳雲林〉，《聯合報》，11月3日。

蔡福源，1994，〈勤奮守法的人 都到哪裡去了〉，《聯合報》，9月7日。

韓國棟，2007，〈歷史人物 留給歷史評斷〉，《中國時報》，12月24日。

羅慰慈，1994，〈政見 是「政客自己的意見」〉，《聯合報》，10月19日。

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32163&ctNode=291&mp=1>

台社編委會，〈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線上電子檔：

http://intermargins.net/taishe/20031004_draft.pdf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http://www.crossstrait.org/>

馬蕭競選網站：<http://www.ma19.net>

Roga's blog：<http://blog.roga.tw/2006/09/16/313>

